

叢
D751·20
A D

九〇年

迪
博
士
著

蘇俄的真相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834881

我 們 對 於 體 育 之 貢 獻

本局年來所出各種體育書籍，意欲引起國人對於體育之興趣，以達強身強國之目的。故關於各種球規及田徑賽等書，無不廣為搜羅，譯成中文，計已刊行者有下開數種：

籃球規則	網球規則	手球規則	棒球規則	田徑賽規則	籠球規則	足球規則	排球規則	黎氏網球射擊法	美國式足球規則	柔輦體操	分級器械運動
三角	三角	一角	三角	三角	一角	一角二分	一角五分	英文二角半	英文二角半	中文三角	中文四角
重訂游戲指導法	體育與人生	倫敦女士游泳圖解	實用網球術	游泳術	籃球術	技遊戲比賽支配法	初級體操教練法	籃球比賽記分冊			
中文一角	中文六分	中文四角	(印刷中)	(印刷中)	中文	精裝一元 平裝六角	英文五角	中文二角			

青 年 博 協 會 物 院 路 念 號
青 年 博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蘇俄的真相

目次

序

著者序

第一章 俄羅斯的意義

第二章 共產主義是什麼？

第三章 俄國的農業與集團農場

第四章 工業與勞工

第五章 共產黨共產政府與共產國際

第六章 教育與文化

第七章 道德與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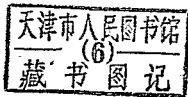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法律與正義

蘇俄的真相

參照

D751·20

A D



蘇俄的真相

第九章 俄國的宗教

第十章 共產主義的批評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的挑戰

序

蘇俄新政的良窳，言人人殊，表同情的稱贊得他天花亂墜，懷成見的抨擊得他體無完膚。實際情形究竟如何，我想凡是關心世界大勢的人都想明白了解，也都應該有明白了解的權利。

坊間流行關於蘇俄的書籍，不能算少，但大都犯着上面說的兩種弊病，他們的目的不外宣傳或反宣傳兩種；而宣傳性質的自然更佔多數。要求一個平心靜氣，根據事實，加以公允的估量的，真是渺不可得。國內非無關心世界大勢的人，但除了能直接讀西文的少數人以外，他們對於蘇俄的情形，雖有求真知灼見的慾望與權利，迄今沒有得到這種機會。

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這一次翻譯美國艾迪博士的蘇俄的真相，目的似乎就在供給這一種機會。何以知道呢？我以爲有兩三樁事實可以做保證。第一，艾迪博士在他的自己的序裏說他前後到俄國考查過六次，兩次在革命以前，四次在革命以後，最早

的一次在一九二一年，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事。可知他對於蘇俄發展的真相，不會沒有仔細的認識，至少決不是耳食者可比。第二，他認為蘇俄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宗教各方面的生活有值得我們欣賞讚歎的，也有值得我們批評攻擊的，有很光明磊落前途呈露着無限希望的，也有偏執部隨前途隱伏着無限危機的。可見他能夠就事論事，比較的能夠不受主觀的蒙蔽，和成見的驅使。讀者也許說這一層沒有甚麼稀奇，因為大凡一件事實，一種制度，一副局面，總是斑駁雜陳，瑕瑜互見的。這話不錯，但殊不知在今日以『宣傳為教育』認『我統即道統』的時代裏，能夠分別皂白，斟酌去取，姑不論他分別的對不對，斟酌得是不是，已經是一種不容易的理智的活動。至於說好處，也許說得太好，說壞處，也許說得太壞，宗教家的用筆像口講指畫，那是常有的事，讀者自能加以諒察。第三——這是最要緊的——艾迪博士是一個熱烈的基督教徒，而蘇俄向舊文化的各方面中挑戰最烈的一方面，恰恰就是基督教。以常情而論，一個基督教徒對於蘇俄的感想——對於蘇俄全部的感想——是不會好到甚麼程度的，除非是他把他教徒的身分和信仰完全拋棄了。如今艾迪博士却不這樣，他

還是能就事論事；說好說歹，很能憑客觀的標準。這豈不是更難能可貴麼？一箇社會科學家平日所希望造成的，也無非是這種態度與習慣罷了。有了這三重保證，所以我認爲國人要明白蘇俄的真相，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過，客觀的真相雖不因人而異，艾迪博士對於這種真相的估量也不過是多種可能的估量裏的一種罷了。讀者——尤其是中國的讀者——對於蘇俄問題，在明白真相之後，究竟如何估量，還得憑讀者自己的見解。在譯印這本書的人並不以爲艾迪博士的見解是唯一的合理的，非教讀者採納不可。這是因爲甚麼緣故呢？

社會組織的單位，小之不外是箇人，大之不外是社羣全部，歷代西方的社會生活，不偏重箇人主義，如最近二百年來的英美各國，便偏重社會主義，如最近十餘年來的蘇俄。充其極，前一種的主義可以造成無政府的社會，後一種的主義可以造成共產的社會。這固然都沒有做到，我們也不知究竟做得到做不到。不過即就做到的程度而論，西方歷代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已經是像鐘擺一般，疲于奔命了。艾迪博士的看法，就大體而論，也無非是從鐘擺擺得到的這一端——箇人主義的社會——看接着擺到

的那一端——社會主義的社會——罷了。

但是中國社會，至少在最近的二千年裏，似乎是既不偏重個人，又不偏重社會全部，既不會埋沒個人，也未嘗置社會與種族於不問；我們若有偏注，即偏注在介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家族。若是英美的是個人中心的社會，蘇俄的是社會中心的社會，那末我們的便是家族中心的社會了。最近西方學者有鑒於中國社會的特性，且倡為『家族主義』的名詞，認為可以與『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名詞相提並論，鼎足而三。我們一般讀者既然是家族主義的產物，沒有走過個人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極端，我們對於蘇俄問題的態度，宜乎不必與艾迪博士的完全相同了。

總之，明白一箇問題的情狀是一事，對於那箇問題的評估又是一事；情狀描寫得屬實不真，責任在作者，評估得屬實不合，責任却在讀者。我如今介紹這本譯本，一面固然歡喜中國的讀者可以因此多多的了解蘇俄的近狀，一面却更希望他們可以有自己評估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因為中國文化的背景，中國今日的需要，在讀者可以見到的，在艾迪博士未必見到。原書最後兩章，專就美國立論，今刪去未譯，我認為是

應當的。

民國二十年八月，潘光旦。

蘇俄的真相

五

蘇俄的真相

著者序

俄羅斯好像是現今世界上一片未知的國土。我們曾經對於無人居住的南北極因著科學的興趣，鼓著勇氣，費盡心血去探險。自從立溫斯敦 (Livingstone) 以後，我們就多知道了一塊黑暗的大陸。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些地方的情形，那末我們至少不會得到種種危害他們的謠傳，並且也沒有成見阻礙我們對於任何事實作正確的解釋。關於俄羅斯方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但也能得到更多的謠言。我們不妨說這個在我們地球上佔居六分之一的國家是一塊最惹人誤會的地方。其中所包含的問題是關乎一種差不多完全新的秩序——根據于一種新的人生觀，使家族與家庭，道德與宗教，自由與正義都發生影響；包含着戰爭或和平，友愛或仇恨，武力或非武力，容忍或逼迫，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比較。這些事情都與我們最深切的信念和我們最神聖的遺傳有密切連帶的關係，以致我們對於牠們要作一種公平的和客觀的評斷實在是難乎其難，或竟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了解比任何國家遠更重要，或者在以後的年代中牠也許使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無論好歹，總要發生深切的影響。因為俄羅斯已經立國很久。牠與我們總要發生關係的。牠對於我們整頓內政方面，無論是一種危害或是一種挑戰，或是一種極大的試驗可供其餘的人類作為有價值的參考，我們總應當知道世界上這部份的人究竟在幹什麼。但是這與歐戰時評斷德意志的情形完全相同。錯誤的消息與捏造的宣傳會同時發生，並且雙方的說法常常都像是對的。

本書的作者確信俄羅斯對於美國與全世界實在是一種挑戰。蘇聯的友人與敵人——雖然他們好像天南地北——也許都要反對本書中所提起的一些言論；可是本書的草稿曾經寄給莫斯科與紐約地方的專家，請他們批評與改正，好使我們知道其中的言論，在事實方面看來，有沒有不真實與不公平的地方。至於兩方面的見解相差怎麼遠，那是不要問的。

有人常常要問那些遊歷蘇俄的人對於俄羅斯的真相到底能明瞭到什麼程度。那些最早到蘇俄去考察的團體，固然為了不通俄語的緣故，大半會被他們的嚮導者與翻譯員

所驅使。但是我們的考察團都能親自查問關於每個問題兩方面所有的許多證人。作者曾經到俄羅斯去考察過六次。在沙皇的時代曾經去過兩次（一九一一與一九二二年）；在現政府底下，曾經去過四次（一九二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我們年復一年的在蘇聯境內與國外看見以前舊時代的故知。我們曾經去拜訪現政府的友人與敵人。他們在各界中辦事，俄國人也有，外國人也有。我們可以任意到各處地方去，並且日夜都能完全自由。我們可以揀選我們自己的翻譯員。他們或是從美國帶去的，或是在俄國的老朋友中找着的。我們能夠揀選我們所要考察的工廠與機關。政府的當局也沒有向我們建議去參觀陳列所或是別種雅緻的地方。我們在別的地方從沒有看見過這許多在政府中居高位的人能這樣待人和氣，使人自由，坦白無私，直言不諱，誠實可風的。我們曾經和他們談話，並且他們的領袖也用了不加修飾和直捷痛快的評論來回答我們。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裏的領袖所不及的。在別的地方，我們總覺得沒有像在俄國那樣的不得不把我們對於他們的觀念或是和他們不同的意見告訴他們。本書裏面所有批評的話，沒有一句不向蘇俄的領袖屢次坦白的提出過。

講到蘇俄各種統計的可靠性，我們應該明白各部中間的數目與估計當然也有互相出入之處，正如同許多別的國家一樣。從另一方面看來，沒有別的國家能像蘇俄那樣的主要藉着自己的統計，又用了全副精神去供給全體人民的需要，並且要使國家的經濟在生產與消費方面的各部份都能和人民的需要和適合。我們相信他們的統計雖然不能說絕對無誤的，但照大體而論，還是可靠的。

在一九二七年到俄國去考察的美國經濟學專家都贊成他們的同工徹斯（Chase）所發表的話，因為他說：『我們每個人離開俄國的時候都很佩服俄國統計的方法，並且覺得統計表中的核數是很正確的，只有常識和努力乃能臻此。至于「兩種數目」的傳說實在是對於聰明人的一種侮辱。』在俄國旅居很久的辰伯林（W. H. Chamberlain）也曾經說：『蘇俄的中央設計委員會對於工業發展的估計已經表示一種看低而不看高的趨向。』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於紐約。

蘇俄的真相

第一章 俄羅斯的意義

無論好歹，俄羅斯總要和全世界發生深切關係的。在歐戰以前，世界上只有一種普遍的社會秩序。那時先進的與落後的國家都有；但一切的文明國家都向着同一的途徑漸漸的演進發展。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世界上產生了兩種社會秩序。這兩種秩序是站在對等相反的地位，並且互相挑戰衝突，顯然不能調和的。這是近代歷史上一種新奇的偉大的事實。

我們不能再自欺自慰的說，這種反抗的制度將要很快的顛覆了。大家都很明白思想是願望的產兒，並且我們對於俄國的反宣傳適足危害自己，正如同在歐戰時代對於德國的反宣傳一樣。我們每隔幾個星期總會聽見有人說，蘇俄政府快要傾覆了，人民在『經濟的真空』中也到處鬧着饑荒，所以他們立刻就起來反抗這樣的困苦與殘暴。但這樣預料的失敗忽然又會變成極大的成功，因為有人宣傳俄國將要拿牠多量的穀物，

木料和其他的貨品來危害全世界的市場。一方面的報告說，俄國的人民在各城市中圍着麵包的饑荒；同時另一方面的消息說，他們的政府是在積極的侵略全世界的市場。所以我們應該勉力調查個中的真相。

俄國現在這種試驗的意義頗能惹起我們的注意。就俄羅斯的幅員而論，也足令人感動的。這塊最大的土地能繼續統轄在一種政治底下。牠的八百十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方哩的土地跨居兩洲，足尼佔了歐洲的一半與亞洲的二分之一。這樣的面積幾乎比美國大三倍又比坎拿大，美國與墨西哥合併起來還要大，或者等于北美洲的全部。牠的面積比大陸的歐洲（俄羅斯除外）大四倍，幾乎等于全地球人民居留地的六分之一。一個住在克利夫蘭（Cleveland）之東的美國人，比許多住在蘇聯東方的人更接近于莫斯科。單就西比利亞而論，牠的面積比美國大一倍半。若使那地方居民的密度能和比利時一樣，那就可容納比現在全世界還要多的人口。

依據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的統計，俄國的人口約有一萬六千萬，牠每年可增加百分之二、三、三，或是說三百六十五萬七千人。若把歐洲其他各國的人口合併起來，共計

三萬七千萬，每年增加的數目也不到三百萬。這就是說，蘇聯幾乎每天要增加一萬人口，所以可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增加最快的國家。俄國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的生產率為千分之四二·九，但平均的死亡率在歐戰以前為千分之二八·六，現在却已減低到千分之二十·七。況且蘇俄政府對於人民的節制生育比歐洲任何國家所取的政策還要放任哩！俄國的人口包括一百八十二種各異的民族，應用一百四十九種不同的語言。

俄國物產的衆多，正像牠面積的廣大一樣。祇有美國的物產纔堪和牠們比較。牠們從北方的北冰洋區域一直擴張到南方出產棉花與絲的地方，又從東方太平洋的區域一直到西方大西洋的地方。俄羅斯原來富有電氣和水力，以及根本物產；如同煤，鐵和油。有些專家曾經估計蘇聯佔有二十八億七千四百萬噸的煤油，或是說佔居全世界百分之三五·一的容量。牠所有極大的森林差不多等於美國和坎拿大合併起來的數目。牠的鑛鐵當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種物產，可以用作製造鋼鐵，化學用品，與電氣出品。銅，金與鉻的數量聽說是很大的，但尙未正式勘查過。

俄羅斯共有四萬六千四百三十四哩長的鐵路，可稱全世界第二。現在每年又能增加一千二百四十哩。在蘇聯境內適于耕種的土地共有十四億一千四百七十萬畝，而美國祇有八億七千八百八十畝。但美國已經開墾的土地共有二億九千三百八十萬畝，為全世界之冠。俄羅斯共有二億七千九百萬畝，居全世界第二。至于印度共有二億六千四百九十萬畝，要算全世界第三。若照蘇聯現在的狀況增進下去，那末過了十年以後就可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穀物生產者與輸出者。新俄羅斯的特點就是在于牠的大農場。這種農場本是一塊不毛之地，佔居五十萬畝的面積；現在正在用最新式的機器來開墾，可算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又常常在擴充，正像其他許多國有的農場一樣。

在這種情勢底下不可度量的元素似乎比物質上的來源更為重要。俄羅斯是一個人生的大試驗室。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正在做一種歷史上最勇敢的試驗。這種民族敢相信人們活潑的動機比鄙吝的私人利益還要多。徹斯說，現代的俄國人「無雷別的動機，祇要這種創造新天新地的熱忱，已足使每個良善的共產黨員的胸中燃

燒起來了。這種如同火燄一般的東西，令人看了，是要稱羨的。美國沒有這樣的情形。這樣情景令人回想到克倫威爾（Cromwell）殺罕默德或是聖保羅。牠能持久嗎？那是不知道的。我所能報告的，祇是在十年以後，牠的火燄仍能燒焦那好奇的旁觀者的臉。在俄國地方，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每月能得到比一百十二元（美金）還高的薪水，有時雖可供給住宅，但祇能維持生活罷了。無論在日間或晚上的什麼時候，也許有電報來召他往太平洋，北冰洋，或是廣漠地方的工業區中去做工作。那麼他總得去的。

俄國的試驗非但含有物質上的意義，並且也包括深切的社會上與心理上的意義。這班俄國人要想在人生的各方面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此外他們還要求各種新的動機。自從曼徹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倡導放任主義的經濟學以來，我們常常聽說人們祇在有機會得到無限制的個人利益的時候，纔能把他們的工作做得最好；同時這種個人自利的動機也最能替公眾謀利益。但是照俄國實在的情勢看來，好像祇有大批綜合的整個動機。這些個動機會對於他們所要廢棄的利益動機發生同樣的反感。

我們也應當記得西方各國所有利益的動舉常常適用於經理與股東，而對於大多數勞苦度日的工人是無關的。俄國工廠中的經理或工人並不聽從那些貪而無厭的股東們的要求。但是他常要受政府與黨的指導，社團的批評與階級意識的督促，至于這種全體工人階級的意識非但普遍于俄國並且已彌漫于全世界了。

照革命起初的破壞方面看來，頗能引起人民在道德上的憤慨，對於公道的要求，又能似火一般的仇恨罪惡與壓迫。那時有一種鼓勵人民好鬥的勇氣，引起工人戰爭的本能，使他加入猛烈的軍隊或是別的戰線中，好像對付一種很大的道德上的衝突一樣。

那時又能喚起人民專權的慾望，尤其能使這班平常自嘆無能的人奮興。這種運動可以給工人一種虛榮心，自負心，並承認他自己的價值與尊嚴。更有力的就是牠能常常引起勇敢的，犧牲的，與耐苦的舉動，不過各種名目都是很新奇的。有時人生中遊戲的悲慘的元素也被竭力運用到擴大的宣傳中，以喚起工人們的行動。牠似乎可以給他們一種趾高氣揚與心滿意足的感覺，去替這班被人踐踏而受苦已久的勞働者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中產國家進攻。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被認為是富足的，奢侈的，貪心的？

並且是剝奪全世界較弱的民族。他們拋棄了個人的利益，社會的佔有性就可作為他們一種有力的動機。一個人固然可以為他的家族犧牲，但是他也許可以為我們從來所不知道的較大的團體犧牲。社會的競爭，團體的比賽與運動員的精神，也許可以比殘酷個人的競爭對於社會更有效能與利益。此外，他們還有結隊成羣的動機，去從事互助合作的工作。這是別個國家所罕談的。我們已經知道競爭能夠做什麼；但是合作的可能性又是什麼呢？

如果這些基本的動機能和高尚的，道德的，與理想的目的聯絡起來——雖然他們要否認人生中正宗派的倫理觀念，廢棄我們所慣用的名辭；可是他們總要引起人民最高尚的慈愛的目的——那末有什麼心理上的能力是他們所不能啓發的呢？他們不同什麼不自然的，勇敢的，個人的公益心；但是在一種新的，健康的環境之中以及一種正在設計廢止一切剝削制度的政府底下，因為利益的同等就可使各人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去打算公眾的利益。況且他們心中既然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大膽的樂觀，求生的慾望去圖謀公眾的豐富生命以及自我與社會的充分實現；那末他們對於什麼工作是覺得太

大而不能成就，什麼阻礙是太難而不能克服的呢？末了，這一切動機，除了名稱上完全改變以外，都和宗教的情感聯合一起的。他們雖然厭惡宗教這個名辭，不過他們熱烈的信仰，獨斷的主義，宣傳的奮勇實在構成了一種猛烈的宗教，控制了他們，感動了他們，並且差遣他們去做各種偉大的事業，正如同一個回教徒拿了上帝的刀去宣傳他的教義一樣。那末他們還怕什麼不成功呢？

他們的憲法確含有這樣的精神，並且規定了他們的目標說：『廢止人對人的剝奪，完全取消人民各種階級的區別，掃除一切的剝奪者，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使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得到勝利。』

他們所確信的目標就是要消滅社會上一切寄生的分子，廢除一切祕密的條約，使亞洲以及各種殖民地與弱小國家中數萬萬奴隸式的工人得以自由，替被壓迫的民族得着自決；給民衆一種完全自由的教育，看一切的國民，不論種族國籍，一律平等。他們最後的目的是要『終止資本主義的統治，使戰爭不能發生，國家的界限完全打破，使全世界變成一個合作的共和國，使人類得到真正的友愛與自由』。一個人衆力大的國家既

然確定了這樣的理想；那末結果一定會發生極大的意義而普及於全世界。

俄羅斯的意義又因牠的特點而增加。別的國家要想慢慢的變動，或一步一步的改良社會的結構。但是俄國却在建設一種完全新的社會秩序。牠的計劃是預定的並且附帶着許許多大的錯誤，已經真正實現了新的政府，新的工業，集團的農業，新的教育與文化，新的道德與家庭觀念，又建設起一個新俄羅斯，將來也許會造成功一個新世界——雖然現在還只有少數的人希望住在這種世界裏。這樣的運動是世界上最從來所未有的，並且這樣的改革也可算是『歷史上第一回』的嘗試。

這種試驗對於俄國自己的人民也是很有意義的。這種漠然的，懶惰的，聽天由命的斯拉夫民族，免不掉許多的過失，遲鈍，與局部的失敗，但在心理上似乎已經顯出一種變成偉大能力與實際活動的記號。這是對於佔居全人口十分之九的新覺悟的勞動階級以及其他十分之一而為國家公然仇恨的特殊階級都有意義的。

蘇聯在社會的學說方面也很有意義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三種主要的社會形式中，如今却要着手試驗第三種，實在還是破題見第一道。這種試驗即

使浪費也是值得的。我們以為最好世界上至少有一個國家能自由的試驗這種新方法。他們失敗的地方正可作為世界上其餘國家的教訓。他們如果成功了，就必有益於大眾；因為比方人們對於生活中高尚的動機究能服從到如何程度，還是一個可以公開辯論的問題。

俄羅斯的意義，無論令人家怎樣厭惡，但若牠能證明可以警告別人着手整理內政；那末牠的意義也不算小的。如果一個國家能戰勝種族的成見，廢止童工，替失業者保險，又能消除生產過剩的循環性，經濟的恐慌與失業的問題；那末不管牠自己有什麼宣傳或是別處亂嚷的共產黨員替牠怎樣鼓吹，而牠對於世界上其他各國勢必要發生重大影響的。無論他們的試驗失敗了或是成功了，我們都應當同樣明白他們的。

我們亟需了解俄羅斯，因為現在的報章上充滿了各種衝突的報告與全無根據的謠言和宣傳。例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曾經接連兩天登載了完全相反的消息。

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讀到史丹林被刺與一部份軍隊叛變的消息。

倫敦每日快報（London Daily Express）的柏林通訊員自稱私下打了電報來繼續報告，

據該通訊員說，星期三在莫斯科附近地方有兩隊紅軍叛變的消息已為今日新接到的報告所證實，並且附帶說，另外有兩處地方也發生兵變，一處在列寧格勒，另一處在喀琅斯塔得（Kronstadt）的海軍，聽說那邊德爾科夫（Vorkov）兵船上的軍官與水手都被鐵鏈縛住。」

近年來最可靠的外國通訊員要算紐約時報的杜倫鐵（Walter Duranty）。他當夜就回答這些報告說，「莫斯科安靜如常，並不為謠言所擾亂，更沒有發生兵變或暗殺的事件。……那邊沒有一點動靜可以證明人民對於里加（Riga）或柏林新聞紙上所載一切謠言的來源，以及外國報館與公眾的輕信謠言發生異常的驚慌。……但是我們在國外專事捏造的通訊員，似乎已經忘記了現在不比一九一九年或是一九二二年的時代，里加的通訊員可以安穩的把列寧或特羅茨基殺死或者使他們互相「逮捕」，因為那時除了從莫斯科官方來否認的消息以外，並無別的動作；可是目下在蘇俄的京城裏已有二十多個外國的公使館，完全可以自由拍發密電不受檢查，並且封寄郵包，也可免除捐稅。……這些代表外國的外交官當中有許多人對於蘇俄和他的事工是很少表同情的。他

們差不多都熟悉俄國的情形與語言以及在俄國各界中活動的朋友們與本國人。

十三年來這些荒誕的報告與偏面的宣傳大概是從里加與柏林傳來的；所以我們對於這等可疑的消息，當然不敢輕信了。我們對於俄國的興趣似乎已為情感所驅使，並為理智所指導。有人要得到可靠的消息，就可去閱紐約時報裏的杜倫鐵，基督教科學日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中的辰伯林，民族週刊（Nation）上的斐西耶（Louis Fischer）所作有價值的報告，以及像與都（Maurice Hindus）所寫的『人道發掘』（Humanity Unpotted）這類的書籍。其他的人也許歡迎從里加傳來的種種兵變革命的消息。

關於俄羅斯在這種試驗方面的意義，林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守舊的經濟學教授胡佛氏（Calvin B. Hoover）已經說過。他以社會科學研究會會員的資格往俄國作長時期的考察以後，就寫了下面一段話說：『關於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種經濟與社會試驗的進程，世界上的人不是茫無所知，便是以訛得訛。我們並不誇大說，在以後五十年或更久的年代中，世界的歷史都要依着蘇俄最近一年中所有各種活動的結果而定。』

……，當蘇俄工人的生活程度超過了西歐一半的貧苦工人的時候，蘇俄這種試驗的結果就能表明充分的意義。……在現在的時候美國要抑止少數的共產主義者並以嚴厲的法令取締共產黨的宣傳，又用警察的勢力拘捕共產黨的鼓動者都是徒然的，也是不聰明的。承認蘇維埃政府真正的活動事業並且決意拿俄國所有試驗的材料來適應我們自己國家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若使中產階級的文明能在蘇俄所得的社會與經濟的經驗中學得一些教訓；那末俄羅斯的革命對於人類的進化就盡了一種真正的貢獻，如同法國西革命一樣。……資本主義的制度若沒有方法去大大的改進最低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同時又不能調和國際間經濟上的競爭，那末一種戰鬥的與狂熱的俄國式的共產主義在最近的十年中可以打破柏林的門戶了。」

我們不必抹煞這種明顯的事實，就是說，沒有別種情景會使我們的判斷更爲個人的方式所影響。那些希望這種試驗失敗的或是斷定勞農政府不會成功的人可以尋出許多證據來適合他們的心願。現在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與社會上確是充滿了黑暗的事實。但是牠們祇代表一方面的景象。在福奇谷（Valley Forge）地方遇着的窮乏與

失望並不能算爲美國革命最後失敗的證據。由革命產生的一個國家裏的子孫對於別個受更大痛苦的國家，無論他們的方法和我們怎樣不同，總不該有反對的成見吧。我們遇着了危害，就該反對牠。我們找到了罪惡就當證資牠。我們發見了價值，就當承認牠。這一切都是有意義的並且這一切也就構成了蘇俄的挑戰。

第二章 共產主義是什麼

現在世界上有三種主要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維持生產機關的私有，統治在一種爲私人利益而公開的競爭與個人活動的制度底下，並使政府的干涉縮至極小限度。共產主義站在另一個極端，牠代表一切生產，分配與交換的機關都歸國有，並且統治於無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狄克推多制度底下。社會主義可稱爲中庸之道，牠的目的通常要使生產的主要機關漸漸的變爲社會化。牠的方法是要藉着同意，並非強迫；又藉着憲法以國會行動，經過建設的演進的程序，並非經過忽然的暴動的革命。這三種制度的形式沒有一種很純粹而不混合的。

資本主義常會附帶着社會的控制；共產主義也暫時受了資本主義的強迫而妥協，同時社會化的過程慢慢的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進行上去。

我們不妨對於現今蘇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先着手考察一下。共產主義當然是
一種哲理，一種方法，也是一種組織。在哲理方面，牠要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或是不分階級區別的社會；因為這是廢止私有財產並使一切生產與分配機關變為公有的結果。在方法方面，牠相信這種目的祇能在一種工人階級專政底下用完全的社會革命手段實現的。在黨的組織方面，牠要藉着繼續不斷的革命方法，積極的實現牠的哲理，又借助於一個國家裏的蘇維埃政府和牠的第三國際，在其他一切國家中也激起同樣的革命，直等到牠的新社會制度可以成立於世界的各地。

關於烏托邦式的新社會秩序的夢早已有了。一直從柏拉圖的共產主義的『共和國』，以以色列的先知到早年耶穌撒冷的教會，都有這樣的夢想。那時的教徒凡物公用，完全出於自願的。自有歷史以來就有片段的革命，無論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或是宗教的革命都有。但從來沒有要大規模的嘗試或實現一種完全把整個生命轉

變的革命。如果這種佔居全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國家要做一種歷史上最勇敢的試驗，勢必要發生極大的影響，無論是好或是壞；大概是好壞兼有的。這樣的事情遇到了，一定要產生很遠大與深切的結果；所以我們應當用客觀的和冷靜的態度來研究牠。然而我們必須記得，要完全採取客觀的態度，一點沒有成見或感情作用去對付這種情景是很難的；因為在理論與實際上，這樣的情景是關乎人生中最深切的原理與最急迫的問題，並且包括與我們大家很有重要關係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宗教上與道德上的問題。任何制度若能感動或引起思想上或行為上激烈的變化——關乎個人與社會私有的財產，公平的自由權，家庭與學校，教會與國家，宗教與道德的思想或行為——那末牠要使大多數的人在心理上發生一種強烈的反感而遮蓋了冷靜的判斷。這樣我們就不能正確的解釋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或是任何別的社會學說與實際。

我們竭力要想公平的明白俄羅斯究竟是在做什麼，估計牠現在制度的結果，然後確定牠將來的意義和價值。

俄國經過了一千多年專制的獨裁政治以及四百多年沙皇的統治以後，這些革命的智

階級的領袖已看到資本主義，武力主義，以及國外國內種種戰爭的失敗。他們一方面看見少數富足的地主，他方面也常常看見那些無尺寸之上而窮苦異常的農民。他們也看見生產機關，私有財產，利益與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同時在工業方面與農業方面的多數民衆都要依靠這班少數的統治階級。他們在生活上很少保障，常常窮乏不堪，受着社會上種種殘酷與不公道。其結果就把社會分出貧富來，並且在一個世界漸成種種互相競爭的階級，種族與國家。這世界是在慢慢的暗鬥，在過去的一世紀中竟發生了四十次明顯的戰爭，恐怕在將來一世紀中的衝突還要劇烈哩。這些俄國領袖相整合個制度的根本罪惡是在私有的財產，因為牠能引起自私的個人主義與互相對抗的階級的貪心。其結果勢必發生階級的衝突，以及種種民族主義的與帝國主義的戰爭。

他們想用別種與舊秩序完全相反的目的，方法與動機完全各異的制度來代替上面所說的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廢止一切人對人藉着生產機關的私有而發生的剝奪情形並且要根據社會公道的平等原則使衆人得到優美的生活。他們的方法是要完全打倒陳腐的，不公道的社會秩序。他們相信只有一種方法能夠成功，因為其他各種的方法已經

試驗過，並且似乎都失敗了。他們所用的方法和一七七六年美洲的移民對付英國政府以及一七八九年法國的人民反抗波旁皇族所用的革命方法相同。他們的工具就是他們所信爲可靠的唯一階級。這種階級就是久被剝奪與受苦的工人。他們的動機並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利益，却爲公衆幸福的服務。

但是這種極大的變化不能在一種貪心的，爭奪的，不公道的世界裏實現出來？因爲這種貪心爭奪與不公道的事似乎在人類本性中已經根深蒂固了。他們相信是可能的。他們這種大胆的改革乃是發生于人類本性中一種最新奇的信仰，並不在于柏拉圖的『共和國』，培根的『新大西洋』，或是穆爾的『烏托邦』的夢想，也不在于小小的希臘市政團體或是原始的基督教會，但是要在世界上最廣大的最歧異的國家裏實地做這種試驗。俄羅斯的特點就是在于牠從有歷史以來第一次要用大規模的計劃做這種最勇敢的試驗。而且這種試驗處于不可能的環境中，而前有極大的障礙，並且還要應付全世界的反對。

然而我們還須注意，因爲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奉行另外一種社會秩序的關係，在這種

整個制度的中心就發生一種重要的與不可避免的衝突。共產黨的哲理是要尋求一種新的制度，一種連續的，友誼的，不分階級區別的社會，正如同希伯來先知所稱爲世界上公誼的國家。但是牠要用一種階級的專政與一切必需的武力實現這些高尚慈善的目的。牠拋棄幾世紀來在政治上慢慢進化而來的最有價值的得人同意的的方法，却採取更原始的戰鬥的方法。牠要從法律的制裁回復到原來的武力，從自由的訓練回復到更早更容易的獨裁政治。在必要的時候，牠要用武力來求得公道，不論爲多數或少數所贊成。這種武力的前提若成立以後，就容易變成了一種習慣。狄克推多的制度有永久的維持性，並且反要增加強迫的手段。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中心的根本原因，使俄國非但成爲一個有無限可能的國家，也含有無限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幾乎瀰漫于整個的制度中，就是說高尚博愛的目的在必要時也可以拿殘暴的手段來實現的。

所以我們在俄國地方可以找到一種最顯著的比較與最不可思議的矛盾。一方面對於民衆的社會利益規定種種最勇敢的計劃與設施，另一方面對於個人橫加難忍的痛苦，嚴厲的刑罰和壓迫。對於他們自己階級中的同志最能大量的分享各種權利，而對於他們

所認為階級的仇敵加以最殘酷的行動。這是一方面由于馬克思的革命學說，但是一部由于俄羅斯民族的品性。俄羅斯從來沒有知道過真正的自由。牠常常為一種獨裁的政治所統治，無論是沙皇式的或是共產黨式的。自由與民主政治都被輕看為中產階級的成見。牠們非但有一種粗暴的現實主義的遺傳性，而且也常常帶着一切俄羅斯人與鞏固人身體中所含有殘酷的血液。在舊俄羅斯底下，教會與政府屢次對於猶太教徒殺戮的舉動正和現今新政府對於他們階級的仇敵所施行的更冷酷更精密的殘暴行為相彷彿；可是他們大半都不覺得這種暴虐的行動——那是很希奇的。

我們要明白的答覆共產主義是什麼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新研究馬克思所創的共產學說，以及牠在俄國所經過的幾個時期。如果我們記得沒有別的人生哲學能這樣迅速的完全的包括在一種大規模的新社會秩序裏，那麼這種學說更有研究的必要了。

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八三年）是一個猶太法律家的兒子，德國猶太教師的孫子。他從他的先生黑智爾方面學得辯證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說，各種相反的元素經過衝突以後，就引起變化，結果就得到一種更高尚的綜合方法。照拉斯基教授

(Prof. Lash) 說，馬克思的社會制度可以簡括成功為一種歷史的哲學，一種社會發展的學說，一種實施的策略，以及一種可以作為社會轉變的基本學說。

他的哲學是根據于唯物經濟史觀。這種哲學主張個人與社會進化的主要影響就是經濟上的生產或人們生活方法的制度。這種制度大概能改變他們政治上，社會上，知識上，宗教上與道德上的關係，所以他主張那些控制生產機關的人大概可以統治附屬的民衆的生活。社會就分成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兩階級中自然不可避免的反抗就造成了階級鬥爭，或變成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至於實施的策略就是要發展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工會。馬克思以為歷史已指示我們，這種資產階級，無論在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或是資本制度底下，總不會自願把他們的權柄交出來。所以有組織的工人必須起來奪取政權並且組織一種暫時的狄克推多制，因為這是從資本主義轉變到一種共產主義的唯一可能方法。

馬克思然後把他的經濟學說發展開去，作為證實這種需要的根據。他接受當時崇拜的李嘉圖的經濟學說，就是以價值是勞力的產物。他要想表明勞工所生產的比他

所得到的要多。資本家把勞工所生產的價值剝奪去，因此勞工所得到的的是最低的市價，其他一切的剩餘價值都歸於資本家。他所謂勞工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學說從現代的科學眼光看來是不大適當的。除了他自己的信徒以外，不能算為適當的近代科學的學說。但是他著作的性質與結果基本上並不受着這種事情的影響。馬克思是一個大的社會學家，並不是近世科學的經濟學家。馬克思正如同牛頓與達爾文那樣的各有所專。他也專攻他自己的道路。這些前輩者的學說必須要為最近科學的試驗所改正。但是在最近的幾個年代中，很少的人能比馬克思更能影響歷史的途徑。

馬克思的學說可在一八四八年他與恩格斯所公佈的共產黨宣言中找得出來的。他主張工人漸漸的變為貧窮，以及資本漸漸的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就可促進階級鬥爭並且使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覆亡。

馬克思思想的制度幾乎可以當做一種完全的人生觀。至于他這一種學理與實行的計劃，大概是在倫敦過三十年流浪窮乏的生活時所詳細做成的。列寧和大多數的人民委員也渡過二十年的牢監，窮乏與放逐的生活。他們纔把這種學說具體的應用到俄國

全體人民的生活中，這種整個的運動實際上已變成了這種痛定思痛與陸莎初醒的工人階級的唯物主義的宗教。牠要替代一種出世宗教的安慰，因為馬克思說，這種宗教已經變成了人民的麻醉劑或鴉片。馬克思的著作已經變成了這種新宗教的舊約，列寧的三十卷文集已經變成牠合法的新約，並且第三國際正在把牠譯成三十六國的文字，同時史丹林正在用實際的事工，却不用文字寫成這種新信仰中正宗派的書信。馬克思與列寧的原則與政策已經給這新運動一種古典的根基與正宗的標準。但是其中有一種最可注意的特性就是在於牠不斷的變動，並且能常常很快的適應一種正在急變的環境。在過去的十二年當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從事這許多巨大的試驗或是做成這許多的錯誤。沒有一個政府能承認這許多的失敗與缺點；但是也沒有一個政府能這樣快的適應時刻變換的環境。我們現在要明白共產主義，非但必須常常記得馬克思的社會哲學，並且也要知道牠所經過或將要進入的時期。

(一) 戰爭的共產主義時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

跟着十多年獨裁的專制主義以後，不能容忍的俄國政府經過一百多年革命式的戰

爭——自從一八二八年十二月的叛變開始——就此推翻了。一種盲目的官僚政治要反對一切的改良運動，遏止被征服的民衆，少數的團體與教派，解散或蔑視牠的國會，禁止工會的組織，並以武力壓平民的暴動和工人的罷工。二萬的地主擁有全俄四分之一的田地，同時六千萬的農民生活在困苦窮乏當中。人民中目不識丁的要超過百分之六十。國家與教會所用的偵探與警察制度已經發展成功一種很大的秘密團體，能瀰漫與毒害整個的社會生活。

在全世界大戰中俄國所受的損失比其他任何的國家還要大。牠一共召集了一千五百萬的軍隊，其中戰死在沙場上的約有一百七十萬人，而因受傷，疾病，忽略凍餓而死的一共也有三百萬人。他們既爲腐敗的領袖所賣，又常常缺乏軍火與糧餉，所以前方軍隊的紀律終已破壞了，而在彼得格勒飢餓的民衆就發生搶奪麵包的舉動，祇能爲武裝的軍隊所壓平。這班兵士都從前線回來，要求麵包，土地與和平。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國第一次革命爆發了，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也退位了。國會就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奉王子勒福夫 (Prince Lvoff) 爲首領，往後又由克倫斯基

組織一個新內閣。克倫斯基的口才不能勝過退後的軍隊。於是俄羅斯就陷於混亂的狀態，祇有一個政黨知道牠的需求，並且很明白的和勇敢的給這班失望的民衆三種東西，就是他們所要求的麵包，土地與和平。那就是『布爾塞維克』，或稱爲『馬克思社會民主勞動黨』的多數派。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爲十月二十五日），俄國第二次的革命或是勞工的革命就發生了。那時彼得格勒的蘇維埃起初並不用什麼流血的戰爭就擡取了政權，並且在次日就把這種政權交給全俄蘇維埃大會。

在最初的三年當中，這種新政府要想從混亂的狀態中恢復秩序。工人們並不得着中央政府允許就佔據了工廠，並且因爲他們沒有經驗與知識就很可憐的失敗了，於是政府就不得不集中牠的權力，並且取斷然的手段。在這種軍事的共產主義時代，國家要想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把人民整個的生活從新組織起來，這種勇敢的試驗已經嘗試過，並且也失敗了。在這三年當中私人的店舖已經停閉，並且買賣的事情常常以貨物作交換品。這些沒有組織的工廠不能生產日常的必需品以供給飢餓的人民，並且工業

上的生產力也比歐戰前減少百分之十五。

農民剩餘的穀物完全都被國家強迫取去，以供養軍隊與工人。紙幣跌落，幾乎不值半文錢。全國已為戰爭所困乏，又為世界各國封鎖政策所逼迫。牠常常為別國所干涉與侵略，並且不得不輸流的抵抗德國人，奧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捷克斯拉夫人，波蘭人，芬蘭人，希臘人與羅馬尼亞人，就是美國也派了軍隊去侵略牠們的土地。德尼根（Daniken）科爾却克（Kolchak）育德尼希（Yudenich）謝米諾夫（Semenoff）胡恩吉（Wangol）貝特羅拉（Petlura）與哥薩克的白色軍隊非但善於戰鬥，並且對於居民施行種種殘暴的行爲。所以有一個時期，蘇維埃政府要抵禦十二條戰線。俄國自從一九一四年起，經過了六年的戰爭，幾為戰爭與革命所疲乏，又為一九二一年可怕的瘟疫與旱荒殺死了三百多萬人，終於破境不堪了。農民的暴動時刻增加，耕種的田地減少到歐戰以前的一半。坦波夫（Tambov）省的農民暴動與喀琅斯塔得破隊的兵變就可表明災禍的預兆。戰爭的共產主義在混亂的時局裏以及全世界的干涉政策中已經失敗了。列寧看見了他們的失敗，就承認了這種失敗；於是他用全

力把牠從右面轉過來，宣佈一種戰略上暫時的退却。他們並不拋棄了將來計劃中的原則，但是他們不得不暫時妥協，施行一種所謂「新經濟政策」的國家資本主義。

(二) 新經濟政策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

這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中間暫時的妥協。一方面國家能管理主要的生利的工業；他方面也准許私人的商業與工業可以互相公開的競爭。這個時期乃是和平的經濟的善後政策，並且要逐漸恢復衰落的工業與農業到牠們歐戰以前的生產力。這種新經濟政策包括一種確定的食料稅，以代替徵收農民剩餘的穀物，人民在國內得以自由營業；小資本的生產機關，銀行，與謀利的商店得以復興；國家的權力集中在更重要的固有工業上；組織國家銀行；鼓勵合作社。政府雖然允許國家資本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對立競爭；但是牠致力於國家的工業，並使其漸漸增長，同時使私人的營業逐漸消衰，直到如今，非但整個的國外貿易——牠常為政府的一種專利權——並且幾乎一切的工業上的生產機關以及國內批發零售的商業都在政府或是合作社的手裏了。工業與農業既經從新建設起來以後，那末政府就預備轉向列寧原來的政策，就是要使工業與農

業經過完全的社會化與機械化，並以政府的力量發展電力，因此可以從國家的私人資本主義走向他們所有國家社會主義的永遠政策。

(三) 史丹林的努力於社會化時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

這是革命的第三個時期，就是要照一種新的學術上的原則建設國家的經濟生活。

在十多年前，革命最先起於城市，政府與工業，最後他就到了農村。在起初的時候，蘇維埃政府要勉力把工業中的三百萬工人變為社會化。現在牠也要設計，使一萬三千多萬從事農業的農民都走上同一的道路。

這一種遠大的前進計劃幾乎和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宣佈的條件相配合，恐怕從來沒有別的國家很詳細規定過這樣一種野心的計劃，使在五年之內能得到一定的經濟上發展。我們很難猜度這種工作的偉大。在一九二八年，二千六百萬農民所有農場的平均大小是不過十二畝。牠們的生產力很低，方法也很舊。這種守舊的農民拿他用鐵、包頭的棒來耕作，用他的鐮刀來收割，又拿他的連枷來打穀。這種不經意的斯拉夫人是懶惰而不肯認真辦事的。各種工業都落後，並且設備也不完全。俄國普通的工人

祇能生產一百六十四噸煤，而美國的礦工却能生產七百十五噸煤。俄國的工人祇可出二百十八噸生鐵，但是美國的工人可出一千二百七十噸，差不多有六倍之多。在紡紗，製糖與其他許多的工業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俄國的農工業如此落後，斯拉夫民族的性情又不肯受約束，充足的資本與外債也不能得到，而幾乎全世界都在反抗牠；那末牠怎能在五年之中把牠全部的經濟制度變成工業化，社會化，機械化與合理化呢？然而牠已經在嘗試這種偉大的工作了。

俄國的中央設計委員會依照列寧擴大的電氣事業計劃擬就了一種草案。這種計劃經過修正後，就從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起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作為實施的時期。國家經濟的各部份都包括在工業，農業，運輸，建築等方面。這種大膽的經濟計劃為從來所未有，並且要詳細的實施出來，而每年也有一種修正核數。這種計劃要使每種工業與每個工廠的標準都用圖表表示出來，因此可以把每年的成功與失敗確切的測度出來，並使各工廠的工人或集團農場的農民都熱心去達到他們的目標，或能打破他們自己與其他鄰近互相競爭的機關中那些工人的紀錄。

當史丹林在一九二七年對付俄國經濟問題的時候，俄國百分之九十五的田地都為各個農民所佔有。在這些農民中間，百分之三·三三稱為富農，百分之六·六·四叫做中農，百分之三〇·三算為貧農。照大體而論，政府在兩種政策當中非得採取一種不可。政府不妨鼓勵個人小規模農場的生產，而將來要發生危險，並且造成了一萬三千萬（佔居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強）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農民階級，完全不能與蘇維埃的社會目的相一致。或者牠可以迅速的把農業社會化，好像對付工業一樣，而也許要殺死俄國穀物輸出營業中生金蛋的白鵝。牠揀選了後者的途徑。特羅茨基曾經提議用積極的農業集團化以及抑制富農的政策來解救土地問題的危險。那時共產黨認為時機尚未成熟，而拒絕了這種解決的方法。但在一九三〇年的開始，蘇維埃政府在史丹林領導之下，發起一種運動，使農業完全集團化，並使富農階級得以肅清或廢止。

在俄文中Кулак（富農）這個名詞，照字面上講，就是握緊拳頭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個剝奪者；因為他自己並不勞力，却僱用和剝奪他人的勞力，還要放款買穀，出借機

器，而把公衆應享的利益專爲一人所得。有許多人固然因爲這樣剝奪貧農的土地而自己得以富足；但是有許多農民也因爲優越的智力與自動的努力而得以發達。全部的制度一點不注意這樣的個人，並且他們當中也有許多和這班剝奪者同樣的被政府沒收財產，驅逐出境。有時這些熱心過分的地方官吏要雷厲風行的實施這種強迫集團化的計劃。這種情形非但會引起富農憤怒的怨言，並且也使許多中產階級的農民同樣的起來反抗。有些地方非但發生武力的反抗，甚至造成內亂。史丹林在一九三〇年三月裏，曾經宣佈阻止這種進行太速以及強迫的集團化的行動。然而這種運動還是努力前進，要用大規模的計劃使資本主義的農業變成社會主義的制度，實爲歷史上空前的紀錄。無論這種行動是聰明的或是愚拙的，試問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國家曾經設法實際的去制止一切剝奪者呢？

這種五年計劃曾經計算農民中百分之二十二是可以變成集團化。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的六月裏已經有六百萬的農家，就是等于全農民的人口百分之二四·五，或幾乎等于四分之一，都加入集團的農場。在一九三〇年春天所佈的種子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在

集團的農場裏，以反對私人的農場。所以社會化的田地逐漸增加，而私人的農場慢慢減少。

我們不能說，在整個政府的工業，農業，甚至俄國農民的心理，在轉變與蜕化的時候不會使衆人受着極大的艱難與痛苦，也不會使許多人受着窮困與不公道的待遇。政府已經把各種力量集中在五年計劃上，要使農業的出產增加一半，並使大工業的出品要增加三倍。他已經肅清富足的與興盛的農民，而失去了地稅的收入以及輸出國外的剩餘穀物，並且對於在新經濟政策底下變為興旺的農民，商人與牟利者，科以重稅，幾乎使他們不能生存。他很誠懇的不想替民衆追求目前的利益與安逸，却要尋找合宜的社會制度，使將來大多數的人得到大多數的幸福。

牠如果要費全力去完成這種計劃，那就應當從國外輸入必需的機器，原料與技師，好使全部的計劃都能實施出來。但是在在需款而又不得不維持他們的信用。國內既然缺少現金。而又不願把舊時代的珍珠寶石和名貴的藝術作品變賣。所以他們祇拿輸出的貨品與穀物來付賬。他們減低生活，節省糜費，並且計算全國的人民究竟需要多

少的食品 and 衣料。這種分配的方法藉着一種理想的運輸與貿易制度適敷應用。但是沒有一樣東西是理想的，尤其是在新的或是舊的俄羅斯裏面因為交換與分配的方法發生了錯誤，有些地方的人民就成愚癡之，並且我們奇怪號稱世界上最熱鬧的莫斯科城比其他地方更要窮困。他們絞盡腦力要使他們的大工業（就是為將來生產電力，石炭，鋼鐵，煤油，機械等等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得以三倍。他們並不留意輕便的工業，以謀人民的安適（包括衣服，鞋子以及一百多種的物品是他們認為奢侈品，必需品和西方各國安適的生活）；但是他們總以為代價太高犧牲太大，就不去完成他們的目的。牠們藉着報章，演講，遊行，開會與慶祝，尤其在他們精密的有效的活動影片（這些影片並不商業化，使少數人得到利益，却常常要達到一種很大的社會目的），他們再藉着黨，工會，與青年運動而努力工作，已經得到奇功，就可鼓勵勞工發生戰時的勇氣與犧牲的精神。牠們經過社會的競爭，就是要使牠們自己競爭又和這種計劃的目標競爭，更使工廠與工廠競爭而使他們充滿許多與私人利益有同等效力的動機，就能維持這種偉大的全國運動。這種運動也許要使大多數的人得到不方便或窮乏，然而牠能為勞工的

熱忱所維持。在牠們最有力量的影戲院中，你可以看見這班觀衆並不爲荒野的冒險與愛惜所感動，却爲耕田的機器，廣大的農場，重要的工廠與蜿蜒的鐵路所得到的勝利而現眉飛色舞的情景。他們受了感動，因爲這些東西都是他們自己的。

麵包在政府的商店中比較是多的，而且是便宜的。但是他們很缺乏其他一切的食物和衣料。結果就有許多人揆背接踵的，排着隊伍，站立着等待每日不夠分配的必需品。

牠們缺少肉類，脂肪，牛油，雞蛋，牛乳，糖——幾乎各樣東西都缺乏的。但是牠們灰心嗎？他們正像在英國的軍隊被德國人打退的時候，他們也像美國的殖民者在福

祺谷的時候，俄羅斯現今實在到了牠的福祺谷。牠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已經在那裏了，並且牠也知道現在的窮困還要經過好幾年哩。這種艱難的農民如今要大聲的呼冤。

這是他在沙皇時代從來所不敢反抗的。但是他爲了現在的政府會對於任何國家的干涉與侵略更作兇猛的戰鬥。他雖然碰到一切的困難與失敗，並且也常常厭惡他出于強迫的變動與改進；可是他知道他比以前的景况好得多了。除了這班聽天由命的回教徒以外，他總算是世界上最飽受痛苦的農民了。他經過一百多年才被喚起，從事第一次

革命。

十三年來幾乎每個禮拜總有人預料要崩潰的蘇維埃政府，現在是很強固了。我們希望牠的罪惡是可以矯正的，和其他各國所犯的一樣。照大多數的經濟學專家看來，至少在那些不斷定勞農政府決不會成功的人看來，他在經濟方面是上了成功的路，並且能夠達到最後的目的。

主持這種大改革的人就是史丹林。他和馬克思與列寧一樣的曾經爲了他的主張受了很多的痛苦，他在十九歲以後曾經有四次被沙皇的政府放逐到西比利亞去。他三次都逃走了。他第四次的放逐是在一九一三年。直等到第一次革命發生以後才回來。列寧在臨死以前，曾經說史丹林是『粗鄙的與狹量的』。然而他能封閉了特羅茨基的口，趕走了左派中三個勁敵，壓服了右派的三個要人。但是他並不是一人獨裁的狄克推多。他和墨索里尼都當他們自己是一個議會。他們聽從民衆的願望與要求。他們相信他們能夠預先知道人民究竟需要什麼，負擔多少，並且什麼政策才能成功。史丹林的領導方法是要使每一個執行委員會與立法團體中的多數做他的後盾。爲了俄

羅斯的興旺與世界的和平起見，史丹林做領袖比較更聰明而危險的赫羅茨基來得好些。史丹林的統治俄國並不在乎他有列寧那樣的偉大人格，却因為他的機警，誠實，粗魯的勇氣，不屈的意志，偉大的能力與實際的勢力。史丹林本是一個山野的農民，殘暴的亞圖佐治亞人；所以他能駕御他的機器，好像一種巨大的耕田機器或是蒸汽的碾機。他是在百折不撓的向前推進社會化，集團化，合理化的偉大事業。當他看見這部大機器壓死的人太多了，並且那些受苦者的呼聲太大了；他就把制動機撥動或是倒退了一些，然後再進行上去，使社會化的程序一點不受阻礙。他很忠誠的相信這樣做，才能使俄國的民衆與全世界的人類得到最後的福利。

史丹林是一個專講實踐而不尚空談的人。他對於自己的學說與行動是很忠心的。所以他接見紐約時報的訪員杜倫的時候曾經說，「宣傳是無甚用處的。憲法與制度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改變，並不為空論或書本所改變的。在以前的時代，沙皇祇曉得譴責法國或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把社會主義輸入俄國，却忘記了這種能決定事件的軌道乃是人民的生活狀態，不是社會主義的宣傳運動。現在我看美國人也犯了同樣

的毛病，因為他們說我們正在把社會主義從新輸出到歐洲去」。史丹林在生前是一個窮人，在死後諒必還是一個窮人，正如同以前的馬克思與列寧一樣。他很能耐勞吃苦，以提高這班久被剝奪的民衆。他也許要失敗或者也可以成功。但是經過一萬多年的競爭衝突，兵連禍結，攘權奪利以後，這塊大地真能經過社會化而學習合作共生的生活；那末牠對於人生的意義當然是不可思議的。牠在理想上的目的比一切殘暴的方法更爲重要。牠的方法是可以改正的，因為俄國人都是大的實在主義者；不過他的目的可以持久的。

我們已經略略的追溯俄國的運動在發展的歷程中三個時期，就是經過戰爭的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而達到現在社會化的運動。依照他們的學理還有兩個時期沒有做到。現在的妥協，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資本主義的調和，將來一定要變成完全的國家社會主義。那時國家是要佔有與控制一切的東西，只有人民的生命與有限的個人財產是除外的。但是這樣也並不是最後的時期。依據馬克思與列寧的學說，國家社會主義應當再進一步到純粹的共產主義。那時不需要政府來制定和實施法律，或

強迫人民服從牠們，但是牠要凋謝消滅了。共產主義——列寧常把這個名詞和社會主義相提並論——不過是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罷了。列寧在他的著作中說，『既有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裏……總可以不分階級。……祇有在那時候政府可以無形消滅，並且各人都可以講自由。……只有在那時候，民主政治的本身漸漸凋謝，因為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人民會漸漸的慣於遵守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會慣於守法。所以不必再需要武力，強迫，壓制以及所謂政府的特殊機關的威權。』

在將來的新時代中，人民會從幼年的時候就被教以社會化的合作的習慣；所以一定會發生正常的行為，因為他們是願意這樣做的。一種從新改造的環境與從新教育的人類如果不能創立一個新天堂，那末總可建立一個新世界。照他們的夢想說來，工業中的工人會切心的和農村中的居民共享利益，農民也歡喜和城市中的工人分享所有。他們希望促進這種無階級區別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一個人不會剝奪他的同胞，却歡喜共同享受一切的利益。一個共產主義者對於奇妙的將來所有堅決的信仰並不和那種拘泥字面的基要主義的宗教家對於千禧年的信仰是不同的。二者都有益處，但也不免極

端的，偏狹的，獨斷主義的流弊。同時這種共產主義者用盡無限的能力積極活動，專心組織，好使他的夢想得以實現。無論好歹，他能促進人類的歷史並且比他所寫的還要快。

我們在上面爲了要回答共產主義是什麼的問題，就追溯牠到馬克思的學說與哲理，列寧與史丹林在蘇俄的實驗，以及牠所經過的幾個發展時期。在我們還沒有把這種制度評定價值，判決罪案以前，現在姑且先問俄國這種試驗有什麼意義，並且牠如何會應用在農業，工業，勞工運動中的工會，合作的組織，文化的事業，教育，藝術，宗教與道德的各方面，以及在政治的組織裏，如同共產黨，蘇維埃政府與第三國際。

第三章 俄國的農業與集團農場

五年計劃是現在俄國最重要的問題。牠的目的是要使重大工業的生產加增三倍，並使農業經過集團化。俄羅斯的人口中之百分之八十二是鄉村的居民，並且全國差不多好像一塊很大的連續的沖積土平原；所以牠的成功與失敗當然是以農業爲轉移的。現

在這種土地革命的意義和價值祇遜於十八世紀的大工業革命。這或者是歷史上最徹底的土地革命。現在這種運動的意義祇能從俄國過去的歷史中研究出來的。

俄國經過羅伯人一百多年的統治，就變成歐洲與世不相往來的最落後的國家。羅伯人的統治使這個國家的專制政治與奴隸制度得以牢固，又使牠的人民受束縛，而官僚也慣於腐敗的舉動。可怕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與彼得大帝非但把他們自己的親生兒子殺死了，並且把許多的非俄羅斯民族與農民都壓壞了。在一六七五年，這班農奴完全變成了奴隸，簡直可以離開田地而被單獨出賣的。這些地主對於他們的農奴幾乎有生殺之權，並且可以用鞭子毒打他們，使他們順服。一六六七年與一七七三年的大農民暴動，甚至把他們的地主與官吏殺死，實在都不過是農民因為困苦窮乏而作亂的例子。到了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幾乎釋放了沙皇或政府底下一千一百萬的農奴，同時把屬於私人的也釋放了同樣數目的人。這班農民祇能得到最壞的土地，並且要被強迫出高貴的買價，還要負擔很大的地稅。這種土地大部份不是屬於各個的農民；但是屬於整個的農村團體，（稱為Mir）並且牠每年要把田地分成許

多的小塊，也沒有改良的動機，所以對於農業的進步是有妨礙的。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時候，有二十萬的地主佔居了歐俄俄羅斯四分之一的田地，並且他們到處要爲一千六百萬感覺土地飢荒的農家所仇視。在這些農家當中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是不識字的。他們住在慘慘的茅屋中，周圍也沒有平坦的道路，清潔的水料，溝渠或電燈。他們的生活程度不過等於美國普通的農民百分之二十五。他們是很講個人主義的，泥古不化的，對於革命與新方法是很反對。甚至富足的農民也不知道應用農業的機器，而這班窮苦的農民連生活也顧不周全。

一種新的農民階級就從現在猛烈的土地革命中發生出來了。歐戰時期中被德國俘擄去的二百萬俄國兵如今把德國固有的耕種新方法都帶回來了。自從十月革命以後，國家的與集團的農場所採取的近世機械化的農業方法，新設立的學校，市政會議的新精神，地方政府的參加，活動的影片，種種的改革與青年運動在在都可激成一種新思潮，使農民感覺着一種颶風似的大變動。依據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所頒佈的一道最早的命令，我們可以知道牠要使土地歸爲國有，並且要把私人的地產永遠廢

除。這些直接從地主那邊取得土地的農民就着他們的土地爲己有，因爲土地的愈分愈小，耕種方法的一復舊例，以及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資本主義與剝奪的影響就使俄國舊時所認爲大宗出產的穀粒發生不滿意的結果，以致不能輸出到外國去。

列甯早已主張把田地變成集合耕種的大農場又引用機器與近世工業化的方法乃是對付頑固的農民問題唯一的經濟上與社會上的解決方法。但是直等到十年以後，史丹林做了領袖，纔能準備做這種勇敢的嘗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裏舉行的全俄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核准了史丹林這一種逐漸轉化到大規模生產的計劃。這班富農看見集團化就要消滅他們權力的意思，自然要反對這種運動，甚至要用暗殺縱火的手段；結果就有許多鄉村裏發生階級鬥爭。在一九二八年，政府就把富農的選舉權剝奪，不准他們加入集團的農場，並且要想把他們的階級完全廓清。作者在一九三〇年到各處地方去考察的時候，看見他們都被排擠出去了。凡是阻礙集團化的人都被拘禁、槍斃，或放逐到北部的西比利亞。其他的人都被沒收財產，變爲苦工，或是得以耕種很小的田地，而常常受着極大的困難。政府看富農階級是他們的仇敵，所以不管他們中間有些是因勤儉

起家的，也在排斥之列。在一九三〇年正月六日所公佈的法令可以促進集團化的路程。地方上的官員，在城市工人所組織的義勇隊保護之下，都被差遣出去組織集團化的農場。有許多農民因為恐慌或是反對的緣故，在他們加入集團農場之前，都把他們的牲畜殺死，因此國家受着了一種極大的損失。政府藉着經濟以及武力的壓迫就使全國的土地很快的經過集團化。所以在一九三〇年的三月裏，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農場已經照集團化的原則組織起來。這種運動因為有時太粗暴與不成熟，常要發生不利的反動，使集團裏的人員減少。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史丹林警告他的僚屬說，他們爲了過分熱心於成功而得了頭痛病，並且說這種反對中農階級的運動必須出於自願而不可加以強迫。

在這種新計劃底下的農業現在已經產生了三種形式——就是國家農場，集團農場與私人農場。國家農場的目的是要造成一個模範農場，可爲其他農場的表率，並且出產穀物，以供政府輸出國外之用。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的時候，俄國已有三千二百五十二個國家農場，其面積超過一千五百萬畝，佔居全國可耕種的土地百分之三。這些農

場已經應用一萬多牽引自動車與一千五百五十多聯合發動機。有六百萬農家（約計全農人口四分之一）已經加入集體農場。但同時有二千萬農家還在耕種私人的田地。

在春天播種的時候，百分之三七·五的穀種是撒在集體農場裏的。在伏爾加區域內，每個農民產穀的數量平均若照一〇〇計算，那末在集體農場中每個農民可出產一三三·八，在共產農園中可產一五三·二，在國家農場中可出產一四七·七。政府要出其全力使集體農業得以成功。牠藉着汽力與勞力的節省，專家的管理，公債與機器的供給，種子的選擇，稅則的減輕，社會的服務與保險等等的方法以鼓勵農民的合作與社會化，同時對於個人的牟利者科以重稅，剝奪其選舉權，又使他沒有法律的保障而因此失望。

在五年計劃第二年的終了（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穀粒產額的總數共計八千六百五十萬噸，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〇·六；同時在市場上販賣的穀粒也超過這種計劃預定的數量百分之三二·六。集團的農場在第二年中已耕種了九千萬噸的田地，但照五年計劃末了一年所預定的數量，也祇不過五千一百萬噸。在主要的產穀區域中百分之

四三·八的農民已經加入了集團農場；同時一千五百萬畝的田地也已經為國家農場所經營。結果這種聯合的『社會化區域』所產生的穀物數量已經超過全市場的百分之五十，但照計劃中第五年所預定的數量祇不過百分之四三。整個的俄羅斯不妨認為是一個大的農業試驗場。集團的農場普通也可分為三種形式——就是合夥的，合作的與共產的。其中最簡單的就是合夥的農場。在這種農場裏，農人聯合耕種他們的土地，合用他們的機器與牛馬，但是這些東西仍舊算為個人私有的財產。在更普通的合作式的農場裏，人人把他們的田地，機器與牛馬歸為公有，但是他們家裏的器具與少數的畜都保留着作為個人的所有物。這種更進步的共產農場如今雖未普及，將來也許會變成普遍的計劃。在這種農場裏的人把一切的財源都聯合起來，並且組織公共的廚房，會食堂，育兒所，洗衣作等等。

這種個人主義的農民不懂得什麼新的方法，惟恐把他的私有財產與自由權失去，所以不免要抱漠視的態度。他也許自然而然的恐怕他犧牲了個人的財產而加入了新的集團就會變成新式的奴隸。然而有兩點可以保證他不會變成新式的奴隸。因為他在國

家農場裏做了一個工人以後，他就變成一個有力的工會的會員——這是全國整個組織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做了自治集團中的會員就能在農場公開的常會中有投票權與發言權，又能選舉或罷免那些管理這種團體的職員與委員。照工人階級而論，這種制度是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就是史丹林也要常常在各方面取得他們的同意。那些不屬於工人階級的人當然談不到民主主義與公道主義的。信用的借款也爲了工人階級的社會化而設的。俄國的中央農民銀行在各鄉區所設立的幾千個分行是預備借給農民，作爲必需的資本，其條件很寬，分三年到五年還清。這種款子大概是借給集團的農場以及那些與政府計劃相符合的人。凡是不贊成政府計劃的人常常要碰到痛苦難忍的生活。

在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〇年的夏天，作者曾經到農村中去研究這種重要的農民運動中模範的國家農場，新近組織的集團農場——裏面的農民祇共同享受他們的土地與勞力——以及更進步的共產農場——裏面一切的財物都是公用的。

我們在坦波夫地方考察第一個共產農場的時候是站在一個破舊的守望台上面。這個地方是從前的大地主用望遠鏡觀察農奴工作的所在。附近地方有一所房屋是由地主

強迫勞工建築成功的。還有一處鞭笞的地方是從前的農奴受罰的所在。在現在的共產農場裏，有些人以前曾經替佔有這塊地方的大將軍做過工，並且在大的馬棚裏養過馬。在沙皇時代，這些困苦窮乏的農民每天只賤得一角與一角二分，每月只有三塊錢，每年只有四十塊錢。這個守望台現在已經頹廢了。這班農奴已經在一八六一年釋放了。這些農民到了一九一七年纔從無道的沙皇政府底下解放出來。現在這個共產農場是為五十個俄國移民所設立的。他們是在一九二一年從美國回到本國去的。他們在起初的時候真所謂只有兩只空手與幾所空房子。他們在第一年的時候很是窮乏，祇好吃烏鴉的肉，有時甚至吃草根。在八年以前，他們除了地產以外共計財產有一萬元（美金）。現在他們已經有六萬元了。他們的人數已經從五十增加到二百三十八人。他們所耕種的田地共有一千四百畝。

他們的九輛新式牽引自動車日夜都在工作，每天輪流三次，每次為八小時。我們看見其中有一輛自動車是由一個女子司機的。他們有一大羣的牛馬與幾百頭的豬羊。他們在養馬方面奏了特別成功。他們有好的果子園，一個麵粉廠與木料廠，並且他

們也設立了一個電氣廠。他們交誼室裏的無線電話是和莫斯科連接的。這個共產農場裏的會員每天每人所得的工資祇有五六角錢。他們從收入中付去了一角七分的住宿費就能飽吃一餐了。他們的子女是由公家看顧的，從生下來以後就可進育兒所，到了四歲就可進幼稚園，後來一直從小學可以升到大學。現在已經有四個人在大學裏畢業了。他們在教養兒童方面似乎有特殊成效的。我們從來沒有看見別地方的人在合作方面能有這樣好的訓練。

這種共產農場正如同一個蜂房那樣的忙碌，並且藉着社會服務能很快把牠的工作推廣到鄰近的地方。牠的組織與該處的十二個集團農場發生密切關係的。這些集團農場共有一千八百個會員已經耕種了七千多畝的田地。在共產農場裏他們在合作的生活中各樣東西都可以共同享受的。這個由二百三十八人組織而成的共產農場在去年一年中祇捐納了九十二元的稅。這似乎比一個富農所納的稅還要少，大概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農民所納的稅也要低。

我們在近處看到單獨的農民是在用陳腐的方法耕種他們十一二畝大的零碎田地。

他們的木犁比較四千年以前亞伯拉罕所用的沒有進步了多少，不過他們不用原始時代削尖的木棍，都有一個鍛造的尖頭，或是平分的鋤刀。我們看見他們仍舊選用鐵刀來收割，用手與木做的器具來打穀。他們住在茅草頂與爛泥地的矮屋中，有時和家畜住在一處。政府的政策是要阻止個人積攢私有的財產，卻要發展社會化的合作農業。社會化的歷程進行得極速。我們去參觀他們新設立的農村學校，那裏的小孩子正在高唱激昂的革命歌。我們曾經看見他們忙碌的蘇維埃總部以及擁擠的合作商店。那邊所經售的貨品祇賺百分之二的利息。少數的私人商店所賣的貨品大概比合作社所賣的價錢貴一倍。我們聽見好幾個農民爲了捐納重稅與奪去穀粒而訴苦，但是他們也常常承認，無論怎樣不好，總比沙皇時代的壓迫好得多了。我們也聽見集團農場裏的農民講到他們享有的特權，很輕的稅則，近世的機器，更多的收成，更大的個人幸福，與更高的生活程度。

其次，我們去參觀附近的「列寧共產園」。在一百多年前，那些有冒險精神的窮苦工人就失望的逃出了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那邊一切最好的土地爲少數富庶的地主

所有，而農民所耕種的是最壞的土地。那位到車站上來迎接我們的史梯芬（Stephan）在十八歲的時候就離開了那個農場——他在那邊只賺五分錢的工資——步行到德國的邊界，在晚間逃出了沙皇的治下，後來就遷移到美國。在歐戰的時候，他在美國每天可以賺到十二塊錢，又加入了共產黨，奉哈佛大學的約翰里德（John Reed）為領袖。

他後來也曾被捕下獄，被美國政府認為一個危險份子。他雖然得了很多的工資，但是他覺得在美國不公道的社會制度底下總得不到自由。在俄國革命以後，他夢想在俄羅斯地方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日子。在一九二二年，有同樣的五十二個俄國工人把他們的存款都拿出來湊成三萬塊錢的資本，買了些農業機器與需要品，然後回到俄國去經營一塊土地，正如同我們在隣近一個共產農場所遇見的五十個人在一年前所經營的一樣。

蘇維埃政府分給他們二千畝地。他們就組織了這個「列寧共產團」。過了七年以後，那邊的團員已經有四百五十個人。除了土地以外他們的機器與投資的價值已經從二萬元增加到十七萬元。他們在去年淨得的利潤，除了用費與捐稅以外，還多八千元。他們在合作銀行裏借款，利息為六厘與九厘。他們除了一切開支以外，把一

些紅利分給各人。他們並不反對個人所必需的財物，但是關於一切有生產效能的財產都歸公有的。

在這個共產農場裏各人每天可以得到四角至五角的工資。他每天膳宿費祇需二角。農場中一切的小孩子都由公家養育的。這些小孩子從生下來以後，在必要的時候，也可送到育兒所中去，到了四歲就可送到幼稚園，到了七歲就可進小學，一直上去。祇要他們有智力。就可送入大學。現在他們中間有十個人正在大學裏讀書。

父母與子女祇在晚間在家裏餵首。他們雖然各有家庭，但是有些功能是由學校與別種機關負責的。他們的重心已經從個人與分居的家庭，轉移到公眾的社會。無論在遊戲與工作的時候，合作主義已變成了他們生活上的習慣，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法。

他們從生到死所受整個的訓練，不是要為個人的財物而競爭，却要打算社會全體的幸福。社會的公產已經代替了個人的私蓄。我們最受感動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們和那些在美國享過繁華生活與得過很高工資的人談話時，沒有一個人說歡喜再回到美國去過生活。那邊沒有一個男人或是很少數的女子與兒童不歡喜這種合作團體裏面所有更大

的自由，自動的表白，自我的實現等等的精神價值，而厭惡美國所有更大的個人利益與私人財產。他們覺得美國果然可以給他們許多教訓；但是在俄國地方，他們更能做些社會的活動事業。沒有一個人要利用這個共產農場而偷懶。他們在七年當中祇尋出一個懶惰者，並且立刻就把他驅逐出去。他們把聖經上的教訓——『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已經變成了他們的憲章。

這個共產農場自己也有果子園，牛奶場，乳酪廠，麵粉廠，製造廠，鋸木廠與公共食堂。他們的文化生活以一個大的俱樂部為中心。在這個俱樂部裏有各種電氣的裝置與無線電收音機，每星期映一次電影，演一回戲劇，還有其他娛樂與教育上的設施。

在冬天的時候，全農場的人都在晚上讀書，其辦法好像丹麥的民衆學校。在閱覽室中陳列着一百三十五種日報與雜誌。在這個農場中只有二十七個人是加入共產黨的。

他們的團體是由一個蘇維埃或是每年改選的五個委員所管理的。在他們的青年人中間，有三十二人是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還有四十五人加入少年先鋒的。他們積極的從事服務工作，要想取得共產黨員的資格。在實際上共產黨員並無特殊的權利，却

反增加了服務的責任。

我們在那邊的俱樂部裏一共有三個晚上，並且看見了最有趣味的會議。第一個會議就是要商量招募志願兵，以德俄國爲了中東鐵路問題與中國開戰，他們當場招到了十四個已屆應徵年齡的志願兵。其他還有二十個青年人與婦女，萬一在俄國與中國開戰的時候，也願意加入軍隊中服務。他們所招募的義務工作，如果不分男女；那末無須登記候補人。如果服務的權利爲男子所專有，那恐怕就要發生革命了。我們在第一個晚上，祇聽見一個人說不願意去打仗。他也不願意捐出一個月的薪水來作爲五年計劃的實業公債。於是他們在第二天晚上召集一個會議審問他，並且開除他團員的資格。他們把他的理由好好的考慮一下，就一致通過這種處置他的辦法。

我們在第三天的晚上，看見那邊舉行一個青年同樂會。全農場的人都去赴這個會。有些人對於青年作了懇切的演講以後，就放映活動電影。俄國大多數的影片是由政府供給的。牠們並不爲了賺錢而攝製的，卻是爲了教育人民的思想起見的。我們那時所看見的影片乃是講到『青年人的春天』。其中的故事是要使青年得到知識，

提高人格，而勇於服務。這張影片的結局並不描寫個人的成功，或是個人的幸福，卻要講到全體社會最後的勝利。一切可疑的影片都不准在俄國放映的。范朋克主演的影片在俄國很是通行，但是大多數的美國影片是不合俄國社會的標準。在戲院中所收得的一切券資，百分之四十是屬於工會，百分之三十五屬於教育部，百分之三屬於一個政府的影片公司，只有百分之一是屬於私人的。世界上祇有俄國未曾把影片商業化，却使他變成一種很大的教育計劃。

在這個農場裏的星期日乃是一個休息的日子。我們祇看見兩個六十多歲的婦人仍舊避到鄰近村莊上的禮拜堂裏去拜神。這些共產黨員要創造一種社會服務的新人道教，以代替舊時形式主義的與神祕主義的並且常與智識道德實際生活隔離的宗教。他們現在的新道德律是一種根據於社會福利的合理的個人自由制度。鄉村中一切的婚姻都要登記的。在這種健全的社會化的農村生活中，離婚與姦淫的事情是很少發生的。這個農場中有些人從前在美國的時候很歡喜喝酒的，但是現在大半都把這種習慣戒除了。戒酒的運動已經普及到全國了。這些青年似乎是很健康而有自主能力的。在這

個農場中，各村的男女孩子同在中學裏讀書，而不受管理員與年長者的監督。但是他們在自己組織的青年團體指導之下很能約束自己，因為這種自治的青年團體定了一種自由而嚴厲的道德規律。

我們在一九三〇年再回到俄國去考察的時候，看見上面所說的兩個共產農場已經併合起來。牠們的人數已經增加到一千多了。新的設施也增加了不少。牠們所辦的幾個人工寮卵廠裏面，有一個廠可以一次孵出三千只小鷄。牠們為全國所生產的穀粒，菜蔬，乳酪，牛，羊，豬，鴨，以及各種農產品都是照着中央設計委員會與最高經濟委員會所定的經濟計劃的標準而進行的。牠們那邊沒有機會可以發展無限制的競爭的個人私利主義。

我們在那些以前到美國去過的團員中，看見大多數的人都歡喜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他們覺得在集團化與社會化農業中所得到的主要利益可以使他們的生活得到更大的保障。他們在美國地方看見高貴的工資常常分散於失業與缺乏的時候。他們覺得在美國地方每個俄國人都好像是一個異邦人。在這裏他一定可以得到工作。他從來不

會有失業的危險，並且能夠得到一種豐富的生活，不必依靠一個單獨的僱主。他對於一切的生活狀況都有發言權與取決權。他經過革命以後充滿了新的思想與希望。如果他是個理想主義者，那末他總覺得他是這種大計劃中的一份子並且他所做的工作非但爲他自己，却爲了全體的幸福。照他看來，俄羅斯就是他社會觀念中將來所允許的福地。美國這種私有財產的機會主義是不在他的視線底下的。

在高加索地方的大農場起初是一塊五十萬畝廣闊的未開墾的草原，祇可供牧畜之用，現在却已變成一個穀物製造廠。在第一年中（一九二九年）該處三分之一的地面能出產五萬噸的麥子。你可以在汽車裏駕駛幾個鐘頭，祇見波浪無邊，一片汪洋，並沒有房屋，或樹木遮蓋這種景緻。在中央你可以看見幾所房子是爲安置各種耕種田地的大機器之用。在第一年中有五萬農民去參觀這個大農場牠可指示他們一種模範的耕種方法，並能鼓勵他們去加入集團的農場。他們也漸漸併合起來變成更大更有效能的農場，可以從事大量的生產。

更有效能的農場要算在北高加索羅斯托甫（Rostov）附近頓河（Don River）旁邊

的『蘇維埃第二農場』。這個農場佔有二十七萬五千畝的地面。這個地方在兩年以前還是一塊未經開墾的大草原。現在牠非但是一塊很大的成功的農場，並且也有一個學院以訓練集團農場中新機械化農業的工程師。那邊這個學院名叫『社會主義農業機械工程學院』，裏面共有教授七十八人，學生五百二十五人。

這些國家農場原來要供給政府的穀物，其數量要和富農所出產的相等，大約為一百八十萬噸。但是在明年的時候，這些農場可以出產加倍的數量。他們如今正在替國家做一種偉大的工作，就是要補足肉類，牛乳，牛油，菜蔬，棉花，亞麻的產額，並與穀物托辣斯有同樣的成功。因為集合的生養牲畜的工作必須經過幾年才能發展，所以他們也採用美國的方法以促進養豬的方法。他們建築了幾千的秣草貯藏室與幾萬的秣草溝渠，以備飼養牲畜之用。今年政府已經用了八千五百萬元的資本，以建築豬棚與生養牛豬之用。有一個國家的養牛公司在一九三一年養了三萬頭的牛並且有三千七百萬畝的牧場。還有一個托辣斯公司有五百萬只羊，同時又組織二百五十個豬場。國家農場在去年已經擴充了四倍，而如今共有一千二百萬畝的土地。所以正在開墾的土地

總面積已經增加了二千萬畝。

倫敦經濟週刊 (Economist) 的專員在俄國經過仔細研究整個的農業狀況以後，報告說，在一九三〇年，俄國農業機器的生產額約值一萬萬六千萬元，所以比較歐戰以前大五倍，並且不久就可以超過美國。俄國每年從農業機器所發出來的力可以等於現在正在建築中的工廠裏所發生出來的三百萬匹馬力，並且可以耕種二萬萬畝的土地。這位專家爲了俄國農民的效能，嚴厲的紀律，自然的友誼與同情面受深切的感動。至於上面所說的大農場裏的人員幾乎都是三十以下的青年。他看見他們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裏，好像各樣事情都是可能的。他們現在要想把全部產麥的區域移到亞爾的地方，因爲那邊大概有十萬萬畝的土地可用美國的方法來耕種的。然後他們可以利用現在的產麥區域種植更有價值的穀物。這位年輕的農業部長報告說，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他們可以在半乾燥的區域中多耕種六千萬畝的土地，因爲那邊一個人用了機器，可管理五百畝的土地。

這位英國的專家看見西班牙農民雖然贊成這種工業化與機械化的有益計劃，但是他們

這是要反對集園的農場侵佔了他們社會的，宗教的與家庭的生活。這大概要使老年人與青年人中間發生一種裂痕。做父母的還要想管理他們女兒所收入的工資，並且要保持他們的舊習慣。但是這種集園運動的文化思潮已經使青年人得到一種新的自由與特權。農村中的小孩子現在居然能製造電燈與抽水機賣給本地市場上的花園裏。他們進入學校研習開晚牽引自動車與汽車的技能，並且可以不必到城市中去尋求豐富的社會生活。他們加入識字運動班，組織救火會，並且享受新的公社，無線電話收音機以及電影的快樂生活。這班青年很熱烈的接受這種生活的形式，並且可以在農業革命裏得到一個領袖的地位。

無論青年，老年，與政府，都必須自己讓步，以適應這種新運動。政府不能夠維持集團農場一律平等的主張。他們准許投資的人可以得到五釐的利息。有些人可以佔有他們自己的牛，豬，家禽與菜園。利益的分配都要依照他們工作的數量與性質而定。他們工作的代價也分五等，不過酬報最好的工作都是歸于手段最精練的人。然而這種制度並不產生小資本家，却造成了社會的財富與共同的權利。最能幹的人可以

做領袖，並且他們所做的特殊工作也能得到酬報。但是他們仍舊要維持一種民主主義的平等觀念。一切的危險都是共同負擔的，並且爲社會所擁護的。個人並不怕將來種種的危險。這種制度可以發展個人的自動力與社會的保護權。

一種新的農民階級已在俄羅斯興起來了。革命已經給農民土地與新的自由權。牠有許多地方已經把他從舊的軌道上拉出來。牠使他遭遇一種新思想與新行動的大風潮。無論他接受牠們或是拒絕牠們，他的兒女至少已經把這些舊制度打破了。他們天天從學校裏或是青年同樂會裏把新的建議帶到家裏來。在牠四周有新的標準語與新的影片，新的機關，新的農業方法。他看見這種牽引自動車能夠在他的小農場裏耕他們的很深的犁溝。他看見那些加入集團農場的隣舍能夠得到更大的收成與較善的生活標準。他和他的朋友去參加全村會議。他們被舉爲蘇維埃與別種委員會的職員。他們學習演說並且要爲他們的權利戰爭，這是他們在沙皇治下從來所不敢的。這種改變的程序在那些習性難改的年老耆無論感覺怎樣痛苦，而一種新的曙光已經照臨在俄國了。在這十年當中，農民中間的變動也許要比過去的二千年中所發生的影響還要

大。

世界上有一種最大的試驗如今正在俄國試驗出來了。這種試驗就是要抱一種統一的，合作的與社會的秩序和競爭的，個人主義的與國家主義的制度作一個比較。雙方的獨斷主義者也許要用輕蔑的態度在他們自己正宗派的生活中心偵察這種試驗的可能性。歷史也許可以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或者各方面都可以發現有價值的地方，所以可以互相並存。或者這兩種制度都可作一種最後的貢獻，使我們的經驗得到一種更高尚的綜合。

美國的農業專家約翰遜 (A. A. Johnson) 曾經估計俄國若照現在這樣的進步維持下去，那末在十年當中可以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穀物生產國與輸出國。一個人旅行到俄羅斯中部的大平原與南方的大沃原，就可以看見那邊所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是無限的。然而那邊的居民經過了幾百年的窮乏，不能夠空手去戰勝這些土地。現在這種隱蔽富源的荒野地方已經可以開出玖瑰的花朵來了。我們在大的國家農場與集團農場裏，極目一望，可以看見不斷的土地，充滿了黃金色的麥穗。這種偉大的，擴張很久的工業

化農業的計劃，非但能改變一種窮乏已久的國家中經濟的狀況。並且也能轉移天然的景象以及更重要的農民的心理。

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俄國的農業能很快的變成工業化，社會化，合作化與集團化。這實在是世界上一種最有意義的試驗。

第四章 工業與勞工

俄國最顯著的一種成功是在牠的工業方面。在一九二一年，俄國工業的出品比較以前的時候降低了百分之十七，而農業的產額也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史丹林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裏的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中能夠報告說，蘇俄還不到十年功夫，工業的出品比較戰以前最大的產額已從百分之十七增加到百分一百八十到了一九三一年，牠將超過百分之二百了。在全世界不景氣之中，俄國能不借外債使工業的出品在十年中增加了十倍，那是空前所未有的。牠在工業上所投的資本資產，在十年之內大概每年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蘇俄實在是一個農業國家，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民都是

落後的農民。全國所有的工業比單單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一省中所有的工廠還要少。就是現在俄國也祇有三百三十七萬三千的工廠工人，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二，而美國的工人總數却超過全人口百分之八。所以他們的問題是要使這個落後的國家得以工業化與社會化。

今日的俄羅斯呈現着一種社會化國家的新氣象。那邊美國所謂牟利的動盪幾乎完全消滅了。沒有一個私人能夠合法的從這種國家合作經濟制度中得到利益。一切土地，天然的物產，工業上百分之九十的出品，國外貿易，鐵路，大的銀行以及營業總額十分之九的主有權都已經社會化了。這是從來社會主義史中最大的一種試驗。一切的工業已組織成功幾百個所謂國家的托辣斯。一個國家托辣斯常常經營一定區域內許多的礦場與工廠。牠們都是國家的組織，一切辦法要受最高經濟委員會的指導，但自立為原則，並在可能範圍內要替國家謀利益。這些強大得利的托辣斯是要擁護落後與未發展的工業。世界上只有俄國能把全國的經濟——工業農業與商業，生產，消費與分配——都統轄在一個經濟的總機關底下，這個機關稱為「中央設計委員會」。這不

是一個行政機關，也不是一個管理機關，却是要計劃全國經濟生活的總策略。牠有點好像從前協約國的總部或是威爾遜總統的戰時實業部。這個中央機關為十六個委員所管理，裏面另外有五百多個專員。

牠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使俄國經濟出產達到歐戰以前的狀態，並使國家得以自強。其次牠要用種種一年的與五年的計劃，又藉着全國生產者，消費者，與官員的熱心合作，使經濟上得到相當的成功；因為俄國現在勞資的衝突已經消除而且主有者與附屬的階級也已經打破了。在一個工人國家裏，全體的國民都是工人。中央設計委員會的目的乃是要用最少的人力達到人生必需品與娛樂品的最大產額；同時又要使一切勞動者得到健康，安全，教育，文化上的增進以及衛生的工作狀況。在七千五百三十九萬四千的勞動者中間有六千零六十七萬六千是屬於農業的，而祇有五百二十二萬一千是附于主要的工業的；不過俄國現在城市中全體的工人一共已有一千零八十八萬七千了。

(一) 五年計劃

現在俄國全部的生命都集中在五年計劃方面。這種計劃的目的是要使俄國從一個

普遍的農業國轉化爲一個主要的工業國，並且有一種足以自衛與平衡的國家經濟。這種似乎不可能的轉變是要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與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中間完成的。這種整個的計劃正如同一種審慎的有軌道的工業革命。

在大多數的工業中，對於這種計劃每年所定的目標非但已經達到，而且可以超過了。所以有些在一九三三年所應達到的目標已經在一九三〇年十月裏超過了。這種計劃在起初的時候，有兩方面是沒有達到目的，也許在牠終了以後也不能補足的。在第一年的終了，生產上的消耗照預定的計劃應該減少百分之七，但實際上只減少了百分之五。同時照預定的計劃，勞工的生產力要增加百分之二七·三，而實際上祇增加了百分之二四·五。因爲工人的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而每日平均的工作時間反減少到七·二小時，所以使這些目標更難達到。俄國希望在五年計劃終了的時候農業上的出品大約可以爲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的生產總額百分之一五五，一切的工業出品爲百分之二三六，力的容量爲百分之三二四，力的發動量爲百分之四五二，或爲歐戰以前的標準增加十一倍。這一切計劃都爲俄國單獨所嘗試。牠雖處於全世界經濟衰落的時

期中並且剛從混亂與破產的狀態中舉救出來，但是他並不惜外債或乞助于別國政府。

在第一年中（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有一百多種新的工業上的建築已經成功了。美國的水電廠建築工程師庫柏（Colonel Hugh Cooper）已被俄國請去做總顧問。現在正在建築赫伯河旁邊的大堰與水電廠，經費預定為一百萬元。現在從外國到俄國去工作的人大約有一萬工程師技士與細工。從美國去的差不多有一千人，大半都從德國去的。這條重要的從土耳其斯坦到西比利亞的鐵路其長一千一百哩，能連接南部的產棉區與西比利亞的積穀倉，已經在一九三〇年四月裏完工，比預定的計劃要早一年。這條鐵路的總工程師沙托夫（Shahoff）以前曾在美國做過世界勞工組合（I.W.W.）的會員，因此美國政府監視過他。在俄國他就被立刻認為一個能幹的銀行家與鐵路的建築家。有三個大汽車廠已在建築中。其中一個得着美國福特汽車廠的助力，每年可出十四萬輛汽車。還有一個汽車廠計劃每年可以出到十六萬輛的汽車。有二個大的牽引自動車製造廠計劃每個工廠都可出到五萬輛車子，現在正在建築中。

這種五年計劃對於航空事業也投了五千萬元的資本。俄國已經有了二十條航空路線，共長一萬六千哩，每年的乘客平均有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人。在五年計劃終了的時候，他們希望有一百四十五條航空路線，經過八萬哩路的地面，並且每年可帶乘客三十萬人。這樣可以稍微超過現在美國航空的旅客人數。照作者在俄國空中旅行的經驗看來，很相信他們航空制度的效能漸漸的會增加起來。

極力的擴張電氣事業與製造金屬和機器的工業乃是這種整個計劃的基礎。在這許多方面雖有弱點與困難，但是這種計劃還要預定把生鐵的產額增加。在歐戰以前，俄國能出生鐵四百萬噸。照現定的計劃，到了一九三三年生鐵的產額應增加到一千萬噸。煤的產額比歐戰以前已增加一倍了。火油電氣與農業的工程已經超過預定計劃的標準與修正的數目。這些俄國人很記得列寧的方程式，就是說：「電氣化與蘇維埃相加，等於社會主義」。電力雖是他們愛談的問題，然而工業的發展很快，所需的電力當然要超過現有的電量。在去年農業機器的生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已經五倍於歐戰以前的產額了。

一種新的化學工業已在創立之中，俄國全地都顯然已經到一個大建築的時代——如同大的工廠，堤堰，水電廠，灌溉廠，煤油井，鑛場，國家農場與集團，大農業中心點以及工人的住宅。大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工業出品都要仰給於這些新建建築物。用在建築城市中房屋的資本將近三十億元。這種住宅實在是急需的。莫斯科是世界最擁擠的城市。但是在一切城市中以及許多的新農業中心區如今在建築模範的住宅了。

這種五年計劃已規定新事業的投資總額為三百三十三億元，用在工業的八十五億元，用在農業的為一百二十億元，其餘的錢都用在運輸事業，電氣事業與住宅的建築方面。這種投資的總額現在已經超過了。所以到了五年計劃的末年，恐怕經費的總額達到五百億元。這就是說，要把全國收入的一半用在五年計劃中。這恐怕別個國家所不敢嘗試的。這樣大規模的搜集財富與分配經費，實在可以打破經濟史上空前的紀錄。

俄國的失業工人在一九二九年統計有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的春天已減少到一百零八萬，直等到一九三〇年的終了就沒有了一個登記的失業工人，却在建

業方面，工業方面與農業方面都時有缺乏勞力的呼籲。他們希望五年之內在工業上勞工的生產力能增加百分之一〇，同時工人的工資會增加百分之四十七，而實在的工資也增加百分之七〇·五，或是說可以超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一〇八·九，平均的工作時間爲六·八六小時，或是說比一九一三年時代減少三·〇三小時。他們計劃在五年當中貨品的飢荒就會解除。國家的收入會從一百二十三億元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億元，或是說增加百分之一〇三。這個意思就是要每年增加百分之十，比較美國在增加最大的時期（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中每年也不過增加百分之四·五。

五年計劃也漸漸的使商業成爲社會化。在一九二三年，那時新經濟政策已經實施了兩年，全國百分之九十的零售商業都在私家商人的手中。於是世界上沒有思想的人就說俄羅斯已經不得不拋棄共產主義而回復到資本主義。在蘇俄政府到了強固的時候，這種新興的投資商人就因重稅而消滅了。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中，全國商業的分配如下：私人佔居百分之二三，九，合作社佔居百分之四八，五，而國家佔居百分之三七，六。在第五年中（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他們很希望可以希望下面的百分比：私人

爲三，二，合作社爲五九，二，國家爲三七·六。

要維持實施這種計劃的熱忱已經成功了問題。但是他們的領袖正在設法解決了。

他們相信熱烈的動率在社會主義底下是可能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底下是不可能的。

在俄國地方，重『量』而不重『質』的，講『廣』而不講『深』的熱忱是稱爲『美國主義』(Americanism)。他們以爲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們藉着一種社會主

義的競爭運動，使一個工廠裏的工人和其他工廠裏的工人對於生產額的競爭，於是工作就可加快了。他們這些競爭的熱忱正和美國人在足球時期所發生的情緒一樣；除了

輿論的稱讚以外他們也有獎勵的辦法。但是這種獎品常常屬於團體的，不是屬於個人的。莫斯科的A M O工廠爲了超過牠的標準得到三十七萬五千元獎金，作爲建築模範的工人住宅之用。拉潑斯(Lags)工廠也得到二十五萬元獎金，作爲同樣的用途。

列寧格勒的馬克思工廠得到三十七萬五千元獎金，列寧競場也得到十五萬元，作爲建築工人寄宿舍之用。在伊利赤冶金廠(Ilyich Metallurgical Works)中有六個工人得了一種留學外國的獎學金。

戰時得勝的口號已變成戲劇化而使人民得到一種共同擔負偉大的社會工作的意識以及一種真正管理社會財產與分擔責任的感覺。國家是關於一切願意領導或工作的人。

在這一種情勢底下，政府纔敢擔負這種從未聽聞的五年計劃，而使國家收入得以加倍，工業出品也可以增多三倍。雖然這些數目是不大緊要的，但是比較美國生產力的增加額（通常每年為百分之四）還要多哩。有些專家——如同倫敦經濟週刊的專家

——曾經作見證說，照大體而論，這種五年計劃，雖有許多短處，但已奏了奇功。

然而這種計劃當然有許多錯誤與失敗。牠要逼迫全國的人民從事這種偉大的犧牲的事業，却沒有一個人可以管得到玫瑰花的香味，這種計劃常常要使牠的本身變成一個目的。牠常常爲了『量』的緣故而把『質』的方面犧牲了，這是很可憐的。有些機器因爲裝置的促匆而不能發生功能，生產額不能平均，並且落後的部份妨礙了其他的工作。

這些領袖固然很是熱心，但是那班工人有時要覺得疲乏。這種計劃的成功是需要真正的耐苦。在資本主義底下，經濟的恐慌大概是由于生產過剩。但是俄羅斯已經長

期的受着生產低落的痛苦，所以政府並不覺得發生銷售的問題。全體的人民就好像站立着等候人家賣貨品給他們。貨品的缺乏乃是關於內地市場的迅速增加，新需要品的發展，消費者的組織，以及政府對於生產者與消費者在經濟上的管理。

在這種計劃的第二年，人民的熱度似乎低落一些。在第一年中，生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二三·四，或超過預定的目標百分之二。在第二年，他們並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而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但祇能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但是美國工業上的產額每年也不過增加百分之四。在一九三〇年末了的幾個月當中，實在是一種很危險的動搖時期，所以莫斯科希望『各人都要盡他的本分。』

勞工的活動性也成功了問題，因為有整千整萬的工人要從一種工作換到別種工作，又從一處地方遷到別處地方，以尋求較善的衣食狀況，或更高的工作代價。在俄國工作的美國工程師與技工常常在生活上遇着困難，但是更使他們討厭的就是這些不整飾的方法和俄國工人的缺少訓練，以及在新近匆促所成的工廠裏這些經理和工頭的不負責任，與缺乏威權，以致各樣工作不能有效能的按時做成。然而這班俄國人藉着試驗與

錯誤的方法以及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正在學習種種的教訓。

史丹林與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古皮塞夫（Kubitshev）對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所提出的報告都講到現在的成功，並不注重將來的預想。他們基本的資本在三年中已經加倍了。在全世界恐慌的時期中還有什麼別的國家能夠這樣講呢？這班懶惰的斯拉夫人的勞工生產力在三年當中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要比一九二三年增高百分之五十。在這三年當中，農業的出品已經比歐戰以前的時候增加到百分之一一三。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全年工業上的出品比歐戰以前的產額增加百分之八〇，而在運輸事業方面也增加了百分之一九三。去年出產品的價格，在重要的工業中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在農業方面也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然而沒有多少時候之前，美國的國務卿休士（Hughes）宣稱俄羅斯為一種「經濟的真空」。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說不是真空啊。

在這種計劃的第二年終了（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古皮塞夫能夠報告說，在整個的經濟戰線方面已經有一種驚人的進步。在這個時期中已經超過了預定的目標。所

以能使政府確切說，他們這種五年計劃能在四年中完成。現在俄國比歐戰以前的工業出品已經加倍了。

關於各方面的成債和超過預定目標的情形可以列一張比較表如下：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	煤油	鋼鐵	卷式金屬	電氣工藝品	農樂機器	總產額	工業機器
生產額	100,000,000 噸	10,000,000 噸	18,000,000 噸	3,500,000,000 元	3,500,000,000 元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預定計劃估計量	20,000,000 噸	2,500,000 噸	7,000,000 噸	2,000,000,000 元	3,000,000,000 元	百分之二	百分之四
超過數量百分比	九六	三	九二	三三六	八八	五	六

(二) 工會

俄國的工會自然是世界各國中最大的，也是最強的。在十八世紀中，一切勞工都是強迫的，工人好像是貴族的牛馬，或屬於這些出資購得全村的僱主。在十九世紀中，自由的勞工開始發展了。每日工作的時間是從十二小時至十八小時。

在歐戰以前，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既然准許了警察有管理公司組合之權；於是一切真正的工人組織都被制止，而罷工的事情也要被武力解散。在十月革命的時候，俄國祇有一千五百個工會的會員。現在工會的會員已近一千二百萬，包括百分之九十五的合格的生產工人。他們組織了二十三個大的工業工會，把一個工業中的一切的僱工聯合起來，不分工作上或工能上的區別。這些工會變成了俄國經濟的，政治的與文化的生活中基本的重要份子。集團的訂立契約是憲法上所規定的。所以一切的僱主，無論是國家的或是私人的，都必須承認工會，並且和他們交涉。從另一方面看來，工人的管理工廠已經證明完全失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許工人擅權以統治工廠，或是忽略公眾消費者的利益。但是他們的特權是很多的，如同勞工法的保護；稅則，社會保險，房租，戲院與遊藝場券資的減低；教育機關對於他們和他們子女的優待；假期中可以自由在休養所中休息以及醫藥的免費。一張工會的會員證實在是一種無價之寶，並且祇有會員可以享受工會的一切利益。這是與合作社的情形相同。

工會起初在工廠中組織，每年由全體工人選出一個委員來管理的。牠的責任是要

保護工人的權利；代表他們與私人的或國家的僱主接洽一切的事情；管理工廠中福利的事業，如同育兒所，學校，圖書室，醫院或別種組織；增加生活的能力。並且調節全工廠中各種經濟的利益。工會可用團體的名義和國家的代理人商量工資的規定。工人對於私人的僱主或國家的企業所有罷工的權利是在法律上規定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很少用的，除非別種交涉的方法都已經失敗了。政府常常和這班反對國家托萊斯的工人表同情。國家已設立一個完全的機關可以公平的解決一切的勞資糾紛。如果一種糾紛不能爲工廠裏工場委員會所解決，就可提交一種調解委員會。在這委員會中，雙方代表的人數完全相等，並且也有一個中立的主席。萬一這種糾紛事件又決裂了，那末就可呈交國家的勞資調解部處理，而取得一種最後的解決。他們工作的時間雖然是世界上認爲最短的，但是對於減少工作時間的爭議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在工人中已經成立了一種健全的工會式的民主政治。這種工人階級在經濟上是自由的，不依賴任何個人的。僱主不會任意的解僱或使他們無故失業，因此他們至少能自由發表意思或享受工業上或政府的權利。蘇俄對於自己能作痛快的批評是很開名

的。工會與其黨所出版的新聞紙與報告書都充滿了嚴格批評的話。這種事實可以用幾萬工人與農民寫給日報上號報上等等的信札來證明的。但是一切認為傾覆政府的叛逆運動是和美國同樣不許的，而且他們處置的方法比較還要迅速與嚴酷。

俄國工人的工資仍然是很低，同時生活的程度却比較要高了。作者曾在一九二三年去調查全俄平均的工資，每天祇有二角五分。那時在莫斯科地方的工資每月是從十元到五十元。在一九三〇年蘇聯平均的工資每月租工得三十一元九角，而細工可得四十一元九角五分。在莫斯科地方每月平均的工資為四十六元三角二分，夫妻兩人所得的工資差不多是一樣的。實在的工資已經比一九一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六，其餘還有各種工人福利的事業，其總數等於工資總數的百分之二七·三；如因房租物價的減低與免費的醫藥調理。答格刺士教授（Prof. Paul Douglas）曾經估計美國工人所賺的工資比俄國工人多三倍又三分之一；同時美國工人的生活程度差不多比俄國工人要高三倍半。

蘇俄石炭托辣斯的顧問斯塔爾（C. F. Starr）本是美國斯圖羅特詹姆士與庫克洋行

的工程師。他報告說，在頓河流域的礦工每天所得的工資為六角至二元，工作時間為六至八小時。假期大約有十二天至一個月，工資照付。其他養老金，保險費，福利事業，房租，電燈費，食料的減價，綜計等於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三十七。每個工人做了五天工就可以有一天休息。每年有七十天的休息。除了這些利益以外，每個工人在一年中平均可得六百元的撫恤金。俄國工人的起居飲食常常還是舊式的。但是每個工人很留意他們的生活狀況，或是要勉力把他提高起來。俄國工人因五年計劃而受的逼迫與犧牲是單獨的個人主義的盎格羅薩克森工人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他們一方面訴苦，一方面卻慢慢的忍耐下去了。

俄國要聘請好像斯塔爾那樣的專家實在是很費錢的。他們很聰明的聘請美國大北鐵路局局長 塔什 (Tatsh Budd) 為俄國運輸制度的專門顧問，和其他幾百的美國工程師與技士。俄國在工業農業方面常常很肯切心領教別人的。

(三) 社會福利事業

俄國在保護勞工的律法與社會保險方面大概可以為全世界之冠，雖然保險費的總數

還不及德國。在一九一三年工人在通常的日子工作時間平均爲九·九。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二年的勞工法規定每天工作時間至多爲八小時。現在工人平均的工作時間已減少到七·二小時。俄國已廢棄七日中有一日休息的制度，却規定五日中有一天休息的『不斷工作週』。現在俄國每一個工人在五天中可以休息一天或是在一個月中可以休息六天。工人的休息是輪流的，好使工作永不停止。然而這種改革是不大普及，因爲工人總歡喜和他們的朋友有同樣的休假日子。

俄國勞工法的特點是在于牠的普遍性。牠能適用於一切企業中的一切勞工形式。僱用工人的事情是關乎國家的。政府的勞工介紹所應負責爲各人尋找相當的工作。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中，雖然有許多農村地方很需要勞工，可是失業工人的數目還有一百零八萬零九百人。大約有一半的失業工人都得到國家保險基金的補助。他們每月所得到的津貼爲六元至十五元，大概依照他們的技能和以前的薪工而定。另外還減少他們的房租或給他們其他的利益。然而這種標準比英國或德國還要低。童工在美國許多省份裏還是准許的。但在俄國，凡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都被禁止作工的；凡在十

四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祇准每天做四小時的工作；至于十六歲至十八歲的祇准做六小時的工作。

女工在舊俄羅斯時代好像是負重擔的畜牲。但是現在却受特別的保護，並且通常也不准被人僱用做夜工與其他危險的工作。一切懷孕的女工在生產前後都有八個星期的休息而工資是完全照付的。另外對於女工在起切七個月到九個月的育兒時期也有特別津貼。

公衆的育兒所是爲女工的小孩子而設立的。這是俄國人生活中很可注意的一點。這種育兒所非但設立在工廠裏，並且在集團農民，公園與公衆遊戲場裏都有的。在落後的國家裏能用這樣科學的與一致的方法來養育兒童實在很可令人注意的。

在俄國的社會組織中有一種所謂「紅室」乃是工廠或俱樂部中一個房間或是房間的一隅，裏面陳列着報章，雜誌和書籍，又設立種種的研究班，以推廣文化的工作。在這些房間裏或客堂的一隅中，常有許多團體在聚會，以討論各種重要的問題。在離開城市很遠的荒僻地方也設立固定的或遊行的圖書館，以及各種的電影。各種爲了考

察，遊覽和參觀博物院的路費也可以打特別折扣的。單在莫斯科一處地方已有五十個博物院。其中有些是有高等教育與文化的價值，還有別的是帶着宣傳作用的。擴大成人教育與減少不識字人數的活動事業是很可令人注意的。現在世界上沒有別的国家能有這樣完全的工人教育制度。

各種壁報是由工人團體編輯的。現在俄國大約有二十五萬的工人當日報和壁報的通訊員和投稿員。他們常常提出了許多建議，發洩他們的怨氣。他們這種嚴厲的批評很可以促進工人運動的民主主義化。

俄國社會保險的立法有許多地方對於工人的利益比任何別的国家要多些。十分之九的工人已經保險了。這種社會保險是由工會勞工部與工人自己管理的。在別的国家裏，工人通常要從工資中捐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作為保險費。但在蘇俄地方，工人是不必化錢的，他們的保險費大約為工資的百分之十四，可是並不在工資中扣除的；而其餘大多數的国家對於工人的保險費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關於女工與童工的利益，醫藥的施診，暫時或永久的無力工作，失業，殘廢老年，住宅，死亡與喪葬等有

特別大量的規定。這可表明低的工資大半已爲別的東西所抵補：如同工作的更加穩固；住宅與食物的減價；娛樂文化的特權；養老金以及其他種種零碎的規定。這種制度中並無私人積蓄的餘地，可以爲未知的將來有所打算。一切的危險是由社會的全體分任擔當的，並不由個人負責的。美國的工人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資，但他在失業，老年，疾病等等方面很少保障。俄國工人的工資雖低，却很穩固。政府已經用了許多經費組織幾百個的勞工介紹所，使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相當的工作。

工人的假期每年至少有兩個星期，而工資可以預支的。以前貴族的王宮與別墅，現在已經變成工人和他們子弟的療養院，休息所，醫院與育兒所。在以前貴族的王宮與附近的公園裏，一個人可以看見幾千的工人在夏季中常常來往居住。遊歷的人可以看見他們在草地上曬太陽，在樹底下的吊牀上臥息，在河中游泳，或在野地方遊戲。

我們很希奇的看見以前各種皇宮，大廈，遊憩娛樂的地方已經爲了大多數窮乏的工人——兒童，婦女，男子，病人，老年人與殘廢者——而變成社會化了。將近一百萬的工人每年可以在這些貴族的大房屋中休養、並不化錢。這些貴族是一種很少的特殊階

級，從前曾經執財富的牛耳，最好的土地與神聖俄羅斯的特殊權利。

俄國遍地都是俱樂部，教育上與娛樂上的中心點。這些機關從來不為政府所統

治，却為工人自己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來管理的。一切主要的工廠或是幾個工廠聯合起來共同組織俱樂部，使牠們的工人在空閒時間到那邊去讀書，研究與遊戲。在俱樂部裏有演講會，同樂會，研究班，會食堂，彈子房，遊戲室，圖書館，閱報室，有時還有健身房，運動場與兒童遊戲室。大多數的俱樂部都設備無線電收音機與影戲場。

在正午，下午與晚間，這些房間是很擁擠的。在夏天的時候，也有他們的公園，運動場與江河中的船上俱樂部。俄國現在已經有七千多個運動場。在莫斯科地方有九十多個兒童運動場，在夏季每夜都開放的。

我們不妨去參觀莫斯科的文化遊藝公園。每個夏天的下午與晚上一個人可以在那裏看見十萬工人，在特別的節期中可以在那裏看到三十萬工人。工人的子女可由公園中按照年齡而組織的各部份，用科學的方法來管理，但都免費的。我們去參觀過那邊的圖書館，閱報室與各種教育的展覽品。有幾十個人都在下棋。我們也去加入過免

費的外國語言班。在大的運動場上，我們看見有十多種熟悉的運動，都在進行。那邊有三十個美國式的隊球場是互相連接的。這些青年人帶嘴說，『那邊走着的都是美國人。快來和我們決一個勝負！』我們答應了他們的挑戰。結查我們路負幾分。於是觀衆大家拍手呼喊。還有一班青年女子，也要向我們挑戰，好像她們一定會得勝的。所以在俄國地方，他們對於外國人雖不十分注意的，但是在待遇方面，比別個國家更有好意的表示。

我們在江上看見各種工會都有牠的賽船會。船的形式各種都有——八槳的，四槳的或是單員殼狀的——以供男女孩子與一切工人比賽之用。運動與體操的普及，如同英美地方一樣。在男女之間有一種同等友誼的精神。我們在別的國家裏沒有看見過更多感覺或更少嬌態的女子。

我們並不看見一對一對的夫妻圍成個圈在跳舞。但在一大塊的空曠地方，看見大批的青年人與老年人在跳土風舞。我們難以使我們的雙足停不動，因為這班和藹可親的羣衆常常在音樂節拍當中與領袖指導之下輪流着練習這種衛生的快活的娛樂。這種

情景似乎已得到英國中古時代人民快樂的精神。

有一天晚上，全國工會裏的工人正在自願的表決把一天的薪水捐出來，以促進這種五年計劃。我們看見三十萬工人在公園裏舉行遊藝會，那面有歌劇，戲劇，跳舞，馬戲或電影，情形甚為熱鬧。這好像一個大的康耐島（Coney Island），加上了教育的機關與文化遊藝的設施。這些地方都是晝夜開放着，並沒有一點商業化，因為那邊的市政府每年要消耗幾百萬的經費，打算人民的利益。空閒，休息，娛樂與特權都已經社會化了。這是別處地方所未有的。

（四）合作運動

俄國的合作運動是世界上最強固的。牠所有的會社數目比世界上其他各國合併起來還要多。在早年的合作運動很受沙皇政府的反對，而從來沒有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蘇俄政府却要把牠權力的重心放在這種運動上，並且在實際上已經統治了牠。現在俄國的合作社有三種形式，就是：消費合作社，農業合作社，和手工業合作社。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共計四千二百十九萬九千人，農業合作社共有二

千七百萬會員，其中大部份的人也屬於消費合作社的。農民手工業合作社共有一百七十六萬社員，而住宅合作社也總計有七十六萬二千社員。因為農村裏的人很快的要想遷移到城市中，所以這些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在集合建築與住宅的管理。除了百分之六·七的市民與百分之三·九的農民沒有選舉權以外，全國的家庭幾乎都是合作社的社員。

消費合作社共主管十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八間商店。這些合作商店在各地，各區，都有聯絡，並且全國也有個中央機關，為蘇聯境內的總管理處。牠們每年的總賣出額超過一百十億元。這個數目比美國政府每年的用費或是美國鋼鐵公司的營業要大好幾倍。這些合作社經理俄國百分之五十五的批發商業；百分之六十四的零售商業，百分之十的國外貿易。牠們買進俄國三分之一的穀物；百分之九的牛油；而經售百分之六十的棉織品。這些消費合作社要把工業的出品供給農村的消費者，又將農業的出品供給城市的居民，並且牠們也販賣農民的穀物。牠們的營業差不多完全關於人生的必需品。有時合作社是鄉間唯一的商店。同時在一個大城市却有幾百的合作商店。牠

們祇賺百分之二的利益，並且變成了一種極大的社會化企業。

英國與歐洲大多數國家中的合作社都依照洛芝得爾（Rochnale）的辦法就是把合作社中的貨物照市價出賣，而使購買者將來得到較大的紅利。但是俄國的合作社幾乎照進本出售，並且要比私人商店的價錢減低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國家給他們很大的權力與利益，並且牠們又將這權力轉移給牠們的社員。所以在物品稀少的時候，只有合作社的社員能得到一些供給品。俄國將來的商業大概是屬於牠們的。在過去的四年中牠們的售出總額已經四倍了。國家的商業組織已經加倍了。同時私人的企業却漸漸的減少了——因為私人的企業在批發和零售方面都要重重的納稅。在一九二三年，列甯曾經說：『現在給我們的唯一工作就是要得到一種真正的全民合作聯盟』。合作事業又為政府，共產黨與工會所提倡。這些合作社也辦理一種很普遍的文化事業。

農業合作社要想做到丹麥各種合作社所有的成績，可是牠們如今還沒有像丹麥那樣的進步與有效。牠們經售農民的出品，供給農業機器與肥料，並且要想增加生產的能力與改良耕種的方法。牠的中央機關稱爲『農村合作聯合會』（Selstansovus）。牠

們經售五分之一的農業機器，與販賣百分之六·五的農人生產品。他們舉辦學校，並聘請了一千五百多個科學的農業專家，以教導農民。他們經理四千多個種子選購處與八千多個機器出租處。他們已經租出了好幾千牽引自動機。

在一九三〇年，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八個手工業合作社計有一百七十六萬社員。他們供給手工業的社員種種的原料，並且販賣他們的出品。他們也發行日報，雜誌，書籍與小冊子。這些合作社在使農民與手工業者變成社會化的方面，漸漸的佔居重要的地位。牠也能幫助蘇俄的人民發展合作的精神。

(五) 國外貿易與投資政策

俄國的國外貿易既集中在政府的手中，那末就能把大量的貨品輸出國外，造成了許多工業中很重要的情勢。俄國有許多的煤油井，所以有權減低汽油市場上的價格。牠也能同樣把木材，木質纖維原料與火柴的價錢減低。一九三〇年的收成能夠使牠把穀物輸出到別的國家裏去。我們必須記得俄國的農業剛在經過機械化與工業化的程序，所以牠的來源與一致的動作在將來不可比擬的。在德國地方，同業工會已經在集中

買賣方面顯出很大的效力。英國的屬地已經製造了許多可以輸出國外的高貴木板。

英國政府對於石炭方面也有同樣的進步。日本政府在棉花商業方面的行動已經使郎

卡邑（Lancashire）受着極大的打擊。日本的國外貿易如果沒有政府的扶助，那末牠

的輸出量也許要減少一半了。但是這些事情和蘇維埃蒸蒸日上之權力比較起來，實在是另辟不完全的。

俄國的中央集權制使每種商業能夠和全世界交易如同一個整個顧客或買主，並且把一種商業上的策略和其他的商業政策聯合起來。雖然常要發生管理專橫的危險，但是也有聯合的力量。這可使俄國得到一種別個國家所沒有的權力。這也是經濟上的利器，可用以贊助與反對任何的國家。

美國與歐洲太願虛俄國的投資政策，可使物價低落而危害於他們的農民製造家。

因為俄國的輸出品在以後的十年中勢必漸漸的增加，所以我們不妨考慮這種事實的真相。

我們對於投資政策匆促下一個判斷以前，有幾樣事情是必須記在心頭的。第一，

我們不該太輕信俄國自己的宣傳或別人反宣傳。這種反宣傳常常要使人發生驚訝，而充滿偏見。我們必須記得投資政策不是一種新產生的事情。他在大英百科全書中也佔有相當的地位。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美國的投資政策也曾經引起歐洲人的怨言。

投資政策雖然能使某種商業受着不利與損失，但是在他方面，穀物與麵包價錢的低落也許對於消費者很有利益的。

俄國要在世界市場衰落的時候利用投資政策以收買賤價的貨品，其唯一的原因不外乎牠對於資本的急需。我們若用客觀的態度去考察俄國商業的真情，實在不能使我們發生驚訝的。俄羅斯不像美國那樣的一個商業國家，因為牠國外貿易的總額也不及全世界的總額百分之二。牠對於美國的總輸出額遠不及牠在美國的購買量。因為蘇俄在一九三〇年度對於美國的輸出額只值三千二百萬元，但是牠在美國的購買額共計一萬四千五百萬元。當俄國被人責罵利用投資政策的六個月中，牠在美國的購買額要比牠的輸出額多六倍半。在一九三〇年的上半年當中，蘇聯是美國最好的國外顧主中第六位，但在一九二九年俄國只居第十六位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以前的一年中，俄國與

美國的貿易輸入量與輸出量的差數爲三十與一之比。

美國人說俄國把大量的穀物，石炭，木料，木質纖維，銻質與其他貨品用低價出賣，以敗壞美國的實業。在同一個時候，一方面有人說俄國的商業完全崩潰，而他方面卻有人報告他大量的投資政策。牠在歐戰以前，穀物的輸出額每年平均大約有一千一百萬噸。但在去年一年中牠的輸出額也不到這種數目的三分之一。在夏季中，許多蘇維埃新聞紙對於穀物收成的進步都有正確的正式報告。

關於販賣麥子問題是由全俄織物原料公司經理，向芝加哥的穀物市場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日做推銷工作。結果在一萬八千萬蒲式耳的麥子中祇賣去七百七十六萬五千蒲式耳。坎拿大已經預先把麥子賣出，以保護牠自己的麥子，不致受將來世界上麥子過剩而降低賣價的損失。第斯 (Edward T. Dies) 在他所做的『小麥營業』 (Wheat Pic) 裏說：『預先賣出是一種保險的簡單方法。這是一種商業價格的保險，以保護穀物的賣主不致受價格漲落的損失。這可使穀物在實際上的交易變成一種安全的商業』。小麥的市價和許多別的貨品在一年多以來常常在跌落的狀態中。所以全俄

糧物公司總不願再把牠的價錢降低。該公司預先賣去小麥的價額也不到七百萬元。但牠在美國購買價值二萬六千二百萬元的棉花，五百萬元的糖，二百五十萬元的機器。這於美國的商人與農民都有利益的。

依據美國國家市銀行的報告書（一九三〇年十月）說，『各人似乎都已經忘記坎拿大人在芝加哥市場上已經賣空，其理由完全是因為芝加哥是世界上最大的現買先賣的小麥市場。……芝加哥市場上現買先賣的麥子難得會運到芝加哥的。……這個時期正當俄國政府從國家農場或其他農民收取穀物的時候，因此不妨把現有的麥子立即賣出，以保護將來市價不致低落。……芝加哥市場上預先賣出的麥子都要依照穀物商業普通習慣。……空頭的賣出是一種判斷營業的舉動，因為許多人賣出買進就造成不斷的商業。照大體而論，我們不必懷疑牠們可以互相對銷的。總之牠們能擴大市場，對於生產者是很有利益的。

『我們不能懷疑關於俄國賣空的宣傳能使小麥的市價受着不利的影響。我們很有趣味的注意那些主張用嚴厲的方法制止外國的麥子投賣在美國的人中間，也有極端贊成

用各種計劃把美國的生產品投賣到外國市場上去的。……我們很懷疑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會願意把他們的生產品低價出售。……我們懷疑他們要把貨物賤賣，使資本主義的國家得以富足。他們很需要他們不能生產的貨品，並且用種種的方法來得到他們。

所以我們對於他們將在組織發達而變成強國有效與充實的時候所做的舉動，也沒有什麼驚慌。」

況且美國所謂從蘇維埃輸入『大量』的煤總計也不過等于百分之一的美國產煤總額中十分之一。其中有許多特等的白煤在賣給美國商家的時候，其價格超過美國固有的白煤之上。

美國從俄國輸入的木料與木質纖維原料祇等于美國對於這些生產品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一，也不過等于美國伐木公司中的木料的價值百分之一中的十分之一。美國的造紙廠所輸入的木質纖維原料要超過他本國自有的原料百分之五十，並且也恐怕受着坎拿大專利的危險。從蘇俄輸入的木質纖維數量很少，而價格常常比從坎拿大來的要高。但是他要為美國消費者打破坎拿大的專利和減低原料的市價。

美國鋼鐵工業所需要的鐵塊，在過去五十年中大都仰給于俄國的契士里（Chiat）鑛場。美國的錳鐵祇能供給需要額的百分之六·九五。俄國却能供給百分之四十七，而所納的捐稅為百分之七十四。蘇維埃的鑛質價格很高，決不是一種投資政策。關於從俄國輸入的火柴與糖方面的情形，也是相同的。

在美國地方常常有許多消息說，各種木料與木質纖維原料輸入品都是俄國的囚犯或強迫苦工的生產品。但是俄國的工人通常是由公家的職業介紹所代僱的，並且工會對於這種介紹所也有直接的干涉權。在冬季中政府是僱用短期工作的農民到北方沿江一帶分散的樹林中去做工。這些分散到各處去做工的人決不能完全用囚犯充當的。現在俄國作苦工的囚犯的總數是很小。也不及俄國全國工作力量的百分之一。牠為了一小部份的輸出營業是毋須強迫犯人作工的。有些上等的美國進口商曾經到俄國去參觀他們進口貨來源的工場。他們可以宣誓否認俄國強迫囚犯作工的情形。況且在那邊還有一千的美國工程師與技工可以見證他們的方法。

但是有許多人不願意知道這種事件的真相。這實在是很不幸的事。荒誕的謠言

與錯誤的恐怖常常可以得到一種使人輕信的奇怪路徑；如同在歐戰時代德國對於德國人的宣傳一樣。德國人到處好像超人的魔鬼。他們能夠做任何事情。他們能夠使用無限的金錢。現在對於俄國也有人傳播同樣的驚人消息以引起全世界的恐怖與輕信。有少數關心的人，因為得到不可靠的宣傳消息就發生強烈的成見，達到戰時的狂熱症。

作者個人願意做個見證說，除了俄國的政治偵探對於政治上與宗教上的犯人常要發生壓迫的事情外，俄國的刑罰制度在大體上說來，也許是世界一種最新式的，合理的與人道的制度。整個的刑罰計劃不是根據于辯護的原則，却是根據於救贖的原則。在可能與必要的時候，我們最好組織一個考察團到俄國去實地研究監獄中的待遇與囚犯作苦工的情形。

第五章 共產黨共產政府與共產國際

(一) 共產黨

這種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專政藉着希奇的三頭政治——就是共產黨，蘇維埃政府與

第三國際——要想把牠的勢力從一種內部全能的統治團體漸漸的擴大，到後來會造成一種世界的共產社會。在共產黨的黨綱裏說：『本黨組織的主要原則是依據民主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這個『民主主義』的名辭所包含的意義就是說，在理論上可以表明這種有組織而相連的無產階級工人的意志，在實際上也可以表明俄國共產黨所托付的權力。現在俄國的共產黨連牠的預備黨員在內統計黨員有一百八十五萬二千零九十八。

在這些黨員下面還有二百四十六萬六千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與三百三十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個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將來共產黨中大多數的黨員都是從這兩種青年組織裏與工會中招募出來，訓練成功的。這種團體常常要經過澄清的手續，正如同每年要把葡萄樹修剪一次，這樣可以限制黨員的數目，並使他們個個都是活動的忠實同志而繼續不斷的把死的樹枝除去。

共產黨的基礎是起于每個村莊，工廠或團體裏三個以上的會員結合而成的細胞組織，又從五萬個區分部一直向上而組成一個中央指導的機關，稱為政治部。所以黨的中央機關是從一個很小的團體中取得權力的。這種全能的政治部有九個部員。其中最有力

力的就是共產黨的總書記史丹林。這個黨可以影響並且統治蘇維埃政府，紅色工會國

際以及共產國際或稱第三國際。全部的計劃專注在一種有權力與效能的中央機關，然而也要常常和民衆的輿論接觸。大多數的問題都可以提出全體黨員會中解決的，在每

屆大會中有一種詳細的討論，一直可以普及到下面的各個細胞組織與地方蘇維埃團體。

在黨的整個組織中，個人是看得很輕的。一切可以代表黨的主義，世界的工人與社會的革命是最重要的。個人幾乎是等於零，直等到革命及其組織的社會單位放在他面前的時候，才使他發生意義。共產黨黨員與耶穌會教士的組織很有相似的地方。

每個耶穌會教士對於他的上級人員是要絕對服從的；同時每個共產黨員與黨部也要對於上一級的黨部負完全責任的。這兩種組織都相信目的可以辯正方法，並且個人和一種公眾的大目的或是對於他們發生意義的特選階級比較起來是算不得什麼的。他們都是極端不肯容忍的。他國都是獨斷獨行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懷疑他們的智慧與誠懇。

我們要明白共產黨員怎樣能造成一種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同時却能根據於民主主義的討論與農工的組織，就必須回溯他們的歷史。激烈的思想已經在十九世紀的六十

年代從外國傳播到俄國的學生界中；但是這些知識階級不能夠接觸個人主義的農民。

在一八七二年以後，第一次由工人組織而成的小團體就為俄國開闢了一條勞工運動的途徑，但是後來這種工人組織就殺沙皇的警察用野蠻的手段來解散了。在一八九八年，有九個人結成一個團體，代表六個機關，組織了一個『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列寧擬了一種中央集權的計劃，並且在一九〇〇年組織了一種勞動黨的機關報，稱為『火星』（Starik）這粒火星就燃燒着俄國各地的革命領袖，以及逃亡到歐洲去的許多俄國人。

在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時候，列寧就做了多數派或稱『布爾塞維克』的領袖，主張一種嚴格的中央集權制，與一種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中無產階級專政的計劃，還要拒絕和中產階級的自由黨合作——這是少數派或稱『孟塞維克』的主張。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發生第二次革命的時候，這種小小的堅決的團體就變成了俄國的新領袖。他們中間有幾個人相信他們的勢力不能維持到六個月以後，並且一直有人以為這個政府是不能夠持久的。然而各國的干涉反能堅固一切的忠實分子，擁護俄國，以反抗外國的侵略，並且他們藉着聰明與武力的政策造成現在世界上有一種最有力的與最穩固的政府。

在一九二三年，他們就放棄了俄羅斯的國名，採用了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俄羅斯的本部祇變成了這些自治共和國的中心。其他的國家後來可以加進去，成功一個世界的組織。共產黨的組織與蘇維埃政府的本身是平行的。黨的大會與牠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集中在黨內最有力的兩部，以管理政治與組織的事情。政治部有九個部員。組織部有十二個部員，五個書記，史丹林以總書記的資格可以兼兩部的部員。他的權力是很大的。他是全國受薪的工作人員中的主腦。他與黨的各種組織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能夠獎勵他的信從者或是處罰他的仇敵。他也許可以升降主要的官員。他也許可以放逐像特羅茨基那樣的仇敵。總之，他必須預先知道什麼政策是黨中的幹部與全國勞農階級所贊成的。他必定常常要有黨中的多數做他的後盾。他的權力就是在此。

共產黨常常要用敏捷的手段並不以武力的政策來到處得到統治的實力。所以史丹林曾經說，「黨是好像政府的頭盔」。我們要想像他的權力，不妨拿美國的政黨來做個比方。這一種政黨應當包括一切願望在政治的，工業的，或社會的生活中做領袖的

人。牠也包括一切在政治，商會，婦女團體，工會以及學生與青年團體中的領袖。這一個黨應當成功一種擴大的民主主義的團體，可以使人民自由討論，創造公眾的輿論；然而還不失為一種很有中央集權與實施能力的團體，祇要各種計劃已經為幹部中大多數人所贊同。這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在各處地方的黨員都要佔居重要的地位。這樣你就可以想見俄國共產黨的地位與勢力了。

讀我們常常記得這種組織並不產生在一種很發達的，文明的，有政治思想的，西方的民主政治當中，也沒有經過長時期博得自由的傳統。牠在統治一種落後的，未發展的，原始的，農業的半東方民族，而這種民族又慣于忍受幾百年的強暴政治，易使生活得到簡單化，標準化，組織化，統一化。所以在西歐或美國的人民看來，簡直是不能設想的。除了少數的領袖以外，這種最好的共產黨員真如同最好的兵士那樣的不加思索而絕對服從的。在這等人當中，生活愈趨愈簡單，並且可以被一種好像亞洲回教的大運動所統一。因為我們很難了解俄羅斯與這些民主政體的國家有完全不同的地方就引起西方的人誤會這樣的狄克推多制是不能耐久的，並且使俄國的領袖感覺在別個國

家中快要發生革命。這兩方面好像南北兩極，不能互相了解的。

共產黨分成幾千幾萬的細胞組織盤踞在工廠，村莊，工會，合作社等等裏面，以指導這些團體都爲工人與農民自己謀利益。他們有很好的思想，實際的教育，辦事的經驗與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以實施他們的計劃。一個政治頭腦或是一種腐敗政黨所用的政策大概是自私自利的，並且利用羣衆，以取得他們的勢力和利潤。但是這種政黨常常是由工人所享有與治理的；無論牠的組織怎樣集中，還能嚴格的排斥個人的私利，並且把那些悖叛工人們主義的欺騙者處以死刑。在這種精神中他們就很坦白的承認了這種統治的政策。

其實我們已經看出共產黨與俄國境內最有勢力的統治團體不是全國大會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是政治部裏面九個部員與八個候補員結合而成的小團體。他們常常聚會。他們的決議案是黨所必須遵守的。他們也大半可以決定政府，工會與第三國際的政策。我們爲了明瞭這種組織起見，不妨畫一個三角形，以政治部共產黨爲頂點，劃一條線表明牠的勢力達到蘇維埃政府，另作一條線表明牠的勢力擴張到第三國際。

政治部是最高的幹部，控有一切權力的。同時這種中央設計委員會不過是一種經濟上測定方向的塔，所以僅有一種頭問的能力，並無執行的權柄。

(二) 蘇維埃政府

『蘇維埃』祇不過是一種委員會。這個蘇維埃制度不是從共產黨創造出來的。

牠發生于一九〇五年工廠中與軍隊裏所組織的許多臨時罷工委員會。牠們在那時雖被壓平，但在十月革命以前又從新復活起來。『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就變成了共產黨員的口號。牠也變成這種新勞農政府組織上的委員制。在俄國地方除了那些競賽公權者以外（大約為全人口百分之五）凡在十八歲以上的人都有選舉權。蘇維埃中的代表是依據職業的，不是按着區域的。每個工廠，團體，城市或鄉村都有牠的蘇維埃。

蘇維埃政府的組織正如同黨的組織一樣，一步一步的從下而民主主義的基礎一直好像角錐體似的建築到上面最高的政治部與書記部。這種建築在角錐體基線上的最有權力的機關就是這個能代表工人與農民的『全俄蘇維埃大會』。這種代表大會大概包括一千五百個代表，至少在二年內舉行一次。在離開兩個大會中間的時候，最高的權力是

托付於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好像別個國家裏的參眾兩議院。蘇聯的行政委員會包括三百七十一個委員，都由大會裏從七個共和國裏的代表中選出來的。還有一種民族委員會，包括一百三十九個委員，是由各個自治共和國與區域內的代表組織而成的。這種中央委員會和以上的兩個委員會決定蘇聯在政治上的與經濟上的政策的普通原則。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休會期內，這種由二十一個委員組成的主席團就是最高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蘇俄的人民委員會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與指導機關。

憲法上規定蘇俄政府還可以設立一部，叫做『政治探訪局』或稱為『該貝烏』(g p u)這是一種秘密的工作，其目的要制止反革命運動與經濟上的閒騰與怠工。在起初的時候，蘇俄有一種特別委員會的組織，稱為『赤下』(Cheka)。牠的惡名聲如同法國革命恐怖時代的特別裁判所一樣，『赤下』與牠所引起的惡感與恐怖都在一九二二年取消，而同時另外組織了一種更嚴格與合法的『該貝烏』。牠雖受種種的限制，但仍舊可算世界上最有力的與最可怕的警察組織。史丹林說牠是『蘇維埃政府的懲罰機關，正如同法國革命時代的公衆治安委員會。牠代表一種好像軍事政治的法庭，以保

護革命，而防禦反革命的中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危害。」這種政治探訪局設有武裝或便衣的探員，監獄與秘密法庭。牠有權拘捕無論什麼人，但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通知最高法庭的檢察長，並且在一個月以內審判他的罪案。在這種特別法庭裏，被審問的人不准和別人商議，也不准請證人來替自己辯護。這種審問是很秘密的。

政治探訪局是一種保護「階級正義」的機關。我們要明白牠的性質，祇要設想一種戰爭的精神病狀態，如同在法國革命前後的景象一樣。那時法國這班領袖恐怕他的舊仇敵波旁貴族的壓迫，並且相信他們是為社會的公義戰爭，而全世界似乎都在反對他們，我們又可以設想同樣的戰爭狂熱病狀態中，美國政府的監察長判麥（Palmer）會出了拘票捉拿六千五百個異族人，並且用了許多煽動者的代理人去追捕他們。所以前國務卿休士也承認說，這種舉動「帶着最壞的殘暴政治的意味。」

蘇推埃政府顯然和別的國家有同樣的權利去保護他自己不致為別人所危害。經過詳細的研究，我們也許會看到他這種公共的刑罰制度是世界上最進步最新式，而有救贖性的。政治探訪局所管理的青年反省院與自新的拘留地，比任何國家要合乎科學些，

並且很講人道而有效驗。但是我們同想到他們對待舊時的知識階級——其中有些也會經做過俄國革命的領袖——或是政治探訪局的祕密法庭在審問政治犯與宗教犯的時候；那就没有一種比喩，解釋或原諒可以使世界上這些注重容忍政策與公民自由權的民主主義國家的予以贊成，除非他們這種中世紀的『階級公義』的機關——有時也發生不公道的事情——能夠把牠的行動明白宣佈出來，正如同現在先進的文明國家中所做的一樣。

一種恐怖的狀態也許可以統治了俄羅斯，並且爲少數人專權底下的無思想的民衆所容許。但是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下去，總要引起全世界的反感。

俄國的紅軍與海軍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一共有五十六萬二千軍官與兵士。紅軍是一種維護無產者革命的階級工具。牠是從工人階級中募集而成的團體。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爲農民，百分之十五爲工人。但是對於那些不和政府表同情的非無產階級中的人，都在排斥之列。在這種軍隊中，對於共產黨公民的訓練和兵式體操是一樣注重。牠的忠誠和戰鬥力遠超出於沙皇時代的舊式軍隊。牠原來是一種防禦的軍隊以適應蘇維埃整個的國際政策。牠有強固的步兵與精銳的騎兵，但是在砲兵隊，輜重

隊，航空隊以及其他技能上的兵隊是很弱的。海軍是素來忽略的，甚至還不及德國或西班牙的海軍。

蘇聯是要注全力于經濟上的發展，並不在軍事上的發展。你看蘇俄那些穿制服的鄉下少年人，一點沒有像歐洲軍隊中兵士的神氣。這一種軍隊在退却的時候，好像是很有力的；但是軍備並不適當，而在積極作戰的方面也沒有訓練。他們在必要的時候，在離開敵人六千哩路遠的地方也會退却；然後從新再上去奪回他們所失掉的土地。如今再沒有希望去侵掠與征服俄羅斯，如同要征服美國或坎拿大一樣。每一個國家大概到了末了，總不會受這種軍事上攻擊的損害。

講到俄要積極的用兵力去侵掠帝國主義的國家也是和整個的馬克思制度相違悖的。但是碰到了外國的侵略或干涉，那末非但全國的軍隊而且全國的人民都要起來保護他們的政府。況且這種外國的干涉常要發生殘暴的事情，所以階級戰爭勢必發生出來。俄國的共產黨員不贊成一切國際的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但是他們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他們相信每個國家裏面發生階級鬥爭。如果時機成熟，每個國家都應當跟從俄

國的榜樣。

俄國的軍隊祇足以保護牠的政策。我們若把俄羅斯的兵力與工業的計劃比較起來，就可以知道牠所注重的地方。牠不是注重軍事的勢力，却注重經濟的勢力。

兵力比較表

國別	法蘭西	意大利	波蘭	羅馬尼亞	蘇聯
人口總數	37,000,000	31,000,000	22,625,000	17,500,000	130,000,000
軍隊人數	2,100,000	3,000,000	1,400,000	3,100,000	25,000,000
兵士千分比	五六	八	九	一八	三·五

在美國地方，國家預算中百分之七十二是用在軍備或戰事方面。在俄國地方百分之六十三的國家收入是用在工業化方面，百分之二十一是在教育與文化方面，百分之十用在行政與國防方面，百分之六用在其他的需要方面。

(三) 第三國際

共產國際或第三國際是在一九一九年建立在以前兩個國際頹廢的基礎上。現在牠

聯合了六十六國的共產黨——四十國在歐洲，二十國在東亞，其餘的在北美與南美。

國際共產黨第一次大會舉行于莫斯科，共有代表六十八人，並且在他的憲章裏明白的規定要推翻資本主義，以建設俄國式蘇維埃共和國，也希望藉着世界的革命，最後造成全世界國際的蘇維埃共和國。這一種確定的政策是任何負責的共產黨員不會否認的。並且在他們一切的文書中再三提及的。

憲章的第一條說：『這種新國際工人協會是要把各國的無產者組織成功聯合的行動，使他們爲了同一的目的而奮鬥，就是要推翻資本主義，造成無產階級的專政，而建設一種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使各種階級因此完全消滅，社會主義也得以真正實現——這是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

列寧所議定的第二十一條，可以表明第三國際會員的責任明明是不可妥協的：（1）一切宣傳的計劃必須真正含有共產主義的意味並且要符合第三國際的計劃與決議。

（2）對於在各種勞工運動中做領袖的改良主義派必須排擠而換以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3）在每個國家裏國內戰爭將要起來的時候，必須準備社會革命。（4）在每個

國家軍隊裏必須做宣傳運動。(5) 農民必須準備他將來的戰爭。(6) 社會和平的假面具必須棄掉，而以革命手段來推翻資本主義的思想必須預先抱定。(7) 對於一切改良主義與妥協的政策必須明白斷絕關係。(8) 殖民地與被壓迫的民族必須準備自由運動。(9) 共產主義的鼓動政策必須在工會運動裏實施出來。(10) 對於第二黃色工會國際必須反對。(11) 各個會員必須把他全部的活動注意在革命的利益上。(12) 民主主義的中央集權必須統治一切的黨部。(13) 黨內的澄清運動必須常常舉行。(14) 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為各個黨所擁護(15) 各個黨必須有一種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計劃與第三國際相符合。(16) 各國的共產黨必須遵守國際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案。(17) 各個黨必須公開的担負他的名義。(18) 黨中的機關報必須登載第三國際一切正式的公文。(19) 一切的黨必須召集特別大會，向各地的黨部報告國際大會的決議案。(20) 中央委員會必須明白的維護第三國際。(21) 凡是拒絕上面第三國際所核准的條件，都必須開除其黨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所舉行的國際會議共有四百七十五個代表，可以代表五十八國的共產黨。從五

十九個執行委員中，揀選二十九人爲主席團，再由其中十三個主席組成政治書記部。

第三國際也和共產黨一樣的有牠嚴的紀律與中央集權的制度。這種制度爲英國和其他國家中多數的領袖所反對。在第三國際中別國的代表都歡喜牠的總部設在別國的京城裏，例如德國的柏林。但是牠只有在俄國能夠得以安全，並且爲法律上所承認。

因爲俄國的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的捐款最多，所以牠在執行委員會裏有極大的表決權。

在俄國地方，每個共產黨員必須把他百分之二的收入捐作黨費。如果他每月的收入超過黨中所定最高的標準，就是二百二十五個金羅布或是一百十二元五角金洋，那麼他該把除多的十分之一也充作黨費。我們沒有方法證明第三國際是受蘇維埃政府的津貼，因爲牠實在不需牠補助。牠在一九二七年公佈的預算爲七十萬元，但是其中大部份都仰給于黨的捐款。

現在俄國的領袖以爲世界上有三個國家最有希望發生革命，就是：德國，中國與印度。德國的不穩定全在乎牠的勞工階級節省生活費，以償還戰債與賠款。印度自己

在政治上已經起了民族主義運動，其中共產黨的勢力實在微乎其微。中國因為有內亂，土匪，飢荒與經濟的窮乏，所以各地最容易發生共產黨的專政。中國地方共產主義的種子似乎也是最毒害的與兇猛的。現在無論在什麼地方屢屢有共產黨，紅軍或土匪假借了共產主義的名義作種種殘忍慘酷的舉動。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許多人常常很切心的預料蘇維埃政府快要傾覆；同時正宗派的共產主義者都希望別國裏的革命快要爆發；但是在歐洲或是北美洲，沒有一處地方似乎會早早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無論是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或是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兩方面的願望都可以變成思想。這兩種互相衝突的社會制度大概會並存到久遠的將來。與第三國際平行的一種組織，就是『紅色工會國際』。據說牠有一千三百八十六萬二千二百零九個會員。其中有一千零二十四萬八千會員是屬於俄國的。這種組織是要接濟別個國家罷工的行動。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四年當中，他們已經捐助三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五元四角九分，以維持三十個國家中罷工的運動。其他對於一九二六年英國礦工罷工運動，牠也捐了極大的款項。

第六章 教育與文化

我們已見到，俄國是歷史上最完全和最持久的一種革命的模範。在那邊，有新的文學，新的藝術和教育，新的社會觀，新的法律觀，新的道德觀，和新的宗教觀，——一切似乎都是新的，甚而至於民族的心理和性情。現在人們所發見觀，不再是宿命的，無意的，愛便利的，和沒有訓練的斯拉夫人，而是一種能力的發洩，——一種發乎十字軍精神之創始的和不可克制的企業。這種的現象，在藝術的全部領域中尤見特別地顯著。共產主義者和清教徒不同，他們所保持和發展的，乃是人生美的方面。俄國的革命在政治，經濟，和藝術各方面，曾求得一個普遍的表現機會。一切都是像火山一般的，但都是含着實力，向外邊爆發着。在沙皇的時代，一般受壓迫的民眾不但和政治遠離，而且經濟生活也不很發達；因此，他們祇好在文學，美術，和音樂等藝術範圍內求自身的表現了。現在的新俄羅斯是不受什麼限制的，所以牠也是在這些領域中求自身的表現。

沒有一國——除了日本——的美育生活，在民間的培養和發展，有像俄國這樣的。沒有一國的高等藝術展覽室中，博物館中，歌劇院中，音樂會中，和戲館中，有像俄國這樣地擁擠着許多工人。在列寧格勒的沙皇的藝術品大展覽室，已經有過極大的擴充。凡由貴族的宮殿中蒐集攬來的藝術品，如同他們的宮殿一樣，現在已經社會化，而且准許民衆入內。政府對此的注意，以及民衆對此的欣賞，都是同樣值得讚許的。沒有一國對於本國藝術品和古物的保存，有像俄國這樣的完備。在葛烈姆林（Kremlin）的大教堂和教會的建築，亦曾經人們將近世沙皇所添上的一些俚俗的現代化的裝飾品剝去，使牠回復當初古典主義的美。

現代的新文學很帶着些革命的印記，並表顯革命的心理。牠是特別的富於創造性，寫實性，和自然性，並且充滿自我的批評，——雖然是幼稚的，粗魯的，和欠缺的。牠依然是在一個實驗主義的過渡時代中。那些新出的普羅詩歌，爆發着革命的熱忱，深信世界的革命不久必奏凱歌；於是牠們藉着那些讚美勞工，讚美機械，讚美鋼鐵，和讚美偉大肌力的歌曲，來表顯牠們自己。牠們的性質，當然是唯物的和集產

的。

美術與文學之宣傳革命，最初是藉着對於民衆有偉大宣傳力量的標語和圖畫。在俄國，美術是視爲使「感情社會化」的一種工具。牠一方面承認藝術是爲藝術的，同時又承認藝術是宣傳的工具。杜威對於「民衆普遍參加的觀念和美術產品的本身的互異」，不免引起深刻的印象。

革命會改變俄國的戲院。歐戰以前曾被政府限制的戲院，一旦就向民衆開放其門戶了。不但莫斯科方面斯坦納士萊伐士基（Stani'sev'sky）的美術戲院的自然主義，和邁耶荷特（Meyerhold）的革命戲院的天才表現，受盡一般都市人民的歡迎，同時俄國人民的強烈的戲劇本能，也能在最遼遠的農村中間表現出來。俄國民族對於戲劇具有一種自然的天賦，和一種幾乎含有宗教性的獻誠，所以戲院能這樣深刻的感動他們。舉凡資本主義的惡奴和共產主義的英雄，都是站在俄國戲劇的背景之後，貢獻着他們一部分的實力。世界上恐怕沒有別種民族能這樣的使革命戲劇化，能這樣的把革命包含在藝術，建築，雕刻，戲劇，電影，和文學的中間。也沒有一國能這樣的把電影看

作一種教育的工具，並且使他宣傳着一種有力的政治使命和社會使命。所以電影並不
做了一種商業化的娛樂品，和一種妨礙社會的害物，牠簡直是成了一種偉大的教育勢
力，可以教導民衆以社會化的觀念，並且養成他們所願意有的那些品性。列甯說：

『在我們的藝術品中，我相信電影是最重要的了！』

像音樂這一類的藝術，亦被俄人用爲表現革命的一種工具，特別是對於最新覺悟的
少數人。國祭這一首詩歌，將被採爲蘇維埃的國歌了。凡在俄人的大會集和大慶祝
中，這一首歌總是替代着英國人的『上帝援救吾君王』這一首詩歌。在俄國，少年運
動也有他自己的新穎的詩歌，牠是正在尋求戲劇上和藝術上的表現。同時工人詩歌的
產生，也在增加牠們的數量。

俄國一方面雖在竭力的剷除宗教，但另一方面，各項的藝術却會有更多的表現和價
值。但牠最大的限制和障礙，大概是爲革命所根據的信條，不能免於狹義的，唯物
的，和功利的性質。

俄國的新教育，和舊教育顯然不同。二十年前，俄皇時代的教育制度是專爲權利

階級而設立的。高等教育是特別的富於文化的和個人的色彩，而且是時常的含有浪漫性，致與實際生活相離遠。因此，牠所造就的，常是『漢姆立脫（Hamlet）』一流的內省人物。至於新的教育却是實際的，社會的，實際的，和功利的，牠所造就的乃是新派的外務人物，他能發抒無窮的熱忱，創造的能力，偉大的膽量，和對於人生的自信。

總之，舊的教育是為特殊階級而設立的。新的教育是為開明的民衆而設立，其目的在使全國人民都受教育。

沒有一國的教育制度有比俄國更含有統一的整個性，有這樣的合理的根據着一種完備的人生哲學，且能和民衆的利益有如此密切的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的孟羅教授曾這樣說：『沒有一個地方對於教育程序的熱忱和信仰，有像這樣的充滿於社會中的每種元素，且能這樣地管治和指揮一般執權者的行動。』

這全部的過程都是社會化了。根據着一種適宜的理論，學校就對於教授上負責，但全部的生活，却受實際教育方法的駕馭：——如工廠，農田，店舖，博物館，戲館，歌劇，運動場，合作社，工會，家庭，城市，和鄉村等，——這些對於少年教育都有直

接的關係。杜威博士論全俄的情形說：『這簡直是地球上的一種最有趣味的實驗了。』

舊式的教育，其目的在於維持沙皇時代教會和國家的原狀；至於新教育的目的，則在創造一個合作性的共和國，而其方法則在培養一般的少年，並應用新的人生原則，來重新教育全體的民族。有了這樣一個偉大的社會目的，這種教育制度就力求產生一個新的經濟制度，要把他的政治生活社會化，同時又使全俄的自治民族，都用自己的語言和遺傳來發展他們的文化。按照列甯的蘇妻克勞淑斯卡耶（Krupskaya）的言論：目前這個制度的事工，是『在使每一個人獲得個人的修養，並得充分參與凡能給人生以價值的一切事物。』

爲了這些有意選擇的目的，俄國的全部教育在理是應當在國家的管理之下。在別國，教育之成爲宣傳的工具，比較上常是無意的，而在俄國，則是時常有意。美國對於國外人所施行的『美國化』程序，以及爲本國人所舉行的有關國旗的愛國典禮，都包含着正當的目的。在美國，他們教兒童要尊敬憲章；在俄國，他們教兒童要尊敬其

產。『在俄國，那種宣傳是爲一種熱烈的共同信仰，——爲了全體人類的普福利益。』所以結果，宣傳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宣傳。』馬克思的制度，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含有基本性。科學的傳授，其目的是在使兒童成爲唯物主義者。在入學時期以前的精密的教育制度，其用意是在發展創造的活動，以及合作和集產的習慣。育兒所和學校，對於訓練兒童所負的責任，比較家庭所負的尤覺重大。

俄國教育的中心思想，便是『叢雜的制度』了。因爲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整個，叫每個人在這裏而都有他的社會效用，所以學校所代表的，便是這種實際生活的一個側面。他們主張學校所教授的題材，不應當是像歷史，經濟，或其他不重要科目之類的乾枯無味的專門題材，而是應當爲實際的全部生活中的若干部分，如衛生，家庭經濟，學校，鄉村，或城市等。所以他們是從生活走到智識，是從實行學着方法。在他們看來，遊歷也是一種工具。所謂自然啊，博物館啊，商店啊，圖書館啊，都是研究人生的課堂。

俄國教育的另一種特性，便是牠的自治精神的表現，和對於外來束縛的離遠了。

訓練事項是由學生所組織的民主團體所維持的。低級學生的自由，幾乎和別國大學生的自由相等。著者曾過着自農村區域而來的高級小學的學生斂人，他們是在最接近的城市中求學，他們是在完備的自治制度和自定的道德標準之下，過他們的生活，他們沒有年長的人在管束他們。俄人深信凡受過訓練，而能爲自己思想的學生，乃是可靠的。在較高的學校中，他們的課程是由教員和學生團體中所推舉的代表公決的；不過教員團體所推舉的代表是比較的多些。他們不但可以刪除在學生們的智識上不宜於用功的若干科目，並且可以淘汰那些不宜於教授的教員們。他們的教育觀和馬克思制度相去很遠；原來他們看教育不是一件由執權者傳給少年，而強制他們去接受的東西，而是一般年長者和年幼者在一個民主性的過程中可以共同參與的一種經驗。這一點，當另詳於馬克思信條章內的後半部，此刻恕不再詳。

在沙皇時代，俄國學生的團體常被國家所禁止。現在呢，牠們是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他們組織各項有關學生的活動，如運動或訓練之類，在學校的學課中，在經濟的合作社中，在工人的工會中，和政治性的少年組織中。凡此種種，無異

是公民資格的訓練所。在俄國，我們簡直不容易發見一個組織，在牠裏面的學生並不參與該組織的管理和活動方面的。這一點，對於將來俄國的民主主義化，實有直接的關係。假使當局方面是絕對的專制政府，他們就不敢把「自治」教授給他們的青年，以及一般工人和鄉人了。無論牠的目的怎樣，我們總可見到：在今日的俄國，有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化的方法在進行着，這一點，或許能決定俄國的將來。

在種族之中雖沒有界限的存在，但在這個統系之中却有一個階級存在着，這便是無產階級的工具了。從前周惠脫博士（D. R. Jowett）以爲牛津的培利歐大學 Balliol College 的計劃，是在教一個英國的士紳成爲英國的士紳啊，這種觀察似乎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們知道莫斯科大學門首的標語，正是與此相反，牠是這樣說的：『科學——爲一般的勞力者！』

工人的高等學校中，設備一種短期的實用課程，（平常是三年）目的是在預備最有希望的青年工人將來入大學之用。在那些以全部時間肄業於工人日校和工人夜校的六萬八千名的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被選爲大學的學生。從前的學校是排斥

一般徒手工人的，但現在教育的全部方法，却在竭力的平民化了。牠的趨勢是在降低大學在智識上的文化標準，但同時牠又爲全部的工人階級造就有用的領袖。在黨的方面，更主張凡學工程的學生中，應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從工廠和工人階級中選擇出來的。

教育之在俄國，如同別的事情一樣，也是受着基金缺乏的打擊。牠所得到的經費，祇抵政府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十，又十分之六；而美國的教育經費，則佔政府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十八，又十分之七。按照蘇俄的五年計劃，他們打算在一九三一年實施強迫的學校教育，因此他們需要創辦費十七億五千萬圓。這樣我們就可見到，俄國人是喜愛目前似乎是不可能的一種理想的挑戰！

在過去十年中，蘇俄式的教育已有非常的成績。在一九二三年，各級學校的學生祇有四百四十萬人。到一九三〇年，各級學校的數目和學生的總數，可以下表來顯明的：

教育的種類	學校總數	學生總數
初級學校	一一九, 六六〇	一一, 三三〇, 九二六
中等學校	一, 八八三	一, 〇〇八, 八一三
職業學校	八三五	九六六, 五八一
工人高等學校	二三九	六八, 一八五
大學	一八八	二〇四, 五一三
不識字者的學校	一六八, 八〇〇	六, 一一二, 〇七八
成人教育	二, 一五二	二一〇, 五三三
黨義學校	一一二	一七, 〇六一
工人大學	八八	三二, 〇五八
政治與黨義教育	四四, 八一—	一, 〇一五, 〇五〇
圖書館	二五, 五〇六	—

茅屋中的閱報室	二〇，〇六八	—
俱樂部	四，七五二	—
民衆與農人的家庭	六，八一九	—
『紅室』	四八，六六一	—
戲院	一，四三四	—
影戲館	七，九六三	—

在一九一三年的沙皇時代，人民中祇有百分之四十是識字的；現在呢，自十六歲至三十四歲的人民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又十分之九是識字的了；在五十歲以上的人民中，已有百分之二十七又十分之五能讀書和寫字了。他們這種努力的程序，是要在一九三四年以內將『不識字』這污點盡力剷除；同時俄國政府又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凡自八歲至十一歲的兒童，應強迫入學。

不過這種真正偉大的成績，從一個美國人的眼光看起來，其中尚不能免於若干的缺

點。因為現在的俄國，不識字的人尚不下二千萬，同時校舍，設備，和教師等各方面，還是很感缺乏，不夠教三分之一的兒童。至於大學一方面，現在的設備還是不能容納半數投考的學生。教員的薪金也是很低的，在初級學校中，他們的月薪，平均每人祇有二十六元八角七分。這樣，教育固然是實際化了，但是學術上的標準，反而因此降低了。此外如處罰一般智識階級，一般被剝奪公權的人們，和他們無辜的子女等種種舉動，亦會受俄國方面較有胆量和較為寬大的領袖，如高爾基（Maxim Gorky）和克廚潑斯卡耶等的責難。其中最不好的一種現象，便是在學校和出版界中故意提倡一種含有敵意的宣傳，他的目的是要表顯——有時却是錯誤的表顯——其他民族生活中最惡劣的幾方面。如果當局方面堅持着用純粹的虛偽，培養恐懼，痛楚，和仇恨等元素，那麼牠就不能引起一般自由和寬大的民族的尊敬了。不過我們也須承認別國的出版界，也在提倡一種昧於真相和虛偽的反俄宣傳運動，這一點，簡直是可以和俄國人所提倡的虛偽的宣傳運動相抵消的。我們希望這兩種無價值的宣傳運動都會早些消滅，尤其是在那已成就如許光明的和可讚許的教育進步之蘇聯！

第七章 道德與婚姻

『新俄的道德標準，既不是禁慾的，也不是淫佚的。團體的習俗，既不視為屬於神權的絕對標準，同時人們的行爲，也並不視為一件有關個人和自我滿足的事。共產主義者沒有永久的道德真理作他們的起點，他們有的是一種造就自己行爲的社會制裁之權威；至於最大的一種自由則屬於個人，但是應當和社會的幸福相適應。所以道德的規律的基礎，並不是現存的國家，而是將來無階級異別的社會。凡贊助這種革命理想的，都是合理的；凡阻礙這種革命理想的，都是錯誤的。因此，列寧就這樣解釋共產黨的道德說：『凡能聯合工人去反抗各項的剝奪，凡能提高人類社會到較高一等級的，都可以稱為道德。』』

在新俄中間有一種真正的危險，這就是個人之受團體的吸收，——受所謂『集團的人』的吸收，——這樣，個人或許不能對於社會盡其最大的貢獻。經驗或許會告訴他們：一個社會的建設，必須要孫一般充分發展的個人的幫忙。

在道德標準的建設方面處於前導者的地位的，則為那擁着精選的，受訓練的，和能自治的少年之少年團體。在革命以後的短時期內，俄國曾有一個放縱時期，那時一切的限制，都算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但是現在呢，一切的亂交行為，肉慾的放縱，或酒色無度等舉動，都算是『反革命』的了。在五年以前，俄國少年的性生活是放蕩的；現在呢，這種放蕩是要受責難的了，——雖然俄人的性生活或許比別國人更自由些；雖然不正當的結合在已婚者或未婚者的中間，都是比較的少受刑罰些。在他們中間，並沒有須受道德非難或社會離棄的『私生子』，『墮落婦』，犯罪者，或不正當的人。

但是在俄國却有一個『共產黨禁酒會』，和一個有力量的反對飲酒和縱慾的運動在提倡着。『少年先鋒』的團體中，是不許有吸煙的事情；在成人的青年中，節慾的事也在竭力實行；如其不然，他們寧願提倡一種永久的結合，——無論是登記的或未登記的——却不願意提倡亂交。藉着了勤奮的工作，社會的服務，對於事物的興趣，艱辛的運動，混合的遊戲，和青年男女的團契等，他們就能維持那種自定的道德標準，使牠

能得到極大的成功。在那邊，犯罪並不視為個人的罪惡，却是視為社會的失誤。

飲酒是俄國的一個問題，如同在美國一樣。：在沙皇的時代，麥酒能供給全國收入的四分之一。戰時的禁酒運動，雖曾維持到初期的革命時代；但是因為農民私自釀酒的普遍，這種禁令就不能繼續有效。在一九二五年，麥酒曾經當局者准許公賣，不過牠的力量祇有百分之四十；至由政府方面所釀造或經營的，則祇及戰前的二分之一。

按照標語，電影，和文字上所宣傳的，一九二七年俄國在飲酒一項所費的，為十二萬萬盧布，或等於六萬萬圓；這樣一筆款子，可用以建造一百二十萬處最需要的家庭，或購置七十二萬輛自動牽引機，以改革落後的農業。最希奇的，就是那民主國的美國却在利用武力來解決牠的飲酒問題，同時那素以專制政治著稱的俄國，對於這問題却在求教於牠所認為比較有力量的一種工具，——教育和道德的勸導。但是到如今，却沒有一國已解決了牠的問題。

在蘇俄方面，更有一種禁慾的性質。莫斯科這城，若和美國的紐約或芝加哥的繁華富貴和晚間生活比較起來，無異是一個荒涼的清教徒的城市。在那邊，無所謂公開

的園舞。在莫斯科有一個聲勢未盛的賭窟，但近來已被封閉了。此外有兩個晚間俱樂部，營業未見發達，參加的分子，大概是些異國人，而內部的各項款待，絕沒有像紐約，巴黎，或柏林等處所發現的女色的誘引。在那邊，沒有什麼『儀表』，也沒有什麼『時式』；各項的生活，一律被壓成褐色的和平等的樸素標準。工人式的服裝，在各處和任何宴會中都很流行。一般的人們似乎都是貧窮的，但沒有一個人感覺着什麼缺乏。蘇俄人民的性質是嚴重的，他們對於娛樂的公園似乎很能表示快感，——特別是對於各項的遊戲，和民衆的跳舞；但是他們却沒有表示過浮躁，無禮，或紊亂的狀態。辰柏林說：『克倫威爾和密爾登或許會對於莫斯科更感覺舒服些，因為在那邊絕對沒有繁華的夜生活，對於浮躁的生活會表示輕視，人人都把思想集中在宗旨上，而遠避個人的享樂。從這幾方面觀察起來，莫斯科是和歐洲其他各處的首都的精神，大相懸殊的。』

這種清教徒式的精神，對於一般遊歷俄國的美國人却是一件極可驚奇的事。著者最近遊歷俄國時，同隊中有一個男子戲問一個美麗而青年的俄國女嚮導說：

「你願意和我結婚麼？」

「一定不會！」——她這樣冷酷的回答說。

「爲什麼？你對於一件事情難道沒有說過笑話麼？」（他）

「對於嚴重的事，當然不會說笑話的！」（她）

「這樣，你就把結婚看爲一件嚴重的事麼？」（他）

「我們確實是這樣的！」（她）

後來我這個同伴，又從莫斯科乘火車到寧格勒，在一個早晨，他的睡車上的門役走進他的艙房時，竟發見他在吻着他妻子的臉，這個門役就勃然大怒，堅決的主張要罰他二十五個盧布，或十二個零五角。我這個朋友雖竭力辯護這個婦人是他的妻子，但依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那時候，他們不管這個婦人是誰的妻子。結果，火車上的檢查員也贊助門役的主張，於是處在抗議之下，這筆罰款終究是付出了。但後來車務的當局就來召見我的朋友，並付還這筆罰款，此外又說上幾句有禮貌的抱歉話；這是因爲這犯這條禁例者是一個外國人的緣故了。假如我的朋友是一個俄國人，那就沒

有付還的希望了。這個受罰的美國人，對於當地流行的道德標準，從此就得到了一些和他到俄國時不同的觀念了。在俄國，凡在火車上旅行的婦女，是特別地受着保護的。

(一) 婚姻和家庭

革命影響了俄國的婚姻和家庭，猶如牠影響了俄國其他方面的生活一樣。在戰事和革命以後的混亂時期中，俄國曾有過短期的放蕩生活，而且牠所表現的也比其他各國爲尤甚。不過實際的情形，並沒有像外國人所宣傳的『婦女歸於國有』那樣的失實，和那樣的造謠。到了現在，當局已規定具體的婚姻法，當地且有自治嚴密的少年運動，對各項的放縱和亂交，曾予以疾首痛心的表示。

在這一點和其他各點上，我們要瞭解蘇聯，必須根據牠自己的背景，而不能藉與西方各國的比較觀。無論是新舊的俄國，牠總能脫離別國所受着的禁戒，限制，和不自然的約束。浪漫的封建主義，或嚴肅的清淨主義，在俄國從沒有產生過別國所曾見的『婦女的隔離性和神祕性』，以及兩性間的不自然的離異，和其他病態性的好奇心或畏

懼心。俄國的婦女，乃是——現在還是這樣——世界上感覺最靈敏的婦女。她們是自由的，坦白的，嚴重的，不浮躁的。她們既不畏懼異性，同時也不懷着成見。

「性」是被視為一件有益於人生的事，却並不視為人生中最能移人心意的一個對象。俄國人大概是一個活潑的，純樸的，不受遏抑的，和不尚禁戒的民族。他們是時常有道德的，並不是沒有道德的。無論在生活，文學，和電影各方面，他們都缺乏性的暗示。性的祕謀，不能成為電影中公開的或祕密的誘惑物。如果牠是在電影中被發見了，牠不但會受人們憤慨的排斥，而且民衆方面也沒有這種的需要。「性」在俄國不是一條禁例，而是一個在光明之中予以合理的和批判的探討的題材。因此在俄國，兩性間的自由和平等的關係，比較世界上其他各國或許都要進步一些。

俄國舊時的記事書中，曾記述婦女所沒有受過的幾種最野蠻的習慣。這時的男子，對於婦女有絕對的權威，並且能自由地使用手杖，叫婦女們屈服在男子之下。現在新的民法，——尤其是新的精神和婦女的平等觀，——已把舊時男子所定的法律，和男子統治一切的習慣，都掃除乾淨；但是在農村間未經社會化的部分，這些古舊的習慣

仍然是存在着。

新的道德律和道德行爲的精義，便是根據於社會幸福的個人自由了。所以無論是男是女，都可以完全獲得自由，但他們的行動却是以社會的結果爲條件的。此外法律對於「人們對於子女的責任」的規定，也是毫不加以寬縱的。因此，社會方面就否認無節制的自我滿足，並要求賢明的自治了。原來革命性的輿論的重心，並不在於個人的縱慾，而在於社會的幸福。

在俄國，婚姻是被視爲夫婦間的一種有力量的個人關係。戀愛是能使婚姻成爲真實的；所以國家不能造成或分裂人們的婚姻。國家所能盡責的，祇在於承認或登記結婚的事實。國家又能保護人們的子女，或防止社會中發生賣淫的行爲，或其他自私的和反社會的行爲。不過這是像其他的組織一樣，國家是爲人們而設立的，人們却不是爲國家而存在的。俄國人相信婚姻永遠不應當成爲一個監獄，一個「戀愛」死去以後所不能避免的監獄；婚姻也不應當成爲一般配偶不佳，致不能享受快樂生活的夫婦的受刑地。

一般革命的人，爲求掃除沙皇時代時常犧牲婦女和男子舊時的人爲法律起見，其舉止行動常不免有過當之處，致因此而喪失若干有價值的元素。查暫行的婚姻法，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間才編訂的。在編訂以後的九年間，人們發見這個婚姻法有許多需要修正的地方。但在實行修正以前，這婚姻法曾經全國民衆加以詳密的討論。婦女們的團體，因爲對於此舉關係尤爲密切，故在討論方面就居於先鋒者的地位。新聞紙，雜誌，成人俱樂部，和少年團體等，都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在討論婚姻法的各方面。

他們的討論，不受過去的死威懼，一般的禮節，或前此專門法理的管束。其中的一兩問題是：什麼是對於兒童，婦女，成人，家庭，和國家等，在理性和試驗上最屬有益的法規？國內一般民衆，因爲受無數印刷物的刺激，所以據報告所得，雖在鄉村一隅，已有六千處以上的公開會議，對於這問題作無數次的辯論，討論，和講演。全部的國家生活，對於這一點都願意貢獻所有，以期造成新的模型。結果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他們就採用新訂的婚姻法。不過這婚姻法將來仍願在經驗的指示之下加以修正。

按照現行的法律，事實上的結婚，雖也得承受登記婚姻的各種權利和義務，但是在登記局經過登記手續的一種合法婚姻，却是被認為正式的。在經過登記手續以後，如經本人的要求，可再行教會婚禮，但這是沒有法律上的意義的。男女在登記局登記他們的婚姻時，最要的條件是相互的同意，雙方結婚的年齡已至十八歲，此外又簽訂一種婚書，說明他們的婚姻是自願的，是沒有法律上的阻礙的，而且彼此都知道各人的健康狀況的。凡在婚書上說假話的，一經發見以後，不免要受法律的控訴了。凡經過結婚的男女，仍可保存他們先前的姓氏，或者可採用丈夫或妻子的名字。不過財產仍是分屬於各人的。男女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平等的，但是法律的主要目的，仍在於保護一般兒童和婦女。

在人們的一生中，離婚是可以經雙方的同意，或一方的提出，而予以解散的。離婚是無須有什麼理由的。如經雙方同意，他們可簽定一紙公文，註明所同意關於處置財產或子女的方法。如為滿足性慾而結婚，復繼之以急促的離婚的，那是要經法律的處罰的。總之，俄國的婚姻法和現代挪威的婚姻法很相近；在當局准許離婚以前，是

無須有什麼等待時期的，這一點，又和瑞典、挪威等國的婚姻法相同。

據大概人的推測，這種含有自由性的法律，或許會產生一種專為滿足性慾和離婚的放蕩行爲。但是事實所顯示的，却並不是這樣的。原來離婚之在俄國，比較美國是略見流行一些。不過對於這個事實，他們却不感覺什麼悲哀，同時也不願意執行或延長那沒有愛情或快樂的婚姻。至於論到婚姻，他們是排斥亂交，以一夫一妻制爲他們的理想。蘇聯政府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把牠視爲基本的社會單位，並深信母親對於嬰兒的看護，比較國家或國家的團體更要適宜一些。盧那查爾斯基 (Lunačarski) 說：『我們必須注意的社會之主要中心，便是家庭了』。但家庭雖是極有價值的社會單位，却不像西方那樣視爲一種神聖的和絕對的實體。家庭固然是有很大的比較價值，但是有絕對的價值的，祇有國家或社會的全體了。除了少數的例外，最高尚和最優美的家庭生活，在沙皇時代知道的人還是很少。大多數的家庭，有的是太窮了，有的是太富了，有的是太沒有訓練不配有共享的，文明的，和共同的家庭生活。其實最優美的家庭生活，在俄國並沒有喪失，不過牠是少被我們發見罷了，——除非是在很小的中產

階級間。

一般兒童的生活，大概是在育兒所，學校，和少年團體中過着的，他們在家庭中所過着的生活，比較別國是略爲少一些。至於成年的男女生活，大概是在工廠，農田，工會中，黨部，俱樂部，和公園中過着的，而少有在城市中居住區域內那些孤單的，不動人的，或擁擠不堪的住舍中過着的。俄國對於一般的婦女或兒童，從沒有使他們國家化；但是家庭生活的創造或進化，則有待於未知的將來。

娼妓制度是被視爲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特性，同時人民對於『罪惡的商業化』，常會表示道義之怒的。著者曾遊歷沙皇時代莫斯科和列甯格勒兩城中准許賣淫的區域，但是現在這兩個城市之脫離了賣淫的罪惡，或許比歐洲其他的城市要進步一些。許多因受災荒的打擊而致無家可歸的孤兒們，（按當時曾死亡三百萬人）現已多數居住在兒童的家庭中，和農村的殖民地地上。

墮胎和生育節制是認爲合法的，但前者却視爲一般貧窮而多病的婦女的一必然的罪惡。現在的俄國，對於因軍人的蹂躪而得到的無限制的且有礙於婦女前途的生育開

題，還不知道應當怎樣去應付。但是任何尋求關於避孕方法的婦女，都可自由地得到這種智識；這樣，避孕的方法或許會流傳得很快呢。

奧都說：『俄國人是一種不受遏抑和不受禁止的民族。他們並沒有過分地蘊蓄着性的意識。』性對於他們，是一個主要的，却不是一個吸引全部人生的目的。他們對於「性」是不開玩笑的。這種對於性的問題的無感覺，革命黨員是要竭力使牠持久的。他們對於商業上的性的利用，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們也封閉舊時的妓院。

同樣地，他們對於商業生活中所輸入任何的「性」元素，也會予以禁止的。在商店的窗戶中，或任何娛樂場所，絕沒有一些關於性的暗示。在俄國的電影中，更沒有一些關於性的暗示的痕跡。如果俄國的製片者在把性的詭秘作為一個影片中最有興味之點，那麼牠就有被人們很殘忍地禁遏下去的危險。俄國的羣衆對於性的問題，決不會受到什麼激動的。俄國的新聞紙和雜誌，是特別地能脫離性的穢行，或性的故事的影响。……但是，俄國的婦女雖然是富於熱忱的，俄國民族雖然是不注意於性的，俄國的新教育雖然是以自治為牠的一部分，然人們的心中還是不能不這樣地懷疑着：俄國人

究竟是否有陷入於獸域的一種危險……如果到了終局，牠能證明在俄國的自由情形之下，放肆主義是愈見減少了，男子會少受亂交的吸引，婦女對於亂交也能不為所動，——這樣，在人類的戀愛生活中，我們將獲得一種新的一夫一妻制，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如果這是從內心的願望中流露出來，而能脫離外界的強制的。

(二) 少年運動

俄國的少年運動，是一種新鮮的和大膽的試驗。少年運動是三十年前德國所發起的。但是在今日，俄國的少年運動却無疑的是全世界上最可注意的少年運動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聯合會第一次的會議，是在一九一八年舉行的，那時祇有會員二萬二千人；現有的會員已達二百四十六萬六千人。假使我們把少年先鋒團（Pioneers）和十月團（Octoberists）所有三百三十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名的會員總計在內，這個活潑而進步的運動幾乎有六百萬的會員。至於少年運動的品質，則比較牠的數量更可注意。少年運動的團體，已成為訓練全俄少年瞭解新社會程序的原則的一個教育工具了。現在呢，他們不再教訓一般少年以「我的國，——無論是或否」一類的絕對的愛國的主義，

而是要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爲全世界工人和新的革命社會訓練一般新少年，而且要進一步的去訓練那全個的成人的時代。

在少年團體的各項分組中，其年齡的界限常不免有彼此僭佔之處。如十月團的會員是從八歲到十一歲；先鋒團的會員是從十歲到十六歲，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會員，是從十四歲到廿三歲；到了十八歲，會員中約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被選爲黨的黨員。每個少年的團體，如同黨的本部一樣，常有嚴厲的「澄清」時期，以剪除一些無結果的樹枝。沒有一個運動對於少年有如許的要求，並有這樣的挑戰，要他們作切實的犧牲，或設法應付一種對於熱烈的服務的感覺。

少年的十月團的團員，是廿五人一團地組織起來的，每團分爲五個支隊，每隊有五個團員，和一個先鋒者。先鋒團每團有六十人，分爲六個支隊，每隊有十個團員。他們的訓練事宜，多由年長些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協助的。這全部的組織之目的，是在對於新的公民資格作集中的訓練。

少年的先鋒團有五項規律和五種習俗。先鋒團的團員是『不吸煙，不飲酒，和不

宣誓」的。年長者對於他們，並不給以屬父職的禁例。因為這樣的事「簡直是不做的。」團員是受過訓練的，每天須實行體操；一面又須尋求智識，在學校中發展他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此外「團員們是忠於工人的主義，和列甯的誠命的。」他們在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領導之下，每星期須遊歷博物院，農田，和工廠等。少年運動的團員，是祇有責任而無權利的。他是被人們教訓着，要他明瞭家庭結合的重要，並在清潔，衛生，新鮮空氣，和識字等條件之下，賡悟組織新家庭的必要，同時每一個家庭中又須安置列甯的照片和「紅室」等的。舊時通行的毆妻或責兒的習慣，是不再准許的了；此外團員又須和「宗教的成見」宣戰。團員的各項遊戲，用意是在發展集中的和合作的行動與目的。從最初，他就受了訓練，知道人生的大志願不是為自己尋求成功，而是不顧種族的關係，為全世界的勞工謀豐富生活的發展。著者曾在莫斯科一個競技場中，參觀一個由全世界五萬名的先驅者所參加的會議。其中有從哈蘭（Harlem）和紐約和斐爾特斐亞的貧民窟而來的黑種人的童子。有一個演說者藉着了傳音機，警告一般團員以資本家對於俄國的侵略行為，以及別國方面對於工人所提

倡的一種運動，後來他就問他們說：『先鋒者啊！你們預備了沒有？』接着，就聽見五萬個人如同大學生的歡呼似的，齊聲一致地呼喊着說：『我們是預備的了！』

這般先鋒者的年齡，是從十歲到十六歲；他們有自己的出版局，並發行自己的刊物。那年齡較長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則刊行六十種報紙和二十種雜誌。他們的報紙『青年共產主義的真理』，或許是全世界編制最完善，勢力最偉大的一種少年刊物，牠的銷數比蘇聯全地刊物的銷數，還要大上幾萬呢。總之，這全部少年運動的特性，就是處於他們自定的條規之下，成立一種嚴厲的自治。著者若把俄國的新少年和戰前的少年比較起來，恍然如同兩國。由這種新環境和新制度之中，復產生了一種新心理。俄國人不再是一種幻想的和無定向的民族，而是一種具有進取性的啓發力了。他們對於運動，組織，遊行，表演，和熱烈的演說等，都表示一種新的熱忱。此外又產生一種對於勞工的新尊敬，犧牲的熱忱，為勞工的主張而準備動員，新的訓練和自治，少年人較早的成熟性，和少年人有力量的社會化。從最後一方面說起來，這種運動不是對於年長人的一種消極的反抗，而是一種為人類全體之積極的和創造的十字軍。

我們知道：日本的政府和巡警，是在設法遏制激烈的學生的『危險思想』，但是俄國的少年却也有一種運動，意在反對一切屬於改良主義派，資本家，或妥協趨勢的『危險思想』。

這般奮鬥的少年所擔任成人的和負責的社會服務，是別國人所難以瞭解的。在最近的收穫時期有數千名的礦工回到家鄉的農田上從事工作，忽然有數千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到礦工們那邊去訪問，並且告訴他們說：在『五年計劃』中煤礦的出品或許不會停止呢！一次，某當局竟誤令農民將所有番薯都運到莫斯科去，但是因為俄國氣候嚴寒，經過兩星期的冰凍以後，就有全部被喪失的危險。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知道了這消息，就立時自動的投身於這種困難之中，結果在兩星期之中，他們就把所有的農產都穩妥地貯藏起來了。那時俄國的街市，因為流行着汽車傷人等意外事件，所以這般團員們就提倡一種『安全為先』的運動，並親自看守街市的轉角，結果就養成若干種新的行車的習慣，以前的危險就得免除了。現在俄國政府又通過一條實施全俄『強迫教育』的新法令，然而他們還沒有找到校舍，設備，或其他使該項法令有效的

諸種準備。就人類的能力而論，這件事似乎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有組織的少年正在預備解決這不可能的問題，而且現時正在提倡一種運動，在一般勇於實行的少年的指導之下，使上述的法令不致成爲一種死文字，而成爲一種有生氣的實在。在禁酒會的指導之下，那些少年又在工廠方面竭力進行，同時又要求他們的父母簽名在禁酒的志願書上。他們會見勞工，每在工廠散工的時候，他們隨身帶着招貼，旗子，和禁酒的標語，並把他們的「十字軍運動」推廣到成年人的方面。在幾個社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運動中，他們乃是國家生命中一種日見增長的勢力。

假如我們把俄國少年的爵士音樂，成對的愛人，美麗的汽車，『發財』的慾望，以個人的財產和競爭所得的來衡量事物的價值等，和俄國少年的那些活動比較起來，那麼我們所感覺的，不是在這人生的大試驗室中有什麼值得學習的東西；而是我們願意不願意學習，願意不願意及時學習呢？現在國外的出版界，大概都在用想像的性慾放縱，來專寫俄國少年的不道德，同時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其所當學習的事情固然很多，却仍是生存在兩個分離的世界中。

俄國的那種組織完密，訓練嚴厲，和活潑進取的少年運動，在這個新制度中無異是一個有力量的公民資格的養成所。茲因為篇幅所限，著者僅能舉出一個例子，來具體說明俄國的少年是如何受着關於公役的訓練。我們且把一個年方二十的少女愛倫（Ellen）女士來做一個例罷。當她受了少年運動的訓練以後，她就被指派擔任城市中和夏令營中少年先鋒者的訓練事宜。她所施用的方法，不是將約束的規章強迫他們去遵守，而是在動作的程序輸入幾項重要的原則。他們發起了旅行團，遊行會，討論班，和每週的會議。對於公民資格和少年人格的養成，也曾有過相當的訓練。團員必須熟知少年運動的歷史，黨的歷史，和世界革命的歷史。他們會組織若干小團體，分別研究戲劇，藝術，詩歌，著述，講演，團員的規章和習慣等等題材。

愛倫女士擔任了這種對於先鋒者的工作以後，她又受委派擔任一個落後的農村的發展事宜。她發見了這農村裏面的人是不識字的，迷信的，腐化的。村中的一般少年，在對於年長者引起反抗的時候，其自身却仍在飲酒，賭博，浪費，和無知中過生活。所以這個農村在和莫斯科的當局合作之下，必須要改革過來。於是她就利用星

期日和每星期的兩個晚上，自動的來服務這農村。她的第一步方法，就是確實知道這農村中有一個好的學校，和一個幹練的教員。接着，她就用民治的精神來協助他們組織一個服務社，內設圖書室，閱報室，無線電，娛樂室，和團體會議室等。第二步，她就將村中的少年組織起來，並鼓勵他們領導一個運動，去反抗飲酒，賭博，宣誓，和性的放縱。她又把最有力量的反對飲酒的影片帶到該村去開映，每星期又開聯合有社會使命的電影一次；此外又特別由城中請幾個最優秀的演說家，到村中去演說。又該村長時間凍結着的道路，雖對於少年人的雪車很覺便利，但是對於一般年老的婦女不是一種麻煩，而且是一種危險。因此愛倫就勸導一般少年沿路撒灰，以免滑倒，同時再領導全村，建築一個專供冬季運動的溜冰場。到了這個建築佈成以後，無論老幼的人們，都出來溜冰了。經過了這樣一年的服務以後，這個農村的生活就有了顯著的改變，尤其是少年運動所促成的那些改變。

此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議會就委派愛倫去組織十六個鄰近區域的農村，她就遣派若干的少年工作者，並訓練他們在那些農村中擔任各項的工作，如同她在自己的農村中所

担任的一樣。往後她就被推為少年共產主義者的真理報的編輯之一，接着她就成為某區域出版局的經理，這樣，她和各報的編輯就有密切的接觸，目的是在為少年發展一種協議的政策。不過這一類的服務，當然都是自願的，義務的，和民主主義的，而且是由少年人自己担任的。

著者最近遇見愛倫的時候，她已是大學中的一個學生了。除了她的學校工作以外，她每天在校外担任八小時的服務工作。她不但是在俄國學生中間工作，並且用五國文字寫成通訊稿，在歐洲的別國學生中工作。這樣的服務，無疑的會影響於她的學校工作。但是她却在廣大的複雜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一種實際的教育。讀到這樣一段的記述，我們常會心領神往的想到別國的一個女童或男童，一個學生運動的分子，一個勉勵會的會員，她或他竟會這樣的傾出她或他的生命，來從事於那種快樂的和有效的服務，如訓練少年，改造農村，著作，講演，組織，和服務等等。這簡直是一個陶鑄少年生活的偉大的實驗室了。試問他們不能從年齡較大的國家那裏學得些事情麼？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國家不能從新穎的，熱烈的，並時常說「請常記着，對於我們，世

界是正在開始呢！」這些話的一般少年那裏：學得些教訓嗎？這兩方面難道不能作改進的企圖，而祇能為「破壞」預備一種可能的戰爭，或祇能受那些表顯雙方污點的虛假宣傳的茶毒嗎？這些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了。

第八章 法律與正義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所有全部法律的組織都已掃除，而新的法律觀念與法典已經起來了。民法與刑法也已經制定了。現在法院的制度包括人民法庭，地方法庭與最高法院，以及各種特別法庭。人民法庭裏的推事都是工人，而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屬於共產黨。推事和兩個陪審員同坐在公堂上，各種案件取決于多數的投票。這種法庭比較別個國家裏的法庭更是非正式；也很少注意法律上的手續與口頭上的細辯，但要顯到公道與正義。

法律上的條文與程序是為一種「階級正義」的新觀念所影響。沒有人能表白他們解決糾紛的事件是很據於絕對的正義。如果這個囚犯是一個窮苦的工人，那末他就被

定了很輕的罪；如果他是一個有知識或特權的國民，或是他是一個剝奪弱小同胞的國民，那末他的刑罰比較重些；但是如果他是共產黨黨員，那末他要受法律上最大的處分。在俄國地方，各樣事情都要受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基要主義以及政府爲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的根本觀念所影響。他們以爲祇有在經濟的階級衝突廢止了以後，才能使自由變成一種實體。同時他們要使佔居全人口十分之一的勞農階級得到正義。

俄國的社會與法律都已社會化了。刑罰的輕重不是拿個人的罪惡來測度，却是要拿犯罪行爲的結果來判斷。個人對於單獨個人的暗殺普通只處以八年至十年的徒刑；但是危害社會或國家的罪名比個人的暗殺大得多了。反革命，濫職濫權，並且利用民衆的迷信以顛覆國家等等的罪都要處以死刑的。蘇維埃的法律制度還有一種特點，就是對於財產有一種不同的觀念。土地與一切生產的機關幾乎都在國家的手中，那末人民自有財產的範圍當然縮得很小了。生活的穩定比較以前更大，而剝奪別人的機會却已經減少了。一個人可以主有他的家庭，花園，衣服以及他自己的用品。他也許可以有個人應用的私產，但不該有一種有社會功能的財產，並使他藉着利息或租金來剝奪

別人。如果他在社會上能發生功用的，那末他從生到死以及遇着失業，疾病，災變等等都可由國家照顧的。那末，還有什麼理由可以使他發生恐怕，或圖謀私人利益呢？一個人可以私有的或讓給別人的財產是有各等的稅則嚴加限制的。一個人在遺囑中可以規定他的遺產；但超過五千元的遺產就要納百分之九十的稅。

在整個的刑罰制度中還有一種特點，就是適應於全人口十分之九的工人的罰則不是含有報復性的，却是有救拔性的。他們對待階級仇敵的手段常是很殘酷而且不公道，這是令人抱憾的，但是照大體而論，他們的刑罰制度是最新式而合乎人道主義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認為犯罪的人，也許被他們當作一個犯了過失的小兄弟，並且他的過失或者因為不是他自己的不好，却是因為窮乏愚笨或社會的不公道。他從來不被稱為囚犯，也不被拘禁在監獄裏。要他並不穿着犯人的衣，也不蒙着惡人的名義。他可以受着一個工人的工資，他在刑期當中，也可以談話，吸煙，或做各種合理的事情。至于他的罪案常常是不確定的。刑罰的目的是要使犯人救拔他自己，並且要使他變成社會上有用的公民。

在政治探訪局所辦的『自新居留地』裏面，這些男孩子們自己有一種自治的組織可以教他們學習一種行業並欣賞工作上的快樂。那邊沒有武裝的衛士或門警。這些年長者好像是他們的朋友和顧問。這些男孩子是他們自己的管理者。居留地的主任就是探訪局唯一的代表。但是他好像一個父親或朋友，並不像一個官僚。那邊也沒有牆垣和籬笆。凡住在居留地裏面的人可以在普通的監獄中揀選有志的青年去加入他們。賊子與小竊都被教以一種行業，而把他們的犯罪行為從此除去。那邊也設備各種創造的工作，團體的遊戲與運動的器械，以建設他們的人格。這個居留地離開莫斯科不遠。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去參觀的。牠是由一個醫生在不多幾年前選集一羣願意自新的男孩子去組織起來的。現在那邊有一千一百三十二個男孩子和成年人，並且還有幾個女人。那些品行良好的人可以回到家裏去過暑假。他們在居留地裏面可以結婚。他們幾乎可以做各樣的事情，祇要能夠養成他們有用的國民。這個居留地可以變成四周圍繞牠的大居留地的中心。這個大居留地是為從前犯罪的人建設起來的。但是他們歡喜永遠住在那邊，也可以隨他們便的。他們在四周的農場與場工中可以找

到他們永久的職業。

這個居留地的人是從別的刑罰機關裏揀選出來的。他們一到了那邊，就把一切的過去都忘記了。沒有人要問他們問題，因為每個人已都算爲良善的國民。他們要想改過自新乃是他們的信仰。新進來的人，在起初的時候是略加防範的。等到他習慣了以後，這種督率就可以除去。他們在居留地裏面完全是很自由的。所以沒有幾個人歡喜離開牠。全部的計劃是很合乎人道的，科學的，與試驗的方法。每個男孩子或女孩子都可以做一種適配的工作。他們不教男子做汽車的執照牌，也不教女孩子做婦女的鞋子。但是教他們做溜冰鞋，運動器械，或別種有趣味的東西。這些女孩子對於衣服很感受興趣，所以她們常常去做紡織的工作。他們同樣的能夠享受工會所定的工作時間，工資與其他保護的權利。他們很愛護這個居留地，所以有一個男孩子曾經送杜威博士一幅油畫，並且在油畫的背面寫着說：『紀念開了我眼睛的學校。』在狄克推多制度與政治探訪局的恐怖底下，會存在着這種救拔自新的刑罰制度，而在奧茲本(Thomas mott Osborne)所居住的自由民主國土裏反有陳腐的，殘酷的，報復的監

獄制度，這是何等希奇的一件事呀！美國的監獄制度，如果像『牢獄鴛鴦』（The Big House）影片裏所描寫的種種黑暗的情形，那末，他可以從俄國的刑法制度中學得許多教訓了。

的士累利（Diaraoli）曾經說：在別個國家裏總包含着貧富兩種民族。現在俄國也確有兩種階級。一方面是以前十分之九的貧民階級；他方面就是以前十分之一的富有階級。俄國角錐形的特權制度已經互相顛倒了；角錐形體的頂已經打倒了。他們似乎要使俄羅斯變成窮人的天堂與富人的地獄。他們有幾分已經成功了。在一方面工人能夠得到階級的正義與利益。他們有許多特權在沙皇統治底下是從來所未知道的。鮑爾文（Roger Baldwin）在研究俄國的公民自由權以後說，『俄國的人民能夠享受他們歷史上從來所未有的更重要的自由權，並且有許多自由權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能享到的。』講到經濟上的自由權，他指出俄國全國的土地都已經從這種剝奪勞工的特殊階級的手中釋放出來。農民現在自己可以有土地，能管理他們的村莊，很少受外界的干涉。合作社，機器的耕種與改良的農業的鼓吹，窮人的保障，教育與娛樂的

豐富，都可以給人家看得出來的。雖然從這種競爭制度改變到合作制度的過程，常常使人感覺痛苦的。在大多數的農民與工人中間一種新創造能力的發生，是很可令人注意的。但是他們自己不大覺得的。他們常常要出怨言，不過若有人要把他們的所有權奪去，而恢復沙皇時代的地主制度，那末他們要出死力相爭的。

俄國的工業工人在管理他們的工資，工作狀況以及國家的政治方面，比任何國家裏的工人有更多參加的機會。普通八小時的工作已經減少到差不多七小時。七天中休息一天，已變成五天中休息一天。僱主對於工人是不能任意開除的，除非得着工會的同意。教育與醫藥等費，對於工人都可免去的。在政治方面看來，憲法中也規定說：『一切權力都歸諸全國勞工的民衆。』

在俄國地方，俄羅斯民族佔居人口中三分之二，另外有六千萬少數的異國民族也能得到公民自由權，並且他們所有一百多種語言與自立的教育機關也受着政府的保護。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或是法西斯蒂統治下的意大利，對於這種的少數異國民族，常常要採用壓迫的手段。所以現在俄國政府對於少數異國民族的態度是別個國家所難及

的。他們用法律和宣傳的方法來打破種族的成見，或是種族的區別。有一位眼光銳敏的考察者說：『俄國比世界上任何異族雜處的國家更能拋棄種族的成見。』

從另一方面看來，在一個工人的狄克推多制度底下——無論這種制度是怎樣暫時的——公民的自由權要縮小到好像世界上有幾個國家一樣。他們對於一切的交通機關都要檢查，而對於任何有組織的反對都要完全壓制。照盎格羅薩克森國家所知道的，那邊沒有組織反對黨的自由。至於有組織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或是出版自由都是不許的。政治上的自由是不准的。合法的機關祇限於共產黨一黨，而在黨內若有右派，或是左派起來反對多數的決議案，或其中有權力的團體是很危險的。現在俄國所放逐的政治犯與宗教犯，究竟有多少數目，從來不許人知道的。這就足以證明他們對於自由權的否認了。

在一種似火一般的十字軍底下人民非但會容忍，而且會歡迎阿剌伯地方的一個先知，或是俄羅斯地方一個無產者的『神權』；但在一種文化很高尚的社會中，人民不能准許一種比較小的黨派控制一切新聞與言論的機關。在俄國地方，沒有一種私有的自

由印刷機關。各種新聞紙是由共產黨與蘇維埃中的委員，或是工會，或是其他正宗派共產黨員所把持的公共機關所刊行的。俄國的工人，在經濟上比較是自由的，不願意把他固定的權利掉換一種在被資產階級所統治的，自由的，政治制度底下的投票權。

但是一個自由國家中的文明國民，也不願意把他人身的保護權拋棄，而很容易爲了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原因，就被政治的警察逮捕，監禁，並且受秘密的審問，以及放逐到不明的地方去。各人看各人的制度，都互相覺得可怕的。現在快樂的工人在假期中居住的皇宮別墅，都可受人參觀的。但是在北方寒冷的白海中政治犯與宗教犯所住的索羅維耶茨基島（Solovyevsky Island）是不准人去參觀的。俄國人恐怕這些地方是要出醜，正如美國人對於他們黑暗的監獄制度一樣。

俄國的共產黨要想在組織的形式上變成民主主義化，並且將來也許會達到這個地步的。但是他們把他們的反對派——可算俄國唯一公開批評的政治勢力——驅逐出去，因此就把他們的民主主義範圍縮小，而容易變成一種不可容忍的專制政體。

蘇維埃的制度，允許人民有最後的自由與民主政治。但是牠對於輕信的共產主義

者所信仰的未來千禧年是有阻礙的。他們要抵補現在所損失的自由權，那末，就必須使人民信仰將來的天堂能夠好像現在世界上的正義。現在世界上的兩種社會制度，都不可拿將來的允許來做判斷，却要拿現在的事實來下批評。資本主義給人民一些現在的自由而允許將來的正義。共產主義要替現在的窮人爭得即刻的社會正義而允許將來的自由。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裏，列甯曾經主張說：『俄羅斯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憲法，必須保障：（1）人民的主權。……（2）在二十歲以上的國民都有普及，平等，直接的參政權。……（3）在選舉時有無記名投票權。……（4）個人與住宅不能任意侵犯。（5）宗教，言論，出版，集會，罷工與組織工會，都有無限制的自由。（6）人民有選居與擇業等等的自由。』

但是他在他的『政府與革命』裏說：『祇有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裏，那時資本家的反對終已破除，資本家也完全消滅，從此不分階級，只有在那時，政府可以無形消滅，並且各人都可以講自由。祇有在那時候，才能實現一種真正的民主主義，就是沒有例外

的民主主義。祇有在那時候，民主政治的本身漸漸凋謝，因為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人民會漸漸的慣于遵守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會慣于守法，所以不必再需要武力，強迫，壓制，以及所謂「政府」的特殊機關的威權。」

布哈林寫着說：「爲什麼我們實在需要這種狄克推多制度呢？我們需要牠，爲的是要有組織的破壞中產階級的統治。我們需要牠，因爲我們可以用武力把無產者的仇敵打倒。我們很公開的說，要用武力的。狄克推多的制度，就是無產者手中的斧頭。凡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乃是一個恐怕有堅決行動的人，也是一個恐怕傷害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不是一個革命者。在我們完全把中產階級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不需要了。但是這種有生死關頭的戰爭還要繼續下去的時候，那末，我們絕對要依靠工人階級去把牠的仇敵完全打倒。所以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是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所必需的。」

第九章 俄國的宗教

蘇俄的真相

一五七

自從西曆九八八年基輔的佛拉德米爾（Vladimir of Kiev）信道以後，俄羅斯就採取了希臘的宗教儀式，並從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就是稱爲羅馬第二，因爲莫斯科有一個時期會變成羅馬第三——得到了拜占庭（Byzantine）帝國的遺傳。

在一七二九年，彼得大帝廢棄了教長以後，就和後來繼任的沙皇變成教會與國家的元首。教會非但變成專制政府的擁護者，並且做了他順服的工具，也和警察一樣的算爲沙皇專制時代反動的武器。教堂中的懺悔所常常變做偵查的機關，而祭司成爲沙皇的警察。這種天主教的團體常是富足的，有勢力的，並且腐敗的，幾乎到處做了反動派的代表。同時這些農民却有真正的宗教虔信，而許多教士也是很窮苦的。有許多修道院裏的生活是很不名譽的，其中所有假造的聖徒，不朽的身體，就可表明教會腐敗的現象。但是牠最大的一種恥辱就是關乎這個稱爲『神聖的魔鬼』的拉斯蒂丁（Raspoutine）。他是一個醉酒淫亂的人。他的權力能控制迷信的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妻子，並且他的惡勢力可以統治高級的官吏。這些在監禁之中或被放逐受逼迫的革命領袖所知道的宗教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景；所以他們決意要用公衆人道的名義，破壞教會與政

府。在革命以後，俄羅斯東正教的教長對於新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宣戰，並且要運動恢復沙皇的政府。我們如果要明白現在蘇俄的當局對於教會的態度，必須要記得這種全部的背景，就是他們所認為一種鴉片或毒物的宗教。

在俄羅斯所發展的宗教，乃是一種美的神秘主義。牠的禮拜儀式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和諧的與莊嚴的。但是牠缺少道德的要素與社會的眼光。牠是虔誠主義的，出世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與反社會主義的。牠主張慈善事業，却不贊成社會公義。

牠主張反動，却不贊成改良。關於俄羅斯時代的農民，究竟帶着深切的神秘性與宗教性或是一種異邦人獸性的意見是各人不同的。他也許是兩樣都有的。俄國的

馬夫，農民與普通的人在每個聖像，或教堂前都要向胸前畫十字，並且禱告說，『願上帝賜憐憫給我！』這是別個地方所罕見的。但是現在有許多農民，真果會把路上的十字架砍下來，當作柴燒，撕碎他們的聖經，當作捲煙紙吸，並且承認是無神派，正如同他們以前承認是正宗派教徒一樣。其實他們現在所相信的，不過是一種新的從外注入的，宣傳過分的正宗主義。我們祇能在他們思想自由的時候，才能知道在這種怪

物似的，黑暗的，農民的心裏究竟存在着什麼東西。

我們最要緊的是要明白俄國整個的情勢，尤其是共產黨對於宗教的態度。如今有兩種大的社會制度——就是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正在衝突。這種衝突是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與宗教的。這兩種制度在宗教的問題上衝突得最利害並且最難互相了解，即使雙方願意互相諒解，也是很難的。況且兩方的態度公然立於反對地位，並且還要輕信或是歡迎浮詞，謠言與錯誤的宣傳，因此雙方幾乎永遠不能諒解了。我們也記得有時爲了信仰的主義，大家要採取干涉政策，發生軍事運動。我們對於這一點意見無論怎樣不同，但至少總得讓我們明瞭個中的真相。

在這種制度底下吃過苦的蘇維埃領袖對於他們唯一知道的宗教，當然要作嚴厲的反對，因爲國家和教會差不多已經享受過宗教自由的專利權，並且鼓勵人民壓迫一切別種的教派，以及殺戮猶太人。現在蘇維埃政府已建設了一種反教會的國家，以代替國家的教會。在馬克思與列甫的時候，他們已積極反對宗教，並且看宗教是一種迷信的聯盟者，一種反社會的反動勢力，一種出世的麻醉劑，就是否認現在世界上社會的公義，

却允許將來世界上善人的賞賜。

我們最好記得他們以前在宗教手中所受的痛苦。但是這班共產黨員也應當記得過去的歷史已經使自由的美國人對於宗教逼迫發生了銳敏的感想。北美洲的殖民地是爲這班要逃避舊世界政治上與宗教上壓迫的人所建立的。他們正如同列甫與他的同志要想逃避沙皇時代的專制政治一樣。

我們贊成共產黨的黨員反對迷信與幻術，而接受近世的科學及其應用的方法（進化論也包括在內），並且決意解放這班受束縛的與迷信的民衆。我們對於像達爾文那樣的一種莊嚴的不可知論極表同情。但是我們對於一種偏見的，魯莽的，逼迫的有神論或無神論，實在很不能容納的，那是於我們個人的信仰完全無關的。非但科學家會相信宗教，如同密列根（Milikan）或是愛丁頓（Eddington），就是那些不相信宗教的人，自從福耳特耳（Voltaire）或是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一直到蕭伯納，他們也同樣會反對這種否認良心自由與行動自由的制度。自從西曆紀元前三九九年，蘇格拉底死後，就有人爲這種自由吃苦，或得到一部份的成功。所以俄國社會主義民主

黨的機關報社會主義使者曾經在敘述他們的黨員大多數是非教徒以後，就接着說：『但是正爲了這個緣故，我們以爲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大聲疾呼的，非常堅決的，反對現在蘇俄裏面一切宗教都遭着的仇教運動。』

那些慣於容認與自由的盎格羅薩克森人，很希奇共產黨員爲什麼要逼迫宗教。如果宗教是一種無害的迷信，那末爲什麼不讓他自己死去，並且讓近世科學的光照耀在黑暗的迷信裏。我們很難明白他們怎能對於宗教發生這樣不能妥協的仇恨。爲了明白他們的立場起見，作者就想把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所有共同的人道主義的目的以及他們在信仰上，方法上與目的上所有不可避免的衝突作一個比較。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比較

同點（共同的目的）

（一）各尋求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根據於社會的正義與合作，成立在無產階級區別的社會或平等的友愛團體裏面。

（二）各相信一種世界的普及的宣傳政策，個人對於世界服務的使命，無論怎樣都

要服從。各要接近青年與訓練青年，勸人相信主義，教導不識字的人。各對平民表示信仰。

(三) 各對自己的使命，教訓與目的都有一種堅固的信心，各相信自己是世界希望的與人類的救星，

(四) 各是一種絕對的制度，承認自己是唯一的救法，希望得勝全世界，並且對於一切其他的方法與妥協大半是不容忍的。各相厭惡與譴責。

(五) 各相信社會的服務，個人的犧牲，個人對於主義的絕對服從。各在學理上主張簡單的生活，共同的享受，反對自私自利的積蓄與獨霸專有的財富，大量的施捨，忠誠的擁護，對於弱者的看顧，對於窮人的負責，對於社會正義的熱忱，對於社會的罪惡與牟利者發生道德上的憤慨。

(六) 各相信一種預定的公義社會能建立在世界上，所以武力的政府也不需要了。

(七) 各受逼迫與武力的反對。各相信有價值的競爭。各方的正宗派都相信默示的，劇變的，破壞的世界戰爭，或是世界末日罪惡最後的決戰；此後一種新的秩序就

得到勝利——一種秩序是超然的；其他一種是自然的，藉着工人組織的力量造成的。

異 點

共產主義

(一) 看宇宙是物質與盲目的能力所產生的機械動作；宇宙間沒有上帝；人沒有靈魂；個人沒有絕對的價值與耐久的人格。

(二) 絕對的忠于主義，革命與社會的統治。

(三) 暫時主張為一個階級謀利益的社會主義，其目標為一個無階級區別的社會。

(四) 階級仇恨的動機，造成了階級鬥爭。

基督教

看宇宙是上帝智慧的與目的的代表；耶穌如同長兄，能顯明宇宙的性質；人為上帝的兒女，有無限的價值。

絕對的忠于個人的良知和上帝。

主張為全體人類謀幸福的世界主義。

只贊成愛的動機。

(五) 看一種絕對的狄克推多制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

(六) 破壞的革命；強制執行的政府。

(七) 用強迫手段造成一種目前的新式的，創造的社會正義的時代。

主張個人的自由——政治的，公民的與宗教的。

建設的進化；取得同意的政府。

允許將來個人能得救，並且藉着教育與道德的勸導方法，可以造成一種最後的公義或社會正義的時代。但在歷史的沿傳上，常要維持現狀，而久已和社會的不公道妥洽了。

爲了要明瞭蘇俄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起見，作者曾去訪問關於此事的最高蘇維埃官員。因爲他這種談話的重要，我們就完全把他的話引證在這裏：

『你要問教會現有的地位與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什麼。在階級鬥爭中，這種教士階級常要擁護白軍，而這些修道院有時會變成砲台來反攻我們。這班祭司常要領導民衆，從事反革命的運動，以反抗政府。有許多白俄在國內失敗了以後就逃到外

國，並且在法國、美國，以及世界各處唾罵我們或捏造我們各種的謠言。在教會分裂以後，窮苦的教士對於我們的態度更爲友善。但在教會中這種改良派還是少數。

在鄉村裏，教會的宗教大抵都是幻術與迷信。我們的態度很是寬容，所以使各種宗教團體在法律上也有地位。這種反抗我們的宗教勢力，不是君主主義的，却是中產階級的，而且要想和新經濟政策底下的商人，富農與知識階級聯合起來，好使我們的仇敵向我們作一種總攻擊。他們僱用別人的勞力，並且常常和我們的經濟計劃相衝突。我們現今在農民社會化的時期中，實在是我們生死的關頭。凡是與我們的經濟計劃對抗的，在我們看來都是反革命。所以凡是反對我們集團農業計劃的祭司或牧師，都是我們政治上的仇敵。有些人要利用宗教做他們反對經濟計劃的假面具。政府對於他們的計劃，是依照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態度與活動而定的。

『復次，俄國的宗教團體，尤其在非正宗教派當中，有許多外國的關係。他們的經費是從外國來的。這些外國的組織，把牠們宗教的刊物與宣傳的計劃，輸入到俄國來。牠們甚至在外國訓練牧師與宗教的工作人員到俄國來服務。浸禮會、安息復臨

會與福音會的外國關係，就是其中的特著者。

「你又問起最近法律上與憲法上關於宗教條文的改變。我們對於自由或良知的原則並沒有改變。沒有一種宗教或是信仰是受過逼迫。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陰謀，或是經濟上的反抗，到處要受壓制的。在我們的政策底下，宗教當中幻術的與迷信的分子已經消滅了。但是我們的高級官員，看見有些地方的民衆，對於教會發生了憤怒的氣概與反抗的行動，也不得不禁止的。」

「你又問到在宗教上有什麼原質是和現在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必然衝突的。我的回答說是；宗教與蘇維埃政府是必然的和絕對的不能相容的。這兩種制度，當然是互相衝突與對抗的。我們絕對的主張反對一切剝奪行爲，奴隸制度與社會的不公道。宗教在傳統上，而俄國的宗教在習慣上，准許壓迫手段的。你們主張階級的和平。我們主張階級的鬥爭。你們基督教的原理是要使階級鬥爭的刀鋒變鈍。我可以重複說，沒有一個人是爲他的宗教信仰而受逼迫的，却是因爲他在政治上，社會上，或經濟上反對我們的計劃而受裁制的。」

「我們特別注意普通學校中與大學中對於青年人所施的宗教教育。我們看宗教是一種極大的迷信。我們很想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保障純粹的科學得到勝利，並且要從青年人的心中把一切和宗教連帶的迷信與反社會態度的痕迹都要除去。」

「我們知道在你們自己的許多大學中，如同田納西（Tennessee）省的大學中，他們禁止學生研究達爾文與進化學說。你們有許多先天的迷信的見解存留在你們的大學裏，所以宗教在那邊似乎仍舊是逗留着。每個科學家必定是一個無神論者。你說在美國你們有自由教授有神論或無神論，宗教或反宗教，並且你問我們為什麼不讓人民自己去選擇，並相信他們所要相信的東西。我們說，人民不會相信他們所要相信的，却要相信人家告訴他們的東西。所以我們就是要告訴他們應當相信些什麼東西。」

兩方面的人，大半都不知道這兩種制度的衝突，在現在的情勢底下是何等的重要與普遍，並且是幾乎不可避免的。比方說：多數的共產黨員會對一個人確定說，現在在俄國地方，並沒有什麼宗教的逼迫。他們中間也有許多的人很誠實憤慨的否認宗教逼迫的存在。若使這樣，那末，足見他們並沒有知道事實。如今在俄羅

地方，人民簡直生活在兩個隔離很遠的世界裏，比任何別的國家裏的情形還要顯著。

在俄國人生活中，有一種奇怪的反常情形，就是在階級專政底下，他們會對於別個階級發生一種恐怖的心理與一種懷疑或輕視的態度。因此個人或團體的生活好像分成兩個水洩不通的房間。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知道政治部或共產黨裏面的秘密會議究竟是在做什麼。只有少數的共產黨員能夠知道基督徒的團體是在受什麼逼迫。

讓我們考察共產黨員所提起現在俄國並沒有宗教壓迫的話。在過去的三十五年中，作者有很好的機會在美國，亞洲與許多歐洲國家裏的學生中間做工作。照作者所知道的說，世界上只有俄羅斯這樣的文明國家，不准組織基督教學生運動，或宗教的學生集會。只有在這個國家裏，即使有三四個基督徒學生也不能秘密的或公開的集會，以討論宗教。作者也知道有些基督徒學生，爲了他們的宗教信仰曾被拘禁，有些是在放逐中，有些已經從大學裏開除出去，還有許多不敢作聲，住在秘密地方過他們寂寞的生活。在作者是跡所到的地方，祇有俄國的大學生，若使對公眾宣佈了他的宗教信仰，那麼沒有不遭輕蔑的。

蘇俄的憲法，果然說保障良心的自由與禮拜的自由。法律上的條文是已經實行了，因為牠准許多數的禮拜堂能夠發生功能。這些禮拜堂都與基督教和一切其他的宗教有關的。作者若見大多數的禮拜堂能夠照常舉行宗教儀式，毫無阻礙，並且做禮拜堂的人也還算多的。所以政府總算是遵守法律條文的。但是他們看見一個祭司或是牧師具有无知的口才，或是有效的行動的時候，如果他又能接近學生，青年，勞工或其中任何的有力階級，他立刻就發禁止發言，或被放逐到別處地方。他要為秘密偵探隊中的法庭所審問。有時他這種審問很是靜默，甚至他的鄰舍也不知道他遇見了什麼事情。有些人已經被移去了，有些已經被放逐了，有些人的教會或禮拜堂已被封閉了，有些已經從他們的機關裏趕走了，或是把他們的出版物停止了。但是幾乎一切有力的傳道者或是活潑的宗教工作人員，都被禁止發言了。

現在俄國在其他許多方面的情形，大概比沙皇時代好得多。但是作者要在現在去尋找舊俄羅斯專制政體底下的宗教自由，也得不到十分之一。歐戰以前，在莫斯科城中——就是我們現在寫這本書的地方——我們雖然被警察禁止，還是可以召集學生，舉

行宗教演講會。每夜聽講的學生總有二百多人，甚至把兩間連接的學生課堂都擠滿了。現今在蘇俄地方，我們爲了學生安全的緣故，不敢召集四五個學生在公眾或私人地方討論宗教的問題。

在十八年以前，我們在莫斯科地方可以和學生聯絡友誼。我們在七年以前到這個地方來遊歷的時候，我們仍舊能夠單獨的去會見他們，雖然我們不能夠召集很小的學生團體，把別地方學生運動的情形報告給他們聽。現在我們却不敢去會見他們了。舊時的知識階級或宗教階級中的俄羅斯人，現在大半都不敢和我們外國人有什麼來往。

這種理由是很顯而易見的

蘇維埃領袖對於宗教的態度是很明白的，一致的，並且難以和辯的。因爲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要把他們所講的話引證出來。列甫在早先革命的時代，曾經明白的把共產黨員對於宗教的正式態度敘述過。他說：「社會民主主義的哲理是根據於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與恩格爾常常宣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根據，就是辯證法的唯物主義——這一種唯物主義是絕對的，無神主義的，並且強烈的仇

視一切的宗教。……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種思想就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理中對於宗教問題的基石。馬克思主義看一切宗教與教會，以及一切宗教的組織都是中產階級的反動機關，要麻醉工人階級的心思與延長他們的剝奪。」

列甯對恩格斯反對向宗教宣戰的主張，因為這是一種愚笨的，而反使宗教復活的最好方法。他以為照政府方面的關係看來，宗教是一種私人的事情。但是牠與每個黨員是無開的。他繼續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唯物主義。……我們必須反對宗教。……這種戰爭的目標，必須在於除去宗教的社會根源。……現在宗教的根源，就是在於民衆所受的社會壓迫，並且他們也顯然毫無力量對付資本主義的盲目勢力。……我們堅決的反對有人要使他們宗教的信仰受着一些兒傷害。」

列甯又說道：「宗教是精神上壓迫的一種形式。民衆所受精神上的壓迫，各方面都有的。被剝奪階級因為無力抵抗，就難免發生一種在死後享福的信仰，正如同野蠻人因為無力控制自然，就產生鬼，神，奇事，異蹟等等的信仰。宗教對於窮苦作工的人，要教導他在世上總須順服忍耐，而又用一種將來可以得到天上賞賜的希望去安

慰他。宗教對於那些依賴別人勞力的人，要教導他們在世上必須做慈善的事業，又替他們很容易的辯正一切劍毒的罪惡，並且賣給他們減價的車票，使他們達到天堂的幸福。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史丹林表示他對於宗教的態度說：『共產黨對於宗教不能守中立的。凡是阻礙反宗教宣傳運動進行的共產黨員，在黨裏是沒有地位的。』

布哈林總括這種黨教全部的爭論說：『宗教與共產主義在理論上與實際上都是勢不兩立的。』『基督教的經典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在許多地方，共產黨的策略與宗教的誡命之間是要發生一種不可調和的衝突。』

他們脫離了沙皇的壓迫以後，最初對於宗教所定的法律與憲法是很寬容的。

他們最初的憲法准許宗教與反宗教宣傳有同等的自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第五條規定說：『爲了要使工人得到良心上的真正的自由起見，教會應與政府分離，學校應與教會分離；同時一切國民都有從事宗教與反宗教宣傳運動的自由權。』在這種宗教自由的政策底下，有許多非正宗派的活動進步得很快，其中尤以浸禮

會與福音會最能強固的感動農民，工人與青年。共產黨員看見這些宗教團體的信徒，比歐戰以前增加了三倍，並且聽見說有幾百萬信徒參加他們的禮拜儀式，不覺大吃一驚！在一九二八年以後，一種更活動的反宗教政策是很顯然的。憲法上的條文已從『一切國民都從事宗教與反宗教的宣傳運動的自由權，』改為『一切國民有承認宗教信仰與反宗教宣傳運動的自由權。』這種改變就可證明政府對於宗教自由的限制了。

在現存的法律底下，不足二十個年在十八歲以上的教徒，是不能組織宗教團體或教會的。這種宗教團體必須註冊。每個教徒祇可屬於一個地方的團體，並且每個團體祇有權使用一個禮拜地方。宗教的團體不准做一切教育的，慈善的，社會的或實際的活動事業。他們不許組織合作社，農業上或工業上的團體。他們不准爲了兒童，青年與婦女『舉行特別祈禱會，……教授文字與手工，……發起旅行與兒童集會，設立圖書室與閱報室，組織療養院與施診所。』他們的教產都歸國有。在任何公立的或私立的教育機關，教授宗教是被禁止的。但是爲了那些十八歲以上的教徒，可得特許組織精神學班。

在起初的時候，蘇維埃的當局對於東正教會是仇視的，而對於非正宗教派比較寬容些。因為牠們在沙皇的時代曾經同他們一樣的受過逼迫。這種非正宗教派的進步與成功，就使他們的態度頗倒相反。在城市中與鄉村裏多數的東正教堂仍然閉着，照常舉行禮拜儀式，和革命以來的情形一樣。但是大多數的非正宗教派的禮拜堂已被封閉。至於牠們的俱樂部，集團農場與合作的團體也遭同樣的命運。

作者在遊歷俄國的時候，常常到城市與鄉村的教堂裏去參觀。有一個禮拜六的晚上，他在莫斯科參觀了八個教堂。這些教堂差不多和歐戰以前一樣的充滿了信徒。那邊男人，婦女與少女都有的。但就工人與農民而論，男孩子與男青年是很少到禮拜堂裏去的。

在一九二二年，蘇維埃政府把教會的寶物變賣，以充賑飢之用。有些反對這種舉動的主教就被槍決，放逐或是拘禁。在無神派的政府與正宗派的教會之間，公然發生一種戰事。前者爲了要揭發教會的欺騙，就把『不朽的聖徒』屍棺揭開，把枯燥的骨頭，醜做的軀殼或是假造的裝飾品曝露出來。這些東西都是從前用以欺騙朝拜聖

地與修道院的迷信民衆。那時人民對於假冒爲善的，不敢衆望的祭司與修道士，也常有發生野蠻的舉動。東正教的教長，公然對於革命的政府宣戰。教會裏的領袖，無論是全國的或是地方的，常常和早先反革命的勢力聯絡，以顛覆政府。後來他們和這班富農與那些反對政府集團農民的計劃的人站在同一的戰線上。

政府的官員，共產黨黨員與反宗教組織的會員，也要盡力壓倒教會。他們很歡迎，並且要鼓動教會中內部的紛爭。他們也想使教長的代表在教士與民衆的眼前失掉威信，阻礙教會的中央機關與地方教會中間的交通，破壞神學的教育，禁止兒童的宗教教育，同時却推廣反宗教教育。他們在法律上規定苛刻的限制條文，並且漸漸的增高祭司與教區的稅則，於是把許多祭司都除去了。他們曾經拘捕或放逐許多最能幹的與最敬戀的教會領袖，大概讓這班拘於儀式的與沒有妨害的祭司去主領宗教的儀式。他們已經封閉許多宗教的報紙，並且制止宗教的宣傳運動。他們已經取消修道院與許多最受人尊敬的聖地。他們在政治探訪局第三科指導底下，在教會裏的教士與教友中間用恐怖與經濟壓迫或其他方法來組織一種偵探的制度，以偵察並排擠教會中最有勢

力與最有效能的代表。這班共產黨的黨員和其他一切的文明世界對於舊時沙皇的祕密偵探，都很嫌惡與憤慨，並且要剝奪他們和他們家裏的人一切的選舉權。然而他們自己的政治探訪局也同樣進行使人嫌惡的工作。照這種活動看來，他們怎能希望全世界的人對於他們的態度會比對於沙皇時代卑鄙的警察還要好呢？

這些教士如果不能捐納重稅，他們的財產就被充公，或由國家沒收或拍賣。教士的子女因為他們的家系關係，常常被公家剝奪許多的權利。他們常被拒絕進入普通的學校；至于大學更不必說了。這些教士是不能得到醫藥上的助力。自從一九三〇年一月以後，他們也無權使用郵筒，電報，電話，以及寄發信札，滙票或包裹，這就使在放逐中的教士大受困難，並且把他們當做法律範圍以外的人。依據政府的統計，現在宗教中的牧師百分之五十已超過五十歲年紀，而祇有百分之五是在三十歲以下的。神學上的訓練人員已有限制或受阻礙，因此他們也許會達到肅清宗教師的最後目的。

在西方那些慣于享受公民自由權與宗教自由權的人看來，宗教的逼迫在二十世紀的時代是不可設想的。但是在共產黨的黨員看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與容忍主義都是

中產階級的成見。在蘇俄政府的公報新聞報（*Isvestia*）上說：『宗教的容忍，當然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原質，然而我們的憲法上也有這樣的規定。這種自由主義的原質是被共產黨包括在他的政治上與文化的行動裏。這並不是因為他要傾向於用和平手段對待宗教的儀式與習常，當然也不是因為我們對於宗教的仇恨與消滅他的努力有減弱。反而言之，我們所說的宗教容忍，祇因為便于縮小戰爭的範圍，並且要避免使用一種無價值的武器。我們的國家仍舊充滿了許多宗教的信徒。我們如果向他們挑戰，作一種最後決勝的戰爭，並且爲了禁止信仰的緣故，對他們宣佈壓迫的政策，那末我們就要變成祭司的擁護者，因為這些方法能使民衆的重要部份即刻投到祭司的懷中了。』

看了上面的情形，我們就可以明白現今在教育方面反宗教的運動。列甫夫人克勞斯下耶曾經說：『我們必須漸漸的把一種唯物主義的精神灌輸到教育裏去，努力的對於兒童的組織用工夫，在他們中間發展友誼的精神，並且更深切的把宗教的根拔去。』

蘇俄前教育部長盧那查爾斯基因爲估計學校中的教員還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是宗教信徒，所以他警告這些宗教徒的教員說：『信仰宗教的教員，在蘇維埃學校裏實在是

一種不雅觀的矛盾，所以普及教育的各部份必須利用每一個機會，去使這班教員換做有反宗教情感的新教員。」他在第十四次全俄蘇維埃大會裏說：『我們一切的文化機關必須當做站在一條掃除宗教危險的戰線上。……我們願意用最暴虐的手段來把這種惡草從花園裏連根剷除。』

作者在前次遊歷俄國的時候，曾經和俄國鐵路局長與共產黨政治部部長魯剪塔克（Rodzinski）唔談過。他很失望的講到一個美國商人在俄國銷售他貨物的時候，似乎同他們很是交好，不料他離開了俄國以後，就很苛刻的批評蘇俄全部的制度。我們忽然覺得這些領袖也許說我們的考察團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因為我們在回國以後，一定要批評他們的。因此我們就去會見特羅茨基的妹妹下馬納瓦夫人（Madam Kama nova）。那時，她是文化協會的會長，並且請求她代我們設法與蘇維埃的領袖作一種友誼的談話，要確確實實的告訴他們，我們對於他們的制度有什麼意見，我們將要對於這種制度說些什麼話，寫些什麼書，並且要老實不客氣的把我們各種的批評獻給他們，好使他們有機會辯護他們的立場，這是我們最願意知道的。

會談的時期就此約定了。我們考察團中廿四個美國人就開了一個會議，討論他們的制度，照我們的意見看來，有什麼最大的罪惡或缺點。我們揀選了四個人提出四種主要的訴狀。這四種批評就用書面預先交給蘇維埃的領袖；他們方面也揀選出四個人來，陳述他們的理由。我們提出的四種重要的罪惡就是：（1）他們的狄克推多制度使自由的範圍嚴格的縮小；（2）他們武力的世界革命政策；（3）他們對於宗教的態度；（4）他們和別國的關係不能鼓勵別個國家合作，承認，借款，租地或貿易。

我們用四小時的工夫，把這四種論點赤裸裸的攻擊他們，並且請他們揀選出來的人陳述他們的理由，辯護他們的政策。我們從來沒有在別的國家裏或是在別的時候，會像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嚴厲殘酷的提出我們的批評。他們接受了我們的理由，並且用很好的態度和精神來回答我們。我們兩方面說話的時候，都根據實在的情形與客觀的態度。這是我們從來所知道的一種最有趣味與最有益處的討論。

作者是其中第二個發言的人，並且質問他們說：如果共產黨確定的目標是以世界革命，推翻世界上現存的政府，那末我們為什麼要承認他們或借款給他們或和他們會發

生其他合作的事情呢？作者也申述我們當中第一位發言者對於他們否認自由的批評。

在那個莫斯科城裏，處於不可言狀的沙皇統治底下，我們能夠召集學生舉行演講會，正如同我們能夠在俄國各處對於信徒或非信徒有神派，無神派或不可思議派所做的工夫一樣。那末我們爲什麼在現在的政府底下不能自由做這種舉動呢？爲什麼這是世界上唯一號稱文明國家中的政府不准對於學生召集演講會，以討論宗教的問題呢？

無神者週刊 (The Godless) 的編輯起來回答說，在他們的憲法中，並不阻止我們舉行這樣的演講會。我們根據這種言論，就要求他在下星期日舉行一種公開辯論會，以討論宗教問題——就是有神主義對無神主義。他立刻就接受我們的挑戰書，並且我們對於辯論的條件也互相商妥。我們決定有四個講員，其中兩個爲基督徒，就是作者與一位俄國朋友；另外兩個爲無神主義者。每一個講員限定講一小時，連解釋疑問的時間在內。

我們就在城中得到了一個大的演講廳，在報紙上登了廣告。在四十八個鐘頭以內，每個位置都已賣出，並且照我們的協議，把售得的款子一律捐給孤兒院。我們預

料要碰到無神派的聽衆，也許會在辯論上失敗。但總希望把宗教自由的門能夠推開一點。我們很詫異看見有三分之一的聽衆是基督徒。他們很勇敢的問題這兩個共產黨的黨員，正如同這些無神派問這位當辯論員的俄國基督徒一樣。大約有二百多個書面的問題交給我們答覆；例如：『請你替我們解釋私刑與基督教的關係；我們在此地並不橫加私刑於人民，也不爲了他們的膚色或種族關係不給他們公義；但是我們知道你們在基督化的美國要把黑人加以私刑，這種行動和你們的宗教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辯論會在星期日下午開始了。五小時以後，這個演講廳因爲另有他種規定，我們就不得不宣佈散會。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辯論也許還要延長許多時間。無論如何，在作者看來，俄國人對於宗教的興趣，實在是極重大而深切的，所以沒有一樣東西能把他心裏的宗教根性拔起。專制的統治，也不能永遠加在一種長時期吃苦的人民身上，祇要一朝真正的自由爲政府所允許，宗教就能夠恢復自己，並且能在人的心靈中各種甚要的能力方面表顯出來，這是歷史上常常碰到的事情。

我們對於辯論會的主席，一位俄國辯論員與大多數聽衆的公平態度很受感動。但

是次日在報紙上所登載的報告是很不容忍的與最不公道的。我們因為俄國地方沒有一個私人的或自由的報館，所以也不能夠把我們這一方面的理由回答他們。

他們這種願意和我們辯論可以表明那時他們確有些容忍的精神。那是一九二六年
的事。如今各樣東西都已緊緊的縛住了。在政治上對於一切的反對派取締得很嚴。
在宗教上對於教會尤其是以前成功的非正宗教派反對得更加堅決了。我們要想和領
袖作這樣的討論，或和他們舉行這樣的辯論會，在現在是不可能的了。在俄羅斯地方
的景象，真是千變萬化，所以在將來恐怕隨便什麼事情都會碰到的。大概在這幾年當
中，他們要從學生界，少年運動，紅軍，工會，集團農場與學校中用全力把宗教最後的
遺蹟連根拔掉。

照許多富有學識經驗的考察家的意見看來，共產黨的黨員必須從兩條路當中揀選一
條。他們可以揀選一種無限制的專制政治，養成一個模型裏製造出來的機器人。凡
是真正覺悟的，批評的而有自動力與自治力的人，對於這種硬化的手段是不能永遠容
忍的。或者他可以揀選一種自由制度，因此使宗教從暫時停止宗教活動的階級裏從新

發現出來。這是從歷史上可以証明的。

他們所宣傳的無神主義，實在是一種狂熱的宗教——他們對於這個名辭雖然是很厭惡的——並且比較他們以前的拜占庭宗教中美的神祕主義，未必能維持更久的。現在俄國有一個最有力的傳教師，以前是一個堅決的無神主義者，不過他只好暫時緘默，因為真正有勢力的傳教師在俄國是沒有自由的。有些在西比利亞的村莊，以前曾經因為無神派的宣傳，就從正宗派的宗教而改信了無神主義，後來那些地方又因為受着自由教會中幾個活動的新式傳道士所感動，就到處充滿着新的有力的宗教生活。專制政治既不能試驗真理，又不能測量信仰。俄羅斯遲早要在自由與專制之間揀選一條道路。一種處在奴隸式的順服或宗教壓迫底下的民族是不能領導世界的。他們一朝被人准許自由，或他們自己取得了自由以後，我們就可以知道究竟是無神主義還是有神主義能居留於人的心裏，到底非宗教還是宗教是自然的。我們看了這兩種制度的結果，才能批評他們的好歹。在一種自由主義與宗教的制度底下，仍然還存在貧民窟，童工，失業，私刑吊打，偷漏私販，不法行為；那末這一種判斷不能預先決定的，

除非那些堅決的宗教家能下一種獨斷的先天的結論。如果宗教在這些經濟與社會制度中，經過了一千九百多年，並且在沙皇制度底下也經過了四百多年，至多能做到這樣的情形；那末，單單用信條來辯護是不夠的。

從一方面看來，如果共產主義的制度甚至不敢給對方一種申說，如果牠包辦一切的宣傳而總攬一切的權力，並且祇能用繼續不斷的武力來維持牠的本身；那末牠給異理受着什麼的試驗，並且還有什麼希望得到世界上思想自由而受過教育者的同情呢？

在一方面，如果基督教在一千九百年以後，還沒有實驗出有什麼缺點，並且也沒有好好的被人試驗過；那末錯誤在什麼地方呢？在他方面，共產黨對於自由的人如果不敢讓任何事情都被試驗出來，祇聽從於黨中一個很小團體的吩咐，還有什麼可說呢？設使有一個人從火星裏到地球上來遊歷，那末大概要斷定說，這兩種主要的制度，無論怎樣不可較量，相差太大，都還在試驗之中與審判期內。

俄羅斯現在正在延長宗教勢力與非宗教勢力的戰事。在許多家庭裏，我們看見這些聖像已代以列寧的照相。在別的家庭裏，這種聖像是在一邊，而列寧的照相也放

在另外一邊。這種情形有時表明夫妻中間信仰的分別，或是在一個人心裏有同等的信仰。現在俄國反對宗教最兇猛的行動，是爲『戰鬥的無神派同盟會』所主持。

這種同盟會的宗旨，依據牠的憲章說，是『要用各種方法與形式對於宗教作一種活動的有秩序的與繼續的戰爭運動』。作者曾經到莫斯科去參觀他們的總事務所，看見裏面有一班能幹的與誠懇的義務工作人員——其中大半是教授與學生——以及少數受薪的職員。他們的誠實與熱心是顯而易見的。在他們看來，這當然是一種狂熱的十字軍，要推翻他們所知道一種最大的罪惡，如同人民的鴉片或毒物一樣，並且要建設共產主義的新千禧年時代。他們坦白的與驕傲的說明他們的工作方法是藉著雜誌，傳單，標語，演講與其他各種可能的方法。他們很得意的敘述他們在封閉教堂方面的成功。他們常常兩個兩個的到教堂的附近地方去詢問每家的居民是否歡喜這個教堂作爲星期日禮拜之用，還是歡喜牠變成有用的俱樂部，就是公衆娛樂的地方。他們若在附近地方得到了大多數人簽名，贊成他們的計劃，他們就請求官廳把教堂充公，作爲通俗的用途。所以他們宣稱在莫斯科地方，有一半多的教堂已經封閉了。如果這樣，那

末在俄國所有五萬的教堂當中大多數還是開着，雖然在以前四十萬的祭司中只有少數還能執行教務。這種無神派同盟會以及蘇維埃政府刊印了許多農民用的反宗教教科書。這個同盟會已經製了二十多張反宗教的影片，以備宣傳之用。他們也差遣演講員與宣傳員出去做工作，正如同別的宣道會一樣。

無神派在紅軍與高尙的教育機關裏是很活動的。莫斯科地方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團，受了他們的煽動以後，就禁止該地的教堂打鐘，於是全城都變成靜默了。有許多教堂裏的大鐘已經被移去，作為五金工廠裏的原料。

在十三個城市中，已經開設了特別的反宗教大學，以訓練領袖出去做無神主義的宣傳運動。無神派同盟會刊印了許多報紙與雜誌。除了這些以外，在一九二九年發行了五百零七種反宗教的出版品。在最近的一個辯論會中，有人表示驚訝說，現在俄國有二百萬青年人已經加入各種宗教的團體。同時無神派同盟會却宣稱那時該會有二百五十多萬會員。大概這兩種數目都是鋪張揚厲的。無神派同盟會曾經統計他們歷年來會員的發達情形如下：

蘇俄的真相

一八七

蘇俄的真相

一八八

年份	會員數
一九二七年	九八四〇二人
一九二八年	一二三〇〇七人
一九二九年	七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〇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該會反宗教的五年計劃，要想使他的會員數目從三倍增加到五倍。但是他們爭鬥的方法，常常引起人民的反感。在洛猛斯基（Romensk）地方，有一個聖誕節，他們在教員的家庭裏，舉行一種過分熱烈的反宗教運動，使一切的小孩子大受驚恐，而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因此該同盟會也承認了他的錯誤。然而他是一種含有永久性的機關，和其他的宣道會站在同等的地位。

在一九三〇年起初的幾個月當中，集團化以及反富農與教會的運動非常激烈；而全世界反抗俄國壓迫宗教的呼聲也很普及，於是史丹林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做了一篇關於集團化運動的文章，其題目稱為『轉首成功』。他在這篇文章裏，很苛刻的攻

整那些祇曉得「拆下教堂的大鐘當作集團化起點」的人。於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也公佈說，「凡是離開黨的路線去反對宗教成見的舉動是在所不許的；」同時各處的黨部「應當強切停止牠們假借人民自動要求的名義去呈請行政機關封閉教堂的行動。」

在反宗教運動方面的勢力，似乎是很強固的。他們宣稱已經有三百萬人加入了無神派同盟會。我們知道共產黨大約有二百萬正式會員與預備會員。他們都是屬於無神主義派的。紅軍的數目有五六萬多人。這是反宗教運動的一個特別區域。這種運動在一千二百萬的工會會員中，也是很有勢力的。少年組織中近乎有六百萬的少年，已被訓練做這種反宗教的十字軍工作。在全部的教育制度中也有反宗教的組織，使少年人心中的宗教根性完全剷除。在集團農場與共產農場裏的農民——佔全人口四分之一——也漸漸的受着反宗教的壓迫勢力。這種運動的後盾，就是狄克推多制度底下一切集合的財富，權力與宣傳運動。

在教會的一方面，從來沒有預備在知識上，道德上，與社會上應付這樣的大難。

然而有幾個被逼迫，受侮辱，抽重稅的窮苦祭司還能夠寫着說：『沒有一種權力，無論物質的或是道德的，能夠破壞我們神聖的基督教的人民，更不能把人類心中上帝的觀念連根除去』。在尼祿（Nero）或戴克里先（Diocletian）時代壓迫宗教的精神，現在從新出現於俄國了。我們除了先天的理由以外，不能過早預料他的結果。教會當然在羅馬帝國的逼迫中——這種逼迫是間歇無常的，野蠻的，愚蠢的——從來沒有碰到過這些冷靜的知識分子所做出來的一種無情的，不容忍的，殘暴的逼迫。在一方面，這種壓迫不該為荒誕的報告所誇張。在他方面，世界各國也不該為蘇俄的法律上或憲法上的條文所蒙蔽。

全世界的人不應當看輕蘇維埃的領袖在這種反宗教戰線中所有的智慧，主張，或是一致的政策。在另一方面，這些領袖也不應當設想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笨伯。俄羅斯所做的什麼事情是不能隱藏的。沙皇時代教會的罪惡是不能隱藏的。這一個團體能夠排斥偉大的托爾斯泰，讓他死時做一個被斥革的教徒，却能允許醉酒的，野蠻的拉斯蒂丁控制沙皇及其皇后，有時，也會指揮兵隊的軍官與內閣的大臣。這種事情

是不能隱蔽的。索羅維耶茨基島上的情形，以及政治探訪局秘密壓迫景象，將來都不能隱蔽的。

美國的人民很少有人覺得全世界的人對於薩契(Sacco Vanzetti)與穆比(Mooney Billings)案件仍舊是很看為嚴重的。俄羅斯的領袖總以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貪心，祇想到租界與商業。他們還不知道全世界的人對於這些道德的與人道的情形更加留心，正如同在沙皇時代一樣。我們希望時候快到，他們把這些罪惡都會矯正，並且我們能夠稱贊他們把全部的政策公佈出來，使世界上的人都能明白真相，正如同我們現在會羨慕他們偉大的五年計劃中許多的方面，以及他們在經濟上所有顯著的進步。

第十章 共產主義的批評

我們曾經向自己發問說，共產主義在學理上與事實上是什麼，並且他在蘇聯是被怎樣實施出來？我們也曾經很簡單的考察俄羅斯農業的，工業的與政治的生活；牠的教養與文化；牠的法律與正義；以及牠對於道德的與宗教的問題所抱的態度 and 所有的舉

動。如今讓我們無偏無黨的把牠整個制度的價值從新估定一下。牠的缺點是什麼，牠的價值是什麼，牠對於全世界生活所發生或好或歹的影響又是什麼。

一種對抗的社會制度的心理，既然先要下一個批評，那末這種制度中顯著的罪惡是什麼呢？照我們的見解說來，這種制度有三種重要的壞處：（1）一種常要發生專制危險的狄克推多制；（2）武力的與破壞的世界革命的政策；（3）一種偏見與不容忍的態度，好像對於宗教逼迫的事情。我們不妨把牠們分別討論一下吧。

（一）狄克推多制

這種狄克推多制度雖然在目的上要使工人階級得到德謨克拉西精神，但是牠有時要變成專制與恐怖的形式。歷來對於解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一個人與許多人的權利，自由與秩序等問題的追索，政治上的重心思想，曾經搖擺到無政府主義與強暴主義的兩個極端。共產黨的黨員雖然知道極端的個人主義與嚴格的共產主義兩方面都有危險。但是他們却選擇了後者，而西方自由主義的國家却採取了前者。他們在這一點上，就發生了顯著的差別與公開的衝突。自由主義要求一種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共

產主義却要求一種絕對的社會控制。

馬克思主張，全部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無論怎樣掩飾，總是根據於武力；到了末了，牠總要用一切必要的強暴手段來保護牠的財產權，以反抗人類應有的權利。所以牠以為唯一的希望是在發動一種武力的革命，並且要經過硬鐵似的狄克推多時期。因為革命常常要產生反革命，所以他們必須用資本主義殘暴的方法來消滅牠的本身。

他曾經說，「工人從最初得到勝利的時候起必須不信任，並且要反抗他們以前的同伴者。」他們公然輕看德謨克拉西為中產階級的一種成見，所以他們祇要信賴少數有階級覺悟的人。他們既不管憐憫，又不知道懊悔，却要奮力的使他們的仇敵恐怖而順服，其手段就是『殺人，拘禁，強迫苦工，箝制言論機關。……革命就是戰爭，戰爭是根據於恐怖。』列雷說，只有在不分階級區別，廓清殘餘仇敵與最後消滅政府的時候，人民才談得到自由。

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我們可以注意這種狄克推多制能擴張到人民一切的生活裏。因為這種擴張沒有止境，所以沒有一處地方可以劃一條界線以限制牠無孔

不入的趨向。一種狄克推多制當然先要統治整個的政府。但若不把財政，工業與集團農業完全控制，那是不行的。一切像工會與合作社等等的組織，必須要和總括的計劃一致符合。然而有許多老年的人，對於新的制度沒有受過訓練，勢必起來反抗或抱漠視的態度。那末對於年輕的人就常用各種方法來訓練他們。所以在一切教育機關裏，無論學生與教員，都要迅速的統轄在這種狄克推多計劃底下。他們要干預每個教員所教的材料與每個學生所讀的東西，所以一切教育都帶着宣傳作用。

一切青年的組織都要養成新的公民。但是單單控制形式上的教育是不夠的。凡是人民所讀的，所見的與所聽的都要依照狄克推多制的『真理』。所以每個無線電收音處，每張影片，每種報紙與每家印刷所，必須要宣傳同樣的消息，或只許無產階級對於狄克推多制作一種與牠的基礎沒有抵觸的批評。

但是，即使這樣，也是不夠的。一切事情既然都要依賴一個黨，就是唯一特許的黨；那末一切事情必須聯合成功，好像一個大的獨石碑。牠對於世界的仇敵要有一種堅固的陣線，所以牠祇准許佔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黨員得到完全的德謨克拉西，也

覺得不大安全的。黨內無論發生左傾或右傾，對於最高機關決議案發生繼續的批評或獨立的行動，一概算爲不忠實與反叛，並且必須拿比較對待階級仇敵更殘酷的手段來處置的。因此，左派的特羅茨基和他幾千的信從者都被驅逐出境，開除黨籍，拘留監禁，放逐遠處，箝制了言論，或是壓服了行動。在俄羅斯或任何世界上正宗派的共產黨裏，都不能給他們一絲一毫的接濟。那些右派的黨員，想黨的行動太快，不免要使人民感受痛苦；那末也必須箝制他們的輿論，或使他們都悔改順服。

在黨以外，這種狄克推多制必須控制一切，使他們的階級仇敵都被征服。他們中間大半都不准離開本國，所以他們不能逃出俄羅斯這所大監獄。他們常常不能得到工作，維持生活；也不准領取護照，離開本國。他們和外國人的來往必須絕斷。如果他們與外國人來往了以後，就要被懷疑，受偵探的監視。他們也常常被禁止寄錢給國外窮乏的親戚，並且也不准收受國外朋友的接濟，這是世界上一種很淒慘的景象。這種手段，非但應用於守舊的白俄，並且也加之於急進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對於共產黨中央機關所解釋的正宗共產主義是不贊成的。因此這種狄克推多制的統治

勢力，幾乎擴張到俄羅斯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我們非但要注意這種狄克推多制怎樣擴張到全體人民的生活中，並且要知道這種中央集權主義的首領似乎使少數人的勢力範圍更加縮小。照學理上講，這是一種整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包括全人口十分之九的工人農民與兵士。但是事實上證明這塊集合的大石常常包括無知識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的農民。他們當然不配做無產階級中活動的分子。他們必須變成工業的工人。但是工業工人中也有許多沒有受過訓練去加入社會主義的社會，所以這種統治權必須限於共產黨。可是這個黨也要發生右傾與左傾的危險，於是必須把黨權集中在一個執行委員會中，然後再集中在執行委員會裏的實力派身上。不過黨裏至少有兩派在競爭統治權，其中一派必須要受排擠；那末其中得勢的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忠實信徒，必須站在掌權的地位。末了，黨內的統治權也限於九個政治部的部員與他們的八個助理人。如果其中有一個人和主領的人與他的助理者不能融洽，那就必須開除出去。所以到了最後，這種工人階級或全人口十分之九的專政制度，有一種把牠自己縮小到一個人與幾個忠實的助理者或信從者的趨

向。他們就佔據了政治部與組織部中書記的地位。

這一切事情幾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自然的與必然的發展。列寧曾經很忠實的依照馬克思的主義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中堅決的與自覺的少數派的專政。』他在事實上確是變成了一種很堅決的，很自由的與很小的少數人團體。

我們因此知道在德謨克拉西的『中央集權主義』中，常要發生一種時刻縮小範圍的狄克推多制度。牠要發生什麼不好的結果呢？第一，這班危險的少數專權者很容易犯過失的，沒有一個人是不犯過失的。一種狄克推多制必須要壓服反對的少數派與個人，有時牠自身也會和民衆站在反對的地位。但是照一種假設看來，『牠必須統治或是引退。』牠就這樣的統治了。歷史上幾乎一切的改良與希望，先由一種反對的少數派中發起的。如果要處置他們，那末最好在萌芽的時期就把他們擠去了。『歷史上有一個通例，就是說，權力對於那些濫權的人是有害的。……繼續的佔居職位，難免和你所統治的那班民衆心理與需求分離。……歷史上各種政府制度的特殊罪惡，就是在於牠把自己的私人利益和公衆的幸福混而為一的必然趨向。』所以說共產黨黨員也要

犯同樣的毛病，是很在情理之中的。』

這一種狄克推多制還可以發生一種結果，就是牠一直要冒着武力統治的危險。這一種制度對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都有害處的。拿破崙在早年革命的時候，好像是一個大英雄，但是他後來如同一個科西嘉（Corsica）的屠夫，會滅削法國人的身軀與道德的品性。狄克推多制對於專政者與被統治者都有危險。

在歷史上繼續不斷的狄克推多制，現在又重複出現了。牠假定將來可以達到一種無階級區別的社會，那時一個人不會剝奪他的同胞，政府就會消滅，而且人們因為早年在一種好的環境中所受的訓練與養成的習慣就會做正常的工作。然而照人類的經驗看來，那個時候似乎總不會臨到的。除了在裏想的烏托邦中，牠至少還沒有臨到。一種狄克推多制在理思上雖說是暫時的，在實際上牠却非但要無限制的擴大，並且常常要變成緊張而更加周密。共產主義制度所創造的新環境，雖然能夠把個人食心的危險動機大部份棄掉。這種貪心就是西方國家的危害品。但是牠養成了一種爭權的慾望與看輕自由與個人人格的心理，這也是好像愛好金錢的惡根性。

我們不妨拿禁止出版自由這件事做個例子。具體的說，箝制輿論有什麼意思呢？在沙皇時代箝制輿論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很可以承認蘇俄政府是爲了一個整頓的階級與一種比沙皇政治更高尙的目的而禁止出版自由。但是這種方法會產生什麼必然的結果呢？你如果決意要箝佔出版的機關，並且要告訴人民只相信你自己政府的好處與別種政府的壞處；那末你必須維持一種繼續不斷的宣傳政策，常常誑報外國人的情形。爲了要說明箝佔出版機關的罪惡，我們不妨聯想以前自由的英國與拿破崙在法國所維持的狄克推多政府是互相並立的。納爾遜在特拉法加（Trafalgar）的勝利與拿破崙失敗的消息，在法國的報紙上不准登載，差不多過了十二年之久。請把這件事與現在的蘇聯比較一下罷！

作者在一九二三年旅居俄國的時候，完全不能得到從外國方面傳來的世界消息。在九月一日日本忽然還着了一次大地震。那時作者剛巧在俄國真理報的事務所裏，看見該報的編輯很警慌的跑來，把他們次日所要登的消息告訴他說，日本碰到了一次可怕的地震。那邊的海底上升，而在海上現着一個島。於是美國的軍艦即刻去估探了這

個島。這似乎是一個很壞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採取的行動。

我們記得在事實上，却是美國的兵船載了需要品去救濟地震中避難的人。但是這樣友誼上的協助是俄國言論家所不承認的。在俄國地方祇有這種幫助革命的共產黨的『真理』才能宣揚出去。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罪惡應當形容得過分黑暗。我們不妨設想住在這一種不能改正上面那樣不確消息的制度底下有什麼意義呢？正如同共產黨的領袖曾經說：『人民祇要相信人家告訴他們的東西，所以我們就是要告訴他們應當相信些什麼東西。』若使他們要這樣做，那末當然是可能的。在早先阿剌伯地方，談罕默德的信徒或是原始專制政治底下的百姓，只能相信人家告訴他們的事。這樣的情形也許是暫時的，或是很久長的。但是林肯以為不能常常愚弄一切的人民，並且一切狄克推多制度常常不能達到他們所預定的千禧年，却得到了牠們自己的報應。如果真理比黃金還要寶貴，如果思想上的自由比較身體上的糧食還要重要；那末誰願出賣他的自由，以取得這樣的狄克推多制度？這種狄克推多制度也許可以強迫行之于不自由的，無知無識的民衆中間；但是他怎能取得自由民族的同意呢？

民主政治的目的是要養成人民繼續不斷的自動能力，並且要用一種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以發展人民完全的人格。讓我們老實的承認說，在自由主義方面我們還沒有達到。

但是我們對於狄克推多制度，可說什麼話呢？若使資本主義中顯著的罪惡是在於牠不能給窮乏的民衆平等，自由與正義，而這些人民却要依靠少數主有或控制生產機關的人，那末狄克推多制既然否認許多自由的要素，怎能超脫資本主義的罪惡呢？牠同樣的對於人民允許一種將來的千福年，可以使地球上的政府完全消滅，或是允許一種未來的世界，能夠抵償現在的不公道。共產黨的黨員即使說這種狄克推多的制度是暫時必然的罪惡，那末他至少給我們一種十分完全的罪惡。我們應當重複說，這是不配做『大憲章』(Magna Carta)的替代者，因為這種『大憲章』已經使人民在七百年當中，嘗着自由果子的滋味。

一種緊張的狄克推多制度，也常有變成強暴政治的危險，並且要繼續不斷的發生許多反叛的陰謀詭計——無論是真實的或是設想的。

所以在一九二七年，英國與莫斯科絕交的時候，蘇俄的執政者恐怕鮑爾文內閣與守

舊派的反對，就看出一種顛覆蘇俄政府深切的惡意，於是史丹林寫着說，「我們並不講到一種無定的與浮泛的新戰事的危險，却要指出一種真實的與普通的新戰爭的危害，以及一種反抗蘇俄的特殊威脅。」此後又有許多偶然發生的事情，使蘇俄政府繼續一種戰時的狂熱態度。

在一九三〇年八月裏，有許多人爲了貯藏銀條，被蘇俄政府鎗斃。在九月中有四十八個製造肉類罐頭食物的技師，爲了與政府查得的糧食陰謀有關係而被處以死刑。在十一月中，爲了一種關於全世界顛覆蘇俄的大陰謀，有八個俄國人受法庭的審問，那時的檢察員克里倫科（N. U. Krilien Ko）所辯的起訴狀，在新聞紙上佔居了三十幾行，檢舉四十五個中心的人物，四百個散居各處的人，一千五百個隨從的俄國人，還有許多外國的重要人物，如同英國皇家貝殼汽油公司的德忒定爵士（Sir Henry Detonding）。自認的仇敵與賣國者——如同拉姆辛教授（Prof. Ramsin）——被人告發他們有一種陰謀，說是要在羅馬尼亞的邊界上發動一種引起外交的事件，羅馬尼亞就向蘇俄宣戰，波蘭、法國與英國應當立刻繼起；有六十萬的兵士在羅考姆斯基將軍（Gen. Lou-

Tomster) 領導之下，進攻莫斯科，另有一種軍隊要向列賓格勒進行；法國供給軍械與子彈；英國的海軍將駛入波羅的海與黑海，攻打列賓格勒與克里米亞 (Crimea)。

這些陰謀，無論是真實的或是設想的，都是很自然的；因為俄國地方的生活很是艱難緊張，並且黨中專權的分子常常要攻擊反對他們的人。他們起初驅逐左派的特羅茨基，然後排斥右派中能幹的人，如同里可夫 (Rikov)，湯姆斯基 (Tomster) 與布哈林。在這樣的情勢底下，確常常要引起反對與陰謀的事實。但是他們也有一種自然的願望，得到他們替罪的人，以担負糧食缺乏或艱難的罪過，或是使人民專心於防禦將臨的國外侵略與國內反革命的運動。這一切事情都是很自然的，並且也很兇暴的。但是他們總難使我們相信這樣的制度是救濟人類社會罪惡最後的方法。

(二) 世界革命

這裏是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第二種批評；依據共產黨的信條，這個世界既有一種救法，就是等到時機成熟，藉著俄國式的破壞革命，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推翻。這種主張是馬克思，列賓與史丹林重複在他們的著作裏所稱述的。

在一個共產黨員看來，革命也是一種罪惡。但是他認為是一種必然的罪惡，由於維持整個不公道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惡勢力所造成的。讓我們觀察這種革命必然性的學說，究竟包含的是什麼。牠不僅是一種毫無流血的革命，一種迅速的政變，能使最受苦的與可憐的階級奪取政權，於是衆人從此以後都能快活活的過日子。牠和這種理想離開太遠了；全部的程序，原來是一種『繼續不斷的革命。』牠要有一種長時期的預備，才能達到一種改變，取得永久的統治權，等到後來只有一個階級可以生存。凡是意見和牠不同或反對牠的人都要除去；好聽的說一句，就是『澄清。』

美國與法國的革命為時很短，一等到各個民族從壓迫者手下解放出來以後，他們就得到他們所計劃的目標。繼續不斷的俄國革命，不是這樣的，牠干涉生活中的一切，並且經過很長的時期。牠祇少有三個步驟：第一，在預備時期中，各個忠實的共產黨員與黨部，必須認真的實行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中所通過的列寧所提出的第二十一條，『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資本主義。』他們應當對於改良主義與中立派的政策，明白宣佈斷絕關係，並且把這種情形傳佈到全體黨員中間。這種吩咐，如果忠

實的實行出來，就要使各地的工會與全世界各種勞工運動內部分裂，互相仇視。譬如在英國或是德國或丹麥勞工運動中，對於各個非共產黨員的勞工領袖非常看輕，並且差遣了忠實的共產黨員加入各種運動，組織小派別，以分散原有領袖的威權，而阻礙他們採取的計劃。如法國的勞工運動，本來是很強固的，後來為共產黨員所分裂而變弱。在預備時期以後，就到了第二個革命本身的時期。等到時機成熟了，這種堅決的少數人團體就當起來奪取政權。於是全部俄羅斯革命的程序重演出來，祇因為別個國家裏環境的不同，而可改變些形式。反革命的行動必須用恐怖的手段來壓平，而舊的制度要完全破壞。我們現在並非要替資本主義國家辯護，却要指明無限制的與無管束的破壞行動是有極大危險的。

這種繼續不斷的革命的第三個步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成立的時期。牠要把權力集中到最小的範圍，却把統治的勢力擴張到人生的各方面，而且形勢的緊張要等牠最後的仇敵除去了以後才能停止。那時在無階級區別的社會裏，既沒有反對，又沒有人願意繼續握權，於是國家就能安全的消滅。這是他們內心中對於將來沒有歷史根據的希望。

沙皇教會中能行奇蹟的聖徒的不朽之體，比較他們現在這一種無根據的允許更容易引起人民宗教上的信仰。在共產主義的點金術底下，他們要想種了專制的因而收自由的果，種了仇敵的因而收博愛的果，種了暴動與破壞的因而收永久和平與同胞主義的果。

這種世界革命的政策，完全要依靠武力，而不信任濟德的勸導與同意的原則。牠要擊看與仇視一切忍耐的，立憲的與教育的方法，以及那些妥協的，膽小的改良主義派的領袖。共產主義要把搗總的蛋放在一隻破壞的革命與狄克推多的籃中。如果牠成功了。你就得到了一個俄羅斯；如果失敗呢，將來的景象就不可設想了。牠在成功方面實在不能有確定的保證。俄羅斯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一年之間，經過戰爭，革命，飢荒與瘟疫，差不多已經喪失了一千萬人民。作者還記得有一個在冰天雪地的災區中的目擊者，講到那邊活人分食屍首的故事。但是在俄國散居各處的農民中所發生的革命，比較一個工業很發達，人口很稠密與人人相依爲食的德國或英國所引起的恐怖狀態，不知要小幾倍哩！

人民在玩弄革命的時候，好像火山起了爆裂，地震正在劇變，或是森林着了大火；

所以沒有一個人或是一種集體的團體能夠駕御的。一個人也許可以指定炸彈爆發的方向，但是等到森林一燬了火，他就沒有制止的能力了。俄羅斯的革命，無論在學說上怎樣不完全，在工業上怎樣不發達，可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這樣一種好的機會，因為世界的戰爭，腐敗的政府，憤慨的民衆與能幹殘忍的領袖——如同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聚會的革命領袖——都併合在一起，以造成這樣的革命。

拉斯基很有見地的說：『我們並不需要像共產主義給我們的那種戰爭的方式，却是要合作的方式。懷疑的考察者不能信服任何的制度：要把痛苦中得來的寬容與自由的確定遺產犧牲掉，而達到一種或然的勝利，因此可以把他所棄的東西都償還他。這一定要使他受着長時期強暴的困苦。：他也要懷疑一種建立在仇恨，恐怖與強暴基礎上的政府能否產生一種根據於友愛的制度。因為這班人既然創設了這樣的一種環境，那末從這種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子女，也必同樣充滿了仇恨，恐怖與強暴。人類的精神，一定要向這種退步取得報復，無論牠是否假借善名的。』

仇恨，恐怖，或強暴的手段，都足使人自取其禍。一種恐怖果然是可怕的，但也

能使各事停頓。早年『赤卡』的罪惡當然已經過去，但是恐怖的政策現在還在。譬如俄國地方，有一個工程師弄錯了一件事情。他所築的橋，或是堤堰，或是工廠，也許都不是因為他自己的錯誤而不能成功，可是他就被政府當作怠工，而受審問與拘禁。於是立刻使其他的人發生恐怖。他們就遲疑的去担負他們的責任。偵探就到處佈滿。蘇俄政府常常相信這班偵探，而不相信自由。忽然雷電交作，就把不幸的人擊斃。他們在深夜可以逮捕人民。在政治探訪局裏秘密審問的時候，是不准有人來做顧問與見證的。這一種毫無名目的恐怖，來去好像浮雲。所以在這種制度底下，有許多人雖然要做好，但是勢所不能的。因此，有許多遊歷者離開了這種相信專政，武力與恐怖的國家，就感覺得輕快自由。

羅素對於共產黨的武力主義，曾經提出兩種反對的理由：『這種尊敬多數投票原則放棄了以後，就沒有理由預測一個人所附屬的特殊少數團體能否得到勝利。除了共產黨員以外，還有許多少數人的團體如同宗教的少數派，絕對戒酒的少數派，武人的少數派，資本家的少數派。……他們相信共產主義是要打算多數人的利益，那末他們就應

常相信他們，能夠拿這個問題說服多數的人，並且能夠忍耐工作，用宣傳方法取得勝利。……

『第二種反對少數人利用武力政策的理由，就是在於他們放棄了法律。這種情景擴大了以後，就好像把猛獸解了縛，而使文明所管理的種種原始人民的情慾心與利己心盡量發洩，造成了一種放縱的世界。……文明不是很穩固而不能破壞的。從一種無法無天的情形中，決不能產生出好的結果：……布爾塞維克的哲理大半爲這種失望於前進的方法所提倡。但是這種失望是一種不耐心的記號，所以不能拿事實來做保障的。』

最高尚的創造力與建設力，常常依賴愛的動機。最激烈的革命與破壞的工作，總要等待仇恨的火簇。照生理學上與社會學上看來，『愛』包括創造與共享的精神，同時『恨』原來是破壞的。仇恨者的心中充滿了殺人的慾望。他在殺戮惡人的時候，和在顯著社會罪惡的面前，或者和道德的憤慨是很相近的。但若『愛』是盲目的，那末『恨』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照共產黨的口號說，『革命是掃除路上一切東西的風潮』——無論是好的或是壞的，都要同歸於盡。他在破壞方面，也許是迅速與強烈

的；但牠沒有能力可以在劫灰餘燼的當中從新建設起來。這裏有一種她們所允許的萬應藥，但是牠的效力必須要拿牠最後的結果來判斷的。牠的吩咐就是說：『破壞一切反對派，恨你的仇敵，以惡勝惡，然後能得到好的結果。』

然而另外還有一種與牠相反的人生原則。牠的誠命就是說：『愛你的仇敵，以善勝惡，實行你從創造的愛中體會出來的善意，相信人類和他們對於道德教訓最後的感應，信託他們並請求政府的允許，不要以武力對待他們；用信，望，愛，來耐心的建設一種不分階級的友愛團體。』

共產黨的黨員告訴我們說，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夢想，並且自由的人從來不會愛他們窮苦的附屬者，或是和他們共同享受，或是給他們公道。如果這樣是對的，如果那些有權力的人在窮乏與失業的人面前，誇示他們不可共享的財富；那末俄國地方紅色恐怖的歷史必將重演了。如果我們不實行我們的原則，那末共產黨的黨員就有機會應用他們的主張。如果我們拒絕公道，那末他們就要用武力來取得公道。如果我們不肯用愛心來共同享受，那末他們就要用仇恨來破壞一切。這或者好像一種套

跑，就是在教育與急變，迅速的進化與破壞革命中間的奔跑，或是在坦白公佈的實施計劃的原理，或是在全世界都遭遇波旁皇族，霍亨索倫皇族（Hohenzollerns）羅曼諾夫皇族（Romanoffs）以及其他牟利者的命運。

（三）不容忍的逼迫

共產主義是一種獨斷的主義。牠似乎包括極見，不容忍與狂熱的原則。牠好像原來不是從一種偉大的肯定的真理中發生出來，並且能使人感動而自由自在的得到大多數的同意。牠却發源於一種失望的議論，否定的結論，就是說，真理不能拿道德上的勸導來得勝的，却要有一種堅決的少數人團體能夠接受了這種獨斷的主義，就用武力奪取政權，非到他們最後的仇敵消滅以後；不肯罷休，並且還要把他們的狄克推多制度行之於別個國家中。我們不妨承認一種回教式，法西斯蒂式，或一個共產黨式狄克推多制度的好意，並且也各有好的結果。但是我們要問狄克推多的代價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必須拿一種粗暴的不容忍主義來做代價？共產主義的信條，並不接近於釋迦牟尼的教化，基督的福音，或是甘地的道德教訓；却歡迎回教的寶劍，使人們祇能在願

服與殺死兩條路當中揀選一條。

這種不容忍主義，必定是從馬克思自己的消極哲學裏發生出來的。馬克思雖有極大的智力與不屈的精神，但是他不能完全了解我們複雜的世界中的經驗。照他這種過分簡單的解釋，一切的歷史到底是因為兩種階級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太陽光的真體裏面所包含的七種顏色，是被他們簡括到完全黑白兩種顏色。人也被他們分做兩個很簡單的階級，就是強搶者與被強搶者，或是剝奪者與被剝奪者。他們祇承認歷史發展的過程是有時間問題的。許多可以試驗的解決方法都被拋棄，並且他們的萬應藥的祇有一種萬應藥。但牠含有世界的意義，無論最後用之於西藏，或即刻用之於英國，都是可以的。他們教訓我們說，無論什麼國家，根本都需要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切的歷史是根據於單獨的，唯物主義的基礎。一切的經濟學根據於簡單的勞工與剩餘價值的學說。一切的策略是被簡括成功一種階級鬥爭。一切的自由權是被縮小到一種狄克推多制度。這種萬應藥的本身是很簡單的。馬克思，列甯與史丹林都是這種獨斷主義的化身與將來所付代價的榜樣。

我們並不否認舊時猶太的先知替全世界的勞苦者辯護，而痛罵資本主義世界的壓迫者，雖然含有英雄的氣概。我們也不否認列甫赤手空拳的在彼得格勒對於飢餓的民衆，拚命的提倡一種民衆革命是很有勇氣的。我們又不否認史丹林和其他少數的領袖不顧全世界的反對，而努力建設一個工人共和國是很有利益的。

馬克思正如同他以前這些同種的先知一樣的覺得在他四周的人類經濟需要是完全相同的。他是一個審判世界的先知。但是他對於人類整個的經驗區域，還是一個門外漢。譬如，他對於宗教從來不能了解，也不能欣賞。他的生平有許多地方是很勇敢的。但是他大部份的時間都費在英國博物院圖書館裏的書本上。他在英國是一個隔離的外國人和他四周的工人，也沒有接觸的機會。他對於人性的觀念是很抽象的，並且也太簡單的。他對於歷史的解釋，以爲在預備的時期，若照簡單的形式已經完成以後，那末就可以用人的力量把他縮小到單獨的一種階級鬥爭與唯一的萬應藥，然後又以鐵血主義把他應用在世界上。一個基督徒宰相與霍亨索倫皇帝把他趕走，當然使他下一個斷語說，政府與教會都是人民必然的仇敵，並且他們必須經過殘忍的破壞，才能使

一個工人政府建設在灰燼上面。他這種否定的結論，雖然好像是自然的，並且也可以解釋的，可是馬克思總不能了解這種具體世界的複雜真諦。其結果使其產主義到現在還不能明白牠。於是一種僵死的獨斷主義就發生出來了。人生中高的階級與低的階級在蘇俄地方是完全失去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掃除，因為牠們都被輕看，認為是中產階級的成見。匈奴的領袖能夠焚掠羅馬，回教的古服者能夠看着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地方藏書樓的寶庫都被焚毀。他們心中都毫不感動，因為照他們簡單（Alexandria）的獨斷主義看來，別種價值都是沒有意義的。現在俄國地方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僵死的唯物主義的信條，也有同樣的景象。

莫斯科仇恨世界的宗教，如同一種噩夢，並且末了也許會把他們認為人生中反動的迷信勢力打破。牠採取一種工業化的唯物主義的宗教，並且當機器是牠的上帝。無論什麼獨斷的宗教，在起初的時候，自己已不發生疑問，也不許別人問一個問題。牠宣傳一種十字軍運動。牠不容納競爭者與仇敵。牠或者要建設一種機器人的世界，只有時間能夠告訴他將來的趨勢。如果牠的粗暴信條能准許別人根據他們的式樣與價值

建設他們個人的或社會的生活，那末在牠的本身方面也不會弄到這樣不容忍的情形。

但是除了他們自己的價值以外，這一種獨斷的狄克推多制不能看出或承認其他一切的價值。這就使那些和他們意見不同的得到悲慘的結果。他們被認為仇敵，拘禁在狄克推多制度的鐵柵欄中，無法逃避。這種慘劇就使整個的世界非但在地理上分成兩種互相衝突的秩序，並且常常要使同一個家庭中的人說兩種異樣的言語，住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好像南北極的隔離，並且分成順服馬克思的獨斷主義與不順服者的兩種人。

共產主義粗暴的獨斷主義也表示不容忍的宣傳政策，以反對他們一切的階級仇敵，無論是在國內的，或是在國外的解散會議似乎是他們一種愛好的室內運動。他們如果不能佔據工會，那就從牠們的內部破壞。這似乎已經成爲一種確定的政策創造階級的仇敵是他們一種主要的努力。他們似乎特別苛刻的對付這些和他們意見不同的自由主義者，急進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如同麥克唐納與托馬斯（Norman Thomas）。

關於他們攻擊的路線我們不妨舉一個例罷。在近來美國南部紡織工人的風潮中『美國公民自由聯合會』很大的用三萬塊錢保釋一班被拘捕的共產黨工人。這些交保

的工人就跳過他們的保釋金，跑到莫斯科去。共產黨就准許他們住在那邊。這種行動在將來發生同樣事件的時候，把現金交保的門關閉了。那些推事現在也多了一種理由，把保釋金抬高，使一班表同情的朋友們不敢冒這種大的危險，所以公民自由聯合會覺得將來發生同樣案件的時候，也不敢出鉅大的保釋金。後來共產黨的報紙非但沒有一點表示感激與承認援助的意思，却反很苛刻的攻擊那些爲他們辯護的人。他們的言論完全是假造，可說沒有一句是真的。他們說：『社會黨的社會法西斯蒂的時候補員托馬斯當這種殺戮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在出事的房屋中看見了，臉上就發生一種微笑，真正好像牧師的神氣（這是指着警察對於共產黨代表團的領袖行兇的事情而說的。）上星期托馬斯還在公民自由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中攻擊那些拘禁的與受苦的工人，拒絕用現金保釋他們，並且攻擊國際勞工保護會在現在經濟的恐慌中替這班戰鬥的入獄的工人辯護。對於麵包的呼聲報答以警察的棍棒。對於這一點，共和黨，社會黨與民主黨是站在同一條職線上的。托馬斯牧師與發爾刺市長（Mahor Walker）都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反對工人爲了工作或工資而苦鬥的直接代表。』

這樣的宣傳也許可以感動那些生長在如同俄國那樣的完全控制出版界言論的國家裏，不明事實的無知工人，但是他總不會感動生長在出版自由的國家中有自由思想的知識階級。我們希望自由將到，這些共產黨員也會覺得這樣的宣傳是眼光太短的，適足自敗的。這是虛偽，並且也是卑污的。但是現今在俄國，美國或其他國家裏的共產黨報紙都有這樣情形，那是很不幸的。這就可表明共產黨的粗暴的獨斷主義。

共產黨不容忍的獨斷主義在人們生活的各方面與各種關係裏都可看得出來的。牠對於人生的價值，人格的尊貴或個人的權利都抱一種不同的觀念。最近作者在莫斯科的時候有許多人因為壟斷銀錢兌換的關係就被鎗決。這種情形確然可以危害他們體制與社會的幸福。關於這一件事有個共產黨的教授曾經答覆我們說：『我們鎗斃他們嗎？當然是的。為什麼不可以呢？你說今天鎗斃了四個人，我很希奇為什麼鎗斃他們人這樣少。你想在你們的世界大戰中殺了四個人的消息是可以使人驚駭嗎？你沒有確實知道我們現在是在打仗。我們為了要得勝的緣故，非把一切的仇敵殺死不可。』此人是一個有學問的教授。在他的書架裏有許多宗教的書籍，因為他是一個研究宗教

歷史的專家。如果他們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他就對於他們是很誠實的，自願犧牲的，忠心服務的。然而他想鎗斃了四個人，在後來在糧食陰謀事件中鎗斃了四十八個人，正好像他在地板上打死這歷多的螻蛄一樣。他當然不歡喜鎗斃人，也不願意弄死螻蛄；因為他是一個學者和君子人。這樣的舉動是不美觀的，是不愉快的。殺人的舉動在他看來，至多是一種抱憾的必要舉動。可惜我們不能夠請火星裏的遊歷者來判斷這種人生的觀念。但在自由主義的西方人看來，這一種不容忍的獨斷主義所發生的許多結果是令人恐怖的。他們也阻礙人們得到一種自由的，複雜的與豐富的生命，又不能離開狄克推多制度範圍以內的正宗主義。因此他們不能了解別國地方的情形，或和其他國家合作。

他們這種不容忍的態度，在宗教方面是最顯著的。照他們的獨斷主義看來，宗教就是迷信，宗教又是鴉片，宗教也是毒物。馬克思與列甯都是這樣說的。所以這種罪案就此定了。我們在俄國地方屢次聽見受教育的人說，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定是一個無神主義者。如果對於宗教有什麼疑問，那末就可引證馬克思或列甯一兩句話來解

決的。我們徒然對他們說我們同他們一樣的相信科學與進化論，並且一直從刻卜勒與牛頓的時候到現在，有許多大的科學家還是宗教的信仰者。我們也無須指出達爾文在他的自傳裏說他是一個虔敬的不可知論者。這一切的話都是毫無意義與價值的。在這一種不自然的，簡單的，獨斷主義底下，個人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有神論者，就是無神論者；不是資本主義者，就是共產主義者；不是同志，就是仇敵。在這種狄克推多制度當中祇有順服或是精神上的死滅。

這種共產黨員却不知道他把宗教這個名詞拋棄下以後，他自己已經造成了一種新的，狂熱的，無神主義的人道教。羅斯教授（Prof. Ross）曾經說起『這種狂信徒所有的可惜的簡單的頭腦。』這句話究竟是一個學者在遠處安全地方所寫的空話，還是在恐怖時代中一種確定的事實，那是使牠的意義大相差別的。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簡單化的好處，獨斷主義的力量與無思想的十字軍的熱忱。但是也有人的損失。回教中如火如荼的有神主義與共產主義與暴獨斷的無神主義很有一種相似的地方。牠們也許都可以拿武力來征服我們。但是牠們若不感動我們的理性，總不能得到我們的同意。

的。我們很難知道牠們如果沒有根本上的改變，怎能在牠們的行動上非但失去牠們的勢力並且也會失去牠們相似的地方。

我們因為言辭上的不同就引起了衝突與誤會。這是很抱歉的。共產黨員厭惡宗教這個名詞。但是宗教是什麼呢？假定我們把宗教縮成很簡單的意義，就是看牠是一種要使整個的生命達到我們所知道的至善的光明道路上的努力，並且要我門忠信的實行這種至善的生活。我們或者像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那樣的假定我們想宗教是使人對於信仰那些不能用理性證明的事情減少到最小限度，而使人對於相信宇宙會做那種信心後盾的信仰擴充到極大的限度。這樣的說法雖然不能滿足基要派的有神論者，或是無神論者；然而依照這種廣泛的宗教定義，南方的佛法，雖似無神主義，也可算為一種宗教，而共產主義又可當作狂熱的，唯物主義的，無神主義的宗教。有許多獨立的考察者對於這件事實是很受感動的。

但是讓我們撇開定義而講生活罷。無論什麼時候，一個人祇要能夠自由的從原始時代的生活達到高尚文明的地步，他對於他的環境至少有三種反應；就是：科學的，慈

術的與宗教的，在科學方面。牠要控制他的環境，以改進他的生活。在藝術方面，他要使他的生命能夠美化，和諧與豐富。在宗教方面，他要使他的生命能夠完成統一並和內部的心靈泉源與外界的高尚目的發生密切關係。從柏拉圖，黑智爾——馬克思的老師——位到威爾遜，有許多人已經指出個人的與社會的宗教的價值，好像是生命中一種偉大的建設的能力。有許多的人已經閱歷過這些價值，並且願意爲牠們犧牲性命。一切的人都認歷史上關於宗教方面所紀載的譏笑，腐敗與失策，正如同科學方面，藝術方面，政治方面與其他各種生活方面的情形一樣。但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共產主義說，只有一種方法，先把牠破壞，然後再依照這種獨斯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專政從新把牠建設起來。

馬克思在紙上所寫的計劃是一樁事情：但是要把這種計劃變成血肉之體，那完全是另外一樁事情。作者有一次在巴黎對於俄國的移民講到全世界可以作爲社會主義的實驗室。其中有一個人很簡要的回答說，一個實驗室在學理上是一樣很好的東西。但是假使你自己的家屬與親戚都在試驗的坩堝裏，假使你的親友當中有五十個人已被赤卡

錯謬，或是在革命恐怖狀態與內亂時期中滅亡了，假定你有許多朋友現在是很窮乏，但不准離開本國，受偵探到處的監視，其中還有幾個人爲了他們的宗教而在放逐之中；那末你想對於這種實驗室有多少熱忱呢？

這是我們對於蘇維埃制度最後的一種批評。我們知道他們對於宗教的容忍態度祇限於准許大多數的教堂舉行禮拜的儀式。但是有許多人爲了他們的宗教已被放逐，有些人是被逼迫。這班共產黨的領袖明白的說，他們要盡力『肅清這種迷信，』並把這種毒物從人心中連根拔掉。我們確是都在他們試驗的坍塌裏。我們的公民自由權，我們的宗教自由權，我們的容忍態度，我們的自由主義，我們整個複雜的無價之寶——這是唯物主義的獨斷主義者所不能感覺的——以及我們人生一切最有價值的東西幾乎都在危險之中了。

共產主義者宣稱他們未嘗逼迫宗教，正如同那位上級官員所已經說過的一樣。但是我們要照樣地回答他們說，他們確是在逼迫宗教。作者能夠指出許多非正宗教派已經受着政府極大的打擊，並且現在還在受逼迫。

作者不妨單單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罷。在俄國地方，有一個團體是很受全世界尊敬的，可是他們現在已經受隔離，不能和外國來往，也不能向外國請求，或是從外國得到什麼幫助。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十月革命以前早已組織了共產的農場。他們很有成效，並且也快快樂樂的過日子。他們在經濟上雖然已經集團化了，可是他們的土地已經給政府奪去，分給別人了。他們因為斷絕了生計，也沒有自由發表宗教的信仰，所以想請求政府准他們離開俄國。他們把全權托付作者去請求俄國的當局，可否准他們遷移到坎拿大建設他們集團的或是共產的農場，並且他們也願意空手出去，不帶金錢。祇拿幾件個人的用器。但是這種要求被政府絕對的拒絕了。我們應當記得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有一班德國人以前是很興盛的。但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沒收，他們的宗教被逼迫，就絕望的離開俄國，後來拿破崙與登堡總統與其他的人大量的籌得許多款子去救他們的苦難。這些憤怒的瑞典人也同樣的離開俄國。但是有許多別的人都不准離開。他們非但是不准離開，並且現在有些人已經被放逐到可怕的索羅維亞茨基島上。他們不願意公佈這種消息。世界上沒有一種人類能這樣勇敢的與靜默的去受

苦。在別個國家裏，一個人被強迫拘留的地方是稱爲監獄。現在俄羅斯差不多就是許多人的監獄，雖然他們是算爲少數的民族。我們要反覆的申明說，這種整個的制度對於長時期受壓迫的多數無產者在經濟上已經得到解放創造的表示，與物質上的改善。

但是對於幾百萬的少數者，牠是一種無處可逃的牢監。契爾（George Kennan）和別人所描寫的關於沙皇時代放逐到西比利亞的情形，也是我們所認爲可惡的。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俄國現在有這樣的情形，也是我們所可惡的。現在俄國對於這樣少數者所用的恐怖手段實在要使全世界厭惡的。

我們在上面對於蘇維埃制度所下的三種批評是：（一）這種狄克推多制度幾乎擴張到全部的生活，並且有時帶着強暴與恐怖的形式；（二）這種武力的世界革命政策是拯救社會唯一的萬應藥；（三）不容忍，偏見與逼迫是從共產主義中馬克思的獨斷主義發生出來的。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的挑戰

我們現在要從消極的批評的責任轉向到更加積極的鑄錢的工作。我們不該拿蘇維埃制度的罪惡抹煞牠的價值。我們也不應拿我們的成見來反對他的功績。因為俄羅斯如同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一個非常複雜的和善惡混合的大國家。照作者的意見看來，俄羅斯革命和法國革命同樣的能夠擴張到整個的生活中。牠所產生的罪惡恐怕比法國革命還要大。但是照我們的判斷而論，牠所產生的好結果恐怕比共和的法蘭西所講的自由，平等與博愛也還要大哩！

若使除了我們所看到的與全世界所反對的一切罪惡以外，他們非但還有耐苦犧牲的毅力以及在這種制度裏生存的能力，並且俄羅斯國內與國外有這麼多的人對牠有這樣的熱忱；那末牠一定有永久價值的所在。『法國的革命燃燒着人類心中的火燄，並使牠對於人類本性裏主要的東西發生一種反應，所以人心中的錯誤與罪惡都不能撲滅牠。』俄羅斯的革命比這種情形更為真切。在全世界人類的全部歷史中，人們到處可以看到不公道的天秤總向民衆方面傾斜，而在特殊階段方面上升。俄國終於允許多數的人得到一種補償。這是他們自己的事。這種制度是為他們產生的。照他們的意見看

來，牠是一種工人所有，工人所享，與工人所治的制度。共產主義所肯定的原則，也許可以證明出來比牠否定的主張還要重要。牠們所追求的目的比他所採用的方法更為重要。在這一種大十字軍的嚴厲的反對手段與勇敢的鼓勵方法中常常發生很好的景象，祇要牠的目標不在奪回一個空墳，却在得到一種活的人類。加里波的（Garibaldi）所主張的受凍，挨餓與破衣是常常不能抵抗的，——如果這種主張是為可信托的價值所發起並且也要達到一種有價值的目標。『共產主義的成就是在乎牠的理想主義，並不在乎牠的實在主義；又在乎牠精神上的允許，却不在乎唯物主義的希望。』牠是一種信條，其中充滿了理智上的錯誤，道德上的愚昧與社會上的腐敗。宗教雖有這些事情，但是也能成就。』舉個例說，在這一種制度中究竟有什麼能力，不會困着君士坦丁帝的腐敗，十字軍的屠殺，宗教裁判所的殘虐，對於科學的反對，社會改良運動的壓制，以及獻媚於專制政府等等基督教徒的污點而見棄於世界！這一種法蘭西的聖像破壞主義在牠的殺戮與紅色恐怖以後豈能賜福於世界，那末在牠的內心有什麼好處呢？在俄國地方，也有同樣的情形。

我們因為限於篇幅的緣故，祇好把俄羅斯制度中三種最有價值的特點分別討論一下。

(一) 社會正義的熱情

在俄國的領袖方面很願意實行犧牲的簡單生活，因此使大多數的工農民衆對於整個的制度與牠的計劃抱極大的熱忱。我們往往看見一種握政權的黨總要掩護牠自己的地盤並且因為自私的腐敗與奢侈而就此衰弱。這些傾覆的帝國大概是由於在上的腐敗，國中的領袖欺騙了民衆。俄國的領袖能夠和民衆共同享受他們一切所有的。這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一切的財產，利潤，收入；一切的文化，音樂，藝術；一切的閒暇，娛樂與遊戲——他們一切所有的，或者只除了權力以外，都與人共享的。他們並不要求特殊的權利，却反使他們自己擔負非常的犧牲工作。他們並不請求特別的寬恕，却要得到黨員中最重的處罰。他們並不像政治上巨頭或是黨中的政客那樣的要求實質上最大的報酬，却規定了每月二百二十五羅布或每天三元七角五分的高薪水率。比方有少數的人雖得在他們的著作方面抽版稅，但是他們必須把其中四分之一

捐作黨的用費。他們對於全世界受難的同胞與同志必須答應他們種種捐款與請求。這種整備的制度包括不斷的共用。

他們非但很忙碌的辦他們每日的公事，並且要在晚上費了許多的時間去參加各種委員會與其他的集會，他們必須常常跑到清黨運動，而敘述他們的工作，與證明他們的忠實。在工廠中他們要請非黨員證明黨中有否爲他們自己謀利益而不服務工人的黨員。我們難以設想在西方的政黨與政客中有這樣的剖白。

這些高級的官員當然有住宅供給他們的，但是他們的地方是很小的。汽車是給他們去辦理公務，却不是給他們去陶情作樂的。但是貧苦的農工子弟比黨員與官吏的子女常常更有入大學的優先權，與享受其他的利益。

蘇俄的主席卡列甯（Kalinin）也必須過簡單的生活，穿着法蘭絨的襯衫。關於這些領袖方面種種奢侈浪費的故事，大半都是捏造的。這些官員如果有花天酒地，納賄勒索的事情，好像哈定總統時代俄亥俄（Ohio）省這班流氓式的官員一樣；那末必須經過公開的審問以後，就在公衆面前斃命了。世界上除了甘地與他的信徒者以外，恐

怕沒有一個國家裏的官員與政治領袖會這樣一致的過一種克己的，努力的與簡單的生
活。設使有人要拿牠來和一種自由主義的制度比較，並且看見後者產生了一個資本主
義式的伊塞爾（Samuel Insull）和他的市長，又發生種種流氓，鬥爭，私販，偷漏，不
法，賄賂，腐敗，貪心與社會的不公道；那末他對於共產主義種種確定的罪惡也要遲疑
的拋擲第一塊石子。如果有人告訴我們說，這實在不是一個工人的國家，却是一種寡
頭的政治。那末我們必須記得吉萊德（Gillard）大使曾經把統治美國的五十個人開
了一張名單。他們大半都是擁有極大資產的人，那就是他們勢力的泉源。我們聽說
他們沒有時間來接受官職。但是他們能夠決定什麼人應當做什麼官。

俄羅斯的制度，無論牠發生怎樣的罪惡，但照大體而論，已經超過私人貪心的舉動
以及資產階級的統治。牠主張共同享用。沒有一個基督徒能夠反對這種原則，因為
早年的教會也自願的共同享受，『凡物公用』（參看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節又四章三十
二至三十五節）。

這些共產黨員並不主張一種高尚的，文雅的，呆板的平等，却提倡一種普遍的共同

的享用。他們承認人們的才能與服務的工作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照大體而論，他們比歷史上任何大的政治團體更能接近於平等。列甯每天要做十六小時工作。他住在一間狹小簡陋的房間裏，吃工人的飯，穿工人的服裝，每天祇得到兩三元的報酬。在工廠裏的技士與工程師雖屬於黨員部下，但是他們所得的薪水每月總有幾百塊錢，而在他們上面的共產黨員祇得到他們一半的薪水。

這種公義的熱情，清靜教徒式的簡單生活，禁慾主義，共同享用與平等觀念的要求非但爲領袖所實行，並且也擴充到工人中間，又傳播到青年的組織裏面。人家一定要認異俄國在革命以後差不多已經過了十三年，他們怎能維持這種精神，並且有時還要增加這種精神。其他的運動已經失掉牠們固有的簡單性而變成富足與軟化；但是這種制度的中心主義，就是社會正義的熱情，能夠使個人的牟利者變成公衆的恥辱與誹謗。他變成了一個道德上的麻瘋者。這種常常放在青年人面前的志向非但是社會的服務，並且是一種戰鬥的十字軍，要克服全世界的貪心。每個忠實的青年是要同情的，努力的追究解放全世界工人的目的。在什麼別的制度裏能教小學校裏的兒童在日常的習慣和人

生的目的方面能適應於全世界人類中最窮苦的階級呢？就是釋迦牟尼的犧牲主義也不會叫普通的人受這樣的謫命。加里波的的特殊千人團已經加倍到幾百萬，並且他們對於個人與羣衆有一種可怕的請求，非但要使國家脫離外國的侵略，却是要救全世界脫離他的壓迫者。

在蘇維埃制度底下大部份的領袖是誠實的，勤奮的，刻苦的與能幹的人。一個人所抱的主張無論和他們怎樣不同，可是平心靜氣的讀了馬克思，列甫或是史丹林的生活史，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勇敢與犧牲。現在俄國大多數的高級官員也是這樣的。前俄國王子奧新斯基（Prince Orshulsky）可以當作少數的貴族階級加入了產共黨與蘇維埃政府的一種代表人物。他是現在俄國的福特，管理汽車的製造事業。我們去訪見他的時候，我們知道他對於俄語，德語，法蘭西語，意大利語，或是英語都能講得很好。所以我們就挑選了英語和他談話。他的家屬比羅曼諾夫的皇朝還要早。他家屬裏以前所有的大地產，現在已經爲集團農場中的農民佔據。這可以表示他自己生活上的一種改變。

因為他是蘇俄羅斯特特殊階級裏的一分子，而現在却能很順利的很專心的服務一種工人的共和國，所以我們在問他的許多問題中有這樣的兩個問題：『你既然是從前享過特殊權利的，怎能滿意現在黨中二百二十五羅布一個月或三元七角五分一天的最高薪水標準，而這種酬報比美國福特廠中粗工的工資還要少呢？你既然是一個紳士的樣子，並且對於你們的同胞顯然有人道的觀念，那末你怎能擁護世界革命的政策呢？唐突的說一句，你們共產黨員爲什麼要殺人呢？』

他的答覆大要如下：『你問我爲什麼滿意於這樣的微薄的進款。但是我爲什麼不滿意呢？我一切所需要的都已經供給我了。我一日有三餐夠飽的食料。若使吃得多了就要使我生病。我在一時候祇能穿一套衣服。我在頭頂有一間足避風雨的房屋，並且也沒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假定我不滿意，那末金錢的積蓄或是私人的利潤能給我什麼滿意呢？爲什麼這樣輕賤的與卑鄙的行動要使我發生興趣呢？我們現在非但是要建設一個新俄羅斯，却要建設一個新的世界。我們敢替工人尋求正義的世界，以啓發他們創造的能力。這豈不是一個更有價值的目標，更勇敢的冒險與更深切

的滿意嗎？在我看來，當然是這樣的。

『但是你又問：我們爲什麼要殺人？你對於我們這種制度的觀念真正是這樣的

嗎？我很抱歉的說，在我們的革命中有些人確是被殺死了。但是他們比較上還是少的，因爲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幾乎是一種毫不流血的衝突，直等到反革命運動的發生，舊時特殊階級的破壞，各國聯合的干涉與侵掠。若使我記得不錯，美國的革命在一七七六年以後的七年中也殺死了許多人。我雖說是很抱歉的，但是人民在革命中確有一種被殺的機會。我想這是一種必然的罪惡。

『這種精細的外科醫生常常要施行一種危險的手術，使病人冒着生命的危險與受着極大的痛苦。他要這樣做，並非要殺人或是要使病人受痛苦却要想救病人的生命，並且最後除了一種危險的與痛苦的開刀手術以外，簡直想不出別種方法來。革命的情形也是這樣的。我們想不出別的方法，因爲其他一切的方法都已經失敗了。牠們在經過四百年沙皇統治以後俄羅斯已經失敗了。牠們在你們那些經過許多世紀的社會不公道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仍然是失敗。』

「你很嚴重的想我們要殺人嗎？老實的说，我們想你們是殺人者。比方你們屢次所發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你們的世界戰爭，你們容易發生瘟疫的貧民窟。你知道你們紐約城中貧民窟裏的死亡率嗎？我從前在美國考察過這件事情，並且也寫了一本書。請設想你們的城市裏有六十多萬黑暗的貧民同居的住宅。這些住宅已經繼續了好幾十年，並且有許多早已不適宜於住人的。但是你們從中取利，正如同沙皇時代的俄國一樣。你們從來不破除牠們。你們從來不給他們正義，與舊俄羅斯所做的也差不多。你們貧民窟中的死亡率既然如此高，那末十年百年的下去，你們究竟要殺死多少小孩子呢？」

「再講你們的世界戰爭罷。你們究竟殺死了多少人？你們在戰場上豈不是殺死了一千萬青年人嗎？單單俄羅斯一國豈不是喪失了三百萬人嗎？這些非交戰國也喪失了多少呢？若把婦女與孩子加進去，你們死亡的總數豈不是說二千六百萬嗎？你們拿這種情形來和我們的革命在幾天巷戰當中所殺死少數人比較一下，直等到後來資本主義的世界與帝國主義的國家來殘掠我們，作沙皇政府反動勢力的後盾，以攻擊一種工人

的共和國，殺伐就比較厲害了。照這一切明顯的事實看來，你能夠嚴重的說我們要殺人嗎？不是的；我們想信一種敏捷的外科醫生的開刀手術，雖是要使病人冒着生命的危險與受着極大的痛苦；但比較你們貧民窟中很高的死亡率，普遍的失業現象，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必然戰爭，總能夠真正救人的生命。照這一切事實說來，我要請問，究竟誰是殺人者，你們呢，還是我們呢？我們雙方都不願意殺人。但是我要重復的問，如今誰在殺人，你們呢，還是我們呢？」

上面這些話非但可以表明奧新斯基王子的思想，也可以當作共產黨全體的立場，

（二）無階級區別的社會

蘇維埃制度的第二種價值，似乎是一種比較的平等主義，其目的要達到一種無階級區別的社會，使種族與膚色的成見完全消滅。

除了你們的階級仇敵以外，在他們整個的制度中到處包含着人類平等的原則。一個人，無論他是白種或是黑種，黃種或是櫻色種，似乎都沒有什麼分別的。一個工人，無論他是女工或是男工，也是一例看待的。同等的工作應當有同等的報酬。一

切的職位是公開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婦女能像蘇俄這樣的能佔居這麼多的重要地位。在有些地方仍然還有反對猶太人的成見，好像以前沙皇時代的警察，政府或是教會教唆人民所施行的殺戮計劃一樣。

但是現在蘇俄制度的原則，國家的法律，共產黨的行動與宣傳政策都要竭力減少這種成見，並且要達到消滅這種罪惡的目的。

猶太人從來沒有像外國方面的宣傳那樣的在蘇維埃制度裏專權。現在在共產黨中的政治部裏沒有一個正式部長是猶太人。然而真正有才幹的猶太國民在俄國地方是准許佔居重要的位置，一點沒有像別個國家中對於猶太人的成見。

在一個種族成見對於各種主要問題發生重大關係的世界裏，也能建設一種超脫這種成見的制度，那也許是一種真正的貢獻。在現今的世界上大概有四種民族最犯這種種族成見的毛病，就是：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以及印度上等階級的人民。沒有一種制度能比他們的制度更配提倡種族平等的主義。在俄國地方幾乎有二百種不同民族。但是他們對於這些少數民族的待遇以及對於每個小共和國所允許的政治上，風俗上與

教育上的自治，和牠們在以前沙皇統治底下對於異族的壓迫要使人發生同樣的讖嘆。

這種蘇維埃制度能阻止外國的帝國主義用武力來克服別個國家，又用強迫的手段來統治別種民族，如同在印度斐律賓或是高麗的情形。他們當然不肯准許任何的小共和國自願退出蘇聯，但是他們盡力設法使一個俾佐治亞的共和國加入在聯邦當中，正如同美國對於南方分離的省份一樣。他們要坦白的鼓勵並幫助各處地方的民族革命，正如同法國在一七七六年幫助美國的革命一樣。但是他們對於東方或是非洲民族的待遇是根據於絕對的平等原則。這是顯然和幾個基督教國家相反的。鞏和人或是斯拉夫人是很殘暴的，但是爲了種族的成見而發生私下用刑的事件是他們制度底下所不可思議的。撥定不同教育款項來教養白人與黑人的子女——例如北美許多州中的情形——，因爲種族關係而准許法律與經濟上的不公道，爲了膚色的關係而拒絕人民的選舉權，是這種制度底下素來不能容忍的；因爲在這種制度中所說的『同志』與盎格羅薩克森國家中所稱的『兄弟』包含更真實的平等意義。我們很容易設想這種不平等的原則，將來如何會感動各種民族，或是殖民地，或是那些覺得被征服和壓迫的國家。這樣的一種令人

騷擾激動的制度也許會把牠探海燈似的光照耀着種種舊制度的罪惡，矛盾與虛偽——如果牠們自己的宗教與平民政治的理想主義不能夠推動牠們。我們還不能夠就此和俄羅斯了結的。封鎖的政策，不承認的態度，錯誤的宣傳都不能夠阻止這種探海燈的光照着我們自己的制度或是他們制度中顯明的社會罪惡。

(三) 社會試驗的世界實驗室

藉着一種試驗與錯誤的方法，處在一種殘忍的實在主義底下，大的試驗不妨在俄羅斯地方試行出來，給全世界發生一種極大的意義。其他的制度好像水門汀似的沒有變化的形式。牠們都因為保守主義而變為硬化呆板。這種新制度好像一種白熱化與溶化的金屬，很快的流到一個新鮮的模型裏以後，就變成了新的樣式。他們有一種公開的態度，試驗的勇氣，彈性與自由，除非有些地方是他們的經濟的獨斷主義所阻礙，

大抵在他們的試驗中，有些要失敗，有些會成功，但都有用的。例如這些共產黨員要試驗工人的管理工廠，並想忽然造成完全的工業上的德謨克拉西。牠的失敗是一致的，也是完全的。他們於是學得了一種教訓。他們從此不讓工人專權，並且在他

方面也從此不使工人受制於一種外界的獨裁手段。他們很快的在一種費力的試驗中學了一種教訓。但是別個國家是不能夠自由試驗。勞工的放縱與專制都是有害的。

俄羅斯是勇于做這些試驗。牠整個的生命是在冷金的籠子裏。一切的前例，一切的習俗，一切的成見，一切的法律，一切的風尚，一切的方法——無論什麼東西，祇要他們發現了一種更好的方法，都必須要除去的。人類大多數的發見，大概都得之于科學家的試驗室或是大的生活與經驗的學校裏。俄羅斯對於這兩種試驗地方都認為有價值的。但是對於第二種尤為心喜。沒有別種制度能這樣的冒險相信普通的人。

在各方面的許多試驗中，我們不妨舉出幾種已經提起過的試驗；如同五年計劃，集團農業與一切生活的社會化。這些試驗對於俄羅斯自己與全世界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在上而所考察過的五年計劃大概是現在世界上最勇敢的經濟試驗。如果這一種落後的窮乏的民族能夠從混亂與無政府的狀態中，不惜外債，又受着了全世界經濟衰落的影响，仍能夠使他們農業的出產增加百分之五十，輕便的工業出品增加百分之二百，重大的工業出品增加到百分之三百，電力的生產量也增加百分之四百；那末他們還

有什麼事情不能成就呢？有些國家要鬧罷工的風潮，並且有組織的勞工受了阻礙，就要和那些主有生產機關與牟利的人發生厲害的衝突。若使這種很大的工人團體自己變成了主人翁，發明家，熱心的發起全世界工人解放運動；那末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呢？一種統一的，合作的十字軍也許可以成就那些互相衝突與競爭的階級所不能的事情。五年的時期不過是兩種制度與原則之間一種長距離賽跑的第一塊里程碑；要決定這兩方面的勝利，不能看紙上獨斷主義的宣傳，却要依據工業試驗場中實在的結果。

集團的農業，合作的與工業化的農業方法是這種世界實驗室中另外一種主要的試驗。從古以來，農民雖然是基本的生產者，却也成功了一個問題。這種荒山，野地，窮鄉僻壤的居民，個人主義的農夫——沒有一種能適應急進的文化，並且受着城市生活的社會化。個人主義的農民能危害俄國的制度比任何別的制度還要大。沒有一個人能阻礙社會的進步比富農緊握的拳頭還要厲害。然而在五年之內這一盤散沙的基礎忽然能夠聯合一起做成整個的社會制度的堅固的基礎。

除了印度與中國以外，俄國是全世界農民人口最多的國家。一輛新的牽引自動車

恰是聯合發動機可以抵五十多個用老法耕田的人的工作。照現在這種進步看來，俄國在一二十年以後，也許可以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穀物生產者，或是農業機器的製造者。

牠的社會化和農業的工業化是進行得一樣快的。小的丹麥國近年來已經表明合作事業在一個小國家中有發展的可能。那末在以後的二十年當中，地大物博的俄羅斯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呢？我們姑且拋開了這種制度的高尚學理與共產主義的連帶關係，單講這方面的試驗可以做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印度或是中國的教訓嗎？自從工業革命以後，我們知道競爭可以成功些什麼事情，甚至馬克思也承認他成就了許多事情。那末離開了共產主義或任何制度而論，以上所說的這些國家與全世界應當學習合作的可能性嗎？若使這樣，那末俄羅斯就變成了試驗合作與工業化農業的世界實驗室了。

一切生活的社會化也許在這種生活的大實驗室裏可以證明為一種主要的試驗。從最初動物的互助生活裏與原始人類的團體，如同家庭種族城市國家以及更大的統一團體中，人們似乎常常不知不覺的在一種公開的秘密計中向着一種完全的，有組織的，合作的，和平的與創造的世界進行上去。他們雖然要碰到種種的衝突與戰爭的風潮，可是仍

然要向這種目標前進。近代文明的各種進步差不多都是一種社會的活動。但是誰已經發見人們可以從遠處達到社會化的政府，工業，或農業；社會化的教育，文化，或藝術；社會化的醫學，法律，娛樂或人生的幸福呢？一切的生活是否必須經過個人化，也經過社會化；為一個人的利益，也為許多人的利益；發展潛伏的人格，也發展廣大的社會？若使這樣，那末俄國的社會主義與美國的個人自由主義豈非都可當作社會試驗的實驗室嗎？像福特與馬克思那樣的人，不管他們各人才力有限，他們倆豈非都可以給人類一種貢獻嗎？若使這樣，那麼我們為什麼對於雙方都失望，或是看見了新的東西就要發生恐怖呢？單單有了像福特那樣的人就可以解決失業，貧乏或貧民窟的問題嗎？如果不能的話，那末為什麼不在人類的實驗室中，對於個人與社會的生活都作一種試驗，而採取一種解決的辦法呢？

我們必須記得這種長距離奔跑的俄國試驗是有時間問題的。有一種外國報紙非但急於誇大其事，並且要注視蘇俄的不幸。我們不應該拿革命以後經過一百五十年發展的美國和這個十年中常常處於混亂與窮乏之中的俄羅斯相比較。俄羅斯的發展是需要

時日的。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雖然能夠打倒腐敗的波旁政府，但是牠要經過長時期的殘殺與無政府狀態，拿破崙的專制主義與波旁皇族復辟的反革命運動。直等到一八七〇年，就是在革命以後的八十年，法國才真正建設了一種永久的民主共和國。君主主義的歐洲對於革命的法蘭西所發生長時期的仇恨和現在各國對於蘇俄的態度是相同的。如果歷史的哲學是可靠的，那末我們可以從革命的法蘭西學得許多的教訓，並且要記得美國，法國與蘇俄的共和國都是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

路易（Emil Ludwiz）曾經把法國與俄國的革命作一種很有趣味的比較。在一七八九年與一九一七年，這兩國的民衆都被一種社會正義的熱情所鼓動。兩方面的行動都是國家的，但是他們的意義是國際的，因為法國革命要引起一種世界的革命，使全世界都受着影響。幾乎歐洲一切的公民自由權都是發源於那種運動，而俄國革命運動也產生同樣的影響。照西耶士（Steuier）的估計，那些完全控制波旁的法蘭西的教士與貴族有六十萬人。這剛巧和那些在沙皇時代歐俄俄羅斯佔有四分之一田地的地主數目相等。法國的路易王與患神經病的尼古拉帝都是很軟弱的，並且被廢黜，拘禁與處

死。丹敦 (Danton) 與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統治下的恐怖狀態大約經過二年的工夫。牠漸漸的變為激烈，從政治上平等的要求改變到經濟上的平等，就是說，『人民中間不應該有貧富階級之分』。法國革命的法庭與俄國的『赤卡』相同。這兩個國家都要對付外國的干涉，以防革命的失敗。列甫在第六年就用新經濟政策來補充他的計劃，正如同法國革命在第五年經過巴士提爾 (Bastille) 的風潮以後的情形一樣。但是到了第十二年法國革命中的極端運動差不多已經告終了，但是蘇俄在十二年以後史丹林却從新努力的進行蘇維埃革命的完全計劃。

法國西革命中的無神主義運動，在起初的時候比俄羅斯還要厲害些。這兩個國家都廢止了舊時的日曆。牠們都採取五大中休息一天的制度。法國的議會很劇烈的攻擊上帝的思想與教會。美麗的馬馬洛夫人 (Mme. Mannos) 在諾悅爾達摩 (Notre Dame) 被封為理智的女神。這兩種運動都表示種種的諷刺畫與結隊的遊行，以反對宗教的迷信與教會的腐敗。在法國革命以後的第七年，上帝是從新被承認了。但是在俄國地方恐怕要經過很長的時期才能使政府對於宗教取容忍的態度，並且在政策方面有一種根

本的改變。如果歷史有循環性的，那末強暴政治總不能無限制的維持下去。在無論什麼時候，祇要不容忍的態度換了容忍的態度，專制的手段換了自由的政策：那末宗教必然要在俄羅斯恢復過來，正如同牠在別的地方一樣。

本的

艾迪叢書第六種

蘇俄的
真相

Challenge of Russia

By

Sherwood Eddy

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原著者 美國 艾迪

譯文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總發行處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青年協會書局

代售處 各省青年會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郵費酌加▼

